

# 目 录

## 第一章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

- 他上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后来又从这幅画上消失了。 ..... 3
-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膨胀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肃反”运动中，刘志丹、高岗等主要负责人被逮捕，几十人被杀。1935年秋，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 6
- “五一”节，沈阳市举行群众集会游行，高岗站在观礼台上检阅。游行队伍抬着高岗的画像。高岗指着他的画像说：“抬个大麻子干什么！” ..... 15
- 同高岗接触过的女性，多少人有口难言，或敢怒而不敢言。 ..... 56
- 饶漱石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设计整陈毅。陈毅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 61
- 中央意图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谦让。饶漱石得知后，说：“你不担任我担任！” ..... 92

## 第二章 一封秘信——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打秘密报告

- 斯大林将科瓦廖夫的报告递给毛泽东：“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 109
- 高岗到满洲里车站迎接毛泽东访苏归来，得知科瓦廖夫不再来华，若有所失。 ..... 120

### 第三章 两次会议

——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前后后

- 高岗说：“把我从东北调到北京，这是‘调虎离山’！”饶漱石闻听此言，顿觉醒醐灌顶。 ..... 127
- 毛泽东致函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 ..... 137
-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评薄一波的调子居高不下，周恩来无法收场。毛泽东说：“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 149
- 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放炮，饶漱石在中组部大闹。毛泽东说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说高岗同饶漱石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 168
-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即高岗的住处）车水马龙。 ..... 177

### 第四章 一夜心潮——毛泽东心头掠过的风云

-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犯错误，哪一次不是同斯大林有关？ ..... 193
-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闹分裂，企图用武力危害中央。叶剑英将张国焘的密电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你办了一件好事！” ..... 205
- 毛泽东想：斯大林没有了，会不会出“斯小林”呢？ ..... 210
- 毛泽东对捷沃西安说：有人要打倒我。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秦”灭了“楚”。“秦”是他们陕西（毛泽东用手指指在座的陕西韩城人师哲），“楚”就是湖南（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 ..... 213

### 第五章 两项决议

——从《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到《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 毛泽东提示刘少奇：你的自我批评宜扼要，三四千字即可，不可承认并非错

误者为错误。 ..... 217

-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犯有严重错误，但经批评愿意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的分子，必须给以严格制裁。 ..... 221
- 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 ..... 238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各项职务。 ..... 254

## 第六章 两个高岗——尾声

- 我们便看见了两个高岗：一个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并肩而立的高岗，一个是躺在荒草墓冢中的寂寞的高岗。这两个高岗，都是真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且，也都属于历史了。 ..... 279

主要资料来源 ..... 284

后记 ..... 286

第一章

..... 两个人物

——高岗、饶漱石其人

## ■ 他上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后来又从这幅画上消失了。

这里有一幅画，一幅油画。

这幅画题为《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作于1953年秋。

据说，这幅画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很想看看。商量的结果是，请江丰、董希文将《开国大典》连同精选的徐悲鸿、齐白石的作品，布置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大厅里。

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抽出时间，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些作品。

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来到怀仁堂后面的大厅，大家的兴趣集中在这幅《开国大典》上。

“画得很像。”大家都说。

“画得很好。”毛泽东紧握着董希文的手说。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评论着董希文的这幅油画：“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油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为了对艺术家的劳动表示感谢，毛泽东招呼摄影记者侯波，为大家合影留念。

后面还有一幅画，也是油画。标题也是《开国大典》，作者也是董希文，只是没有标明创作时间。

再仔细看看，这幅画同前面那一幅有没有什么不同？看看站在毛泽东后面的一群领导人，第一排从左到右数一数：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回过头去再看看前面那一幅，张澜的左面却多了一个人，一个留背头、



| 油画《开国大典》，董希文，作于 1953 年秋



| 修改后的《开国大典》油画

戴眼镜、穿深色衣服、个子高高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高岗。

这就是说，董希文第一次创作《开国大典》，画面上有高岗。

后来，高岗却从这幅名画上消失了。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就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前两天，1993年12月24日，首都一家报纸，在头版通栏的位置，发表了没有标明创作时间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没有高岗的《开国大典》；第二天，1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有高岗的《开国大典》。

这件事可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几乎微不足道。

这件微不足道的、极平常的事情，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味。

三十多年前的1962年，有一个“利用小说反党”的重大案件，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可能知道，有的可能不知道了。

这个案件，就是作家李建彤写了一部题为《刘志丹》的小说。小说中有个人物叫罗炎。罗炎给照金苏区送信，而高岗，在陕北闹革命时，就曾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就为这，当时康生一伙人就认定“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写了高岗就是替高岗翻案，替高岗翻案就是反党。康生于是编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由这部所谓的“反党小说”，牵牵连连，拉扯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贾拓夫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又拉出一个马文瑞同志，凑成“习、马、刘反党集团”，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甚至干脆统称之为“西北反党集团”。就因为《刘志丹》小说一案，打击了几千名干部，再加上牵扯进去的文艺界、出版界的干部，以及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黑爪牙。

搅得如此昏天黑地的一场闹剧，不过就因为一部小说中一个人物给苏区送信的行动，有些像高岗。

1993年1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原作，高岗的形象又赫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这件事偏偏谁都没有在意。

中国毕竟是开放了。

人们的思想也毕竟是解放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也毕竟是恢复了。历史就是历史，有谁就有谁，没谁就没谁，是谁就是谁。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政治稳定了，社会安定了。

中国的神经，再也不那么脆弱了。

那么，高岗究竟为什么从一幅名画上消失了呢？

■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膨胀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肃反”运动中，刘志丹、高岗等主要负责人被逮捕，几十人被杀。1935年秋，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高岗，陕西横山县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北民歌唱的“横山上下来了游击队”，就是那个横山。

高岗生于1905年。他死于何年，怎么死的，后面自有交代。

1926年，高岗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21岁。

1927 年，高岗在西北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为瓦解敌军、壮大革命武装而努力。

1933 年，28 岁的高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 42 师政治委员。

1935 年 2 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高岗为委员，同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 9 月，任第 15 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6 年，高岗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这一年，他才 31 岁。

抗日战争时期，高岗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政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代理政治委员。

1945 年，在党的“七大”上，高岗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时，高岗才 40 岁。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1949 年 9 月，高岗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一年，高岗 44 岁。



建国初期高岗像

1935 年秋天以前，高岗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劳。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

1935 年 9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了甘肃境内，仍然不知道有陕北这块根据地。

9 月 19 日，聂荣臻同志和林彪进驻哈达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那上面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聂荣臻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他赶紧

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给了毛泽东。

第四天，毛泽东在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最后，毛泽东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中央红军向陕北根据地兼程前进。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大为震惊。蒋介石一直害怕中央红军同其他红军汇合。现在眼看着中央红军要同陕北红军汇合了，这是他最害怕的。

蒋介石一面十万火急部署对中央红军继续围追堵截，一面调兵遣将，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的红十五军团，积极部署战斗，准备粉碎敌人的“围剿”。劳山战役，一举歼灭敌军一一〇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约3700人，击毙师长何中立。

但是，“围剿”尚未粉碎，我军不得不部署新的战役。

恰恰在这时，陕北根据地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膨胀的结果。陕甘晋省委，在劳山战役开始时，就确定要“肃反”。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省委的信送到十五军团。信中说：后方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发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在准备更大的阴谋活动。省委指令：在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正在十五军团有关负责人犹豫之际，省委又来信强调：“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和决定，不日将派xxx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

局势已无可挽回，刘志丹、高岗等一批高级干部即遭逮捕。

此次“肃反”中，错杀了90余人。

在外部，蒋介石的“围剿”没有粉碎；在内部，一大批革命干部被逮捕、遭杀害。

陕北，全国范围内仅存的这块红色根据地，陷入了极端严重的危机！

1935年10月19日傍晚，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到达吴起镇。红军一进吴起镇，看见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就听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陕北的肃反有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聂洪钧（西北军委主席）的汇报。当他们汇报到肃反的时候，毛泽东立即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中央很快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五人负责审查陕北肃反案件。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

毛泽东的指示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会上，宣布刘志丹、高岗等无罪，立即释放，同时宣布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戴季英不服气，周恩来问：“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陕北革命根据地，位于西北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周围的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在蒋介石剿共的“赌桌”上，陕北不是首要的、甚至不是重要的“赌注”。当时党中央的“左”倾路线，传达到这里，既困难，又缓慢。由于这些原因，陕北这块红色区域才得以存活下来。

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们，能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的一套政策，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1943年4

月 23 日延安《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对为西北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党员的评价。毫无疑问，这更是陕北根据地能存在的重要原因。

生活中常有偶然的巧合。这偶然的巧合，似乎有冥冥之中的神助。其实这不过是必然通过偶然而体现罢了。

恰巧，在 1935 年秋天，外部反革命势力和内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夹攻这块红色土地，使之处于续断存亡的关键时节，毛泽东来了！风尘仆仆地从几万里以外赶来了！党中央来了！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党中央，从尘土、泥泞和血迹中踏过来了！我们的被“左”倾机会主义摧残得遍体鳞伤的党中央，经过遵义会议而成熟了的党中央，怀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凌云壮志，来到了陕北。

毛泽东、党中央，及时挽救了陕北这块仅存的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朱德接着说：“陕北苏区成为我们长征退却的终点；陕北苏区又成为我们整顿部队发动抗日高潮和以后发展的出发点。”

1936 年 4 月，刘志丹不幸牺牲了。

陕北地区的工作怎么办？中央西北局的工作怎么办？

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他绝非包打天下的个人主义英雄，他坚信革命是阶级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在他心目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干部，千千万万的群众。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同毛泽东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毛泽东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局面下，全国“揭竿而起”的大大小小山头，又有多少？毛泽东承认这些山头，

照顾这些山头。各个山头的干部对本山头又非常之熟悉，这一点，绝非其他山头的干部可比。但是，毛泽东承认和照顾这些山头的最终目的，还是消灭这些山头，使山头融化，全党变成一体。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陕北地区的工作，不能没有陕北的同志参加。

大家说，陕北的干部，在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按资历，就要数高岗了。

好，高岗就高岗吧。

那时，高岗正在内蒙古地区工作。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非常重视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内蒙古地区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也就是党中央的靠背，这是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的。内蒙古地区，只能搞好。就在党中央到达陕北，把高岗从“左”倾机会主义“肃反”的“刀下”解救出来之后，就组织内蒙古地区工作委员会，以高岗为首，去了内蒙古地区。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从内蒙古地区调回了高岗，让他负责中央西北局的工作。

高岗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以后，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工作中，表现了高岗的能力与魄力。1941年6月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遭雷击，一名县长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安部门扣押了这个农民，当作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

高岗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情况。英明的毛泽东调查了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后，下令释放了这个农民，同时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征粮数，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这件事对边区乃至全党震动极大。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乘飞机飞回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又飞到延安。王明回延安后，中央让他分工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王明恶习不改，自以为从苏联回来，镀了金，有了“尚方宝剑”，成了“钦差大臣”，于是变本加厉，盛气凌人，指手划脚，连毛泽东都不在话下，高岗哪在他的眼里？王明对西北局工作的指导，无非是夸夸其谈，脱离实际。

一天，高岗对毛泽东说：

“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

原来，当王明、康生乘飞机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我们不必苛求毛泽东，不必指责他这篇欢迎词有些过分。那时，王明也好，康生也好，还有其他苏联人也好，还都是同志。毛泽东历来主张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历来主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久别的同志回来了，回到自己身边了，总是令人高兴的。

然而，高岗当着毛泽东的面，针对毛泽东的“喜从天降”，来了个“祸从天降”，一字之差，针锋相对，却不能不说要有点胆量和勇气。高岗心里也想过，连有人咒骂“雷公怎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都能“海涵”，都能从中发现问题，引出积极的结果，区区一句“祸从天降”，又算什么？

事实确实如此，毛泽东听出了高岗话里的弦外之音，很快就不让王明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换成任弼时了。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

“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物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

“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事实就是事实。

历史就是历史。

其实，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也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



1938年9月28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图为与会者合影。左起第一排：贾拓夫、高岗、谭政、朱清、张文彬、曾山、黎玉、刘少奇、博古、萧克、项英、谢觉哉；第二排：程子华、关向应、彭德怀、徐特立、成仿吾、潘汉年、徐海东、杨尚昆、萧劲光、罗瑞卿、李维汉、朱理治；第三排：李富春、郭述申、孟庆树、高文华、邓小平、彭真、王明、王稼祥、周恩来、冯文彬、滕代远、李昌；第四排：曹轶欧、柯庆施、康生、罗荣桓、吴玉章、林伯渠、贺龙、张闻天、陈云、郭子久、林彪、张浩、毛泽东

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自然，这种改动，也已经成为历史了。

那么，在陕北时期的高岗，是不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功劳的高岗、正面的高岗、光明的高岗、完美的高岗呢？

不，不是这样。

先看看跨越 1942~1943 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干会”。

这个会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的基础上召开的，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是在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之后召开的。

会议组成了以高岗为首的 9 人主席团，出席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 97 人，军队旅以上干部 52 人，县团级干部 117 人。大会于 1942 年 10 月 19 日开幕，1943 年 1 月 14 日结束。大会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毛泽东、贺龙、林伯渠、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都作了报告，高岗、康生也作了报告。

这次大会，端正了边区党的路线，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的一致；大会端正了党风，明确了边区党的各项任务，同时也为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这次大会是成功的，效果明显，影响也大。

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问题。大会开始十多天，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不得要领，如讨论农村党员问题，就只用“到会、交费、模范、公道”四条去套。只是到了第二阶段，毛泽东及时指示主席团要改变方针，要从细微末节的问题转到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问题上来，如自由主义问题、对党闹独立性等重大问题，大会才走上正轨。虽然如此，西北边区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和自由主义问题，并没有解决。会议指出，“边区当前仍然存在着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高岗对这个正确的批评，不仅不予接受，反而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同党闹独立性。而且，由于强调西北局要以高岗为首，因而无论是会上发言还是会后报道，都有突出个人，甚至个人崇拜的现象。对这些，高岗当然不能辞其咎。

据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回忆，高岗不仅有同党中央闹独立性的毛病，在部门和部门之间，领导同志之间，他也是常常闹矛盾。例如，当时的留守兵团司令员，对西北局尊重不够。任弼时和林伯渠找这位司令员谈话，要他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军队必须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有缺额或者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所以说，我们的军队和老百姓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

这位司令员是个好同志，接受了任弼时和林伯渠的帮助。

然而，高岗却不。他的思想，没有进入应有的境界。他利用自己的某种优势，向党中央争一种东西。他说：

“留守兵团如果仍旧归中央管，那么，他们的后勤保障我们西北局就不管了。如果要西北局保障他们的后勤，那就得由西北局来管他们。”

中央有中央的难处，要中央保障留守兵团的后勤供应，这是不可能的。为了顾全大局，留守兵团就只好让西北局管。中央让步了。

■ “五一”节，沈阳市举行群众集会游行，高岗站在观礼台上检阅。游行队伍抬着高岗的画像。高岗指着他的画像说：“抬个大麻子干什么！”

高岗终其一生，主要活动的地区，依次为陕北——东北——华北。这华北，主要是北京。

在陕北，高岗有自己的优势。到了东北，原来的优势当然失去了，但他又获得了新的优势。这新的优势的获得，当然有他自己的努力，但又不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

由于地处东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又获得了创造新的优势的机会。

等到在建国后，高岗作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一马”而踏进北京——新中国的首都的时候，他的优势发展到了顶点。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定的条件”。

高岗具备这种“条件”吗？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将争取东北作为战略任务提了出来，取得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9月，苏联红军150万人，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向日本陆军主力——67万人的关东军展开全面进攻。

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的号令下，我冀热辽军区部队，击破长城内外日伪军的多次抵抗，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率先进入东北。

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我们所有进军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有的徒步，有的渡海，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

国民党方面呢？

美国为了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必须控制远东；要控制远东，控制中国便是重要环节。而要控制中国，则必须扶蒋反共。要扶蒋反共，对于东北这一大块战略要地，是非争不可的。

蒋介石凭着美国提供的海上和空中的运输工具，利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远在大后方的精锐部队，向东北运送。

1945年8月30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9月2日，又任命其长子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介石还将原东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和哈尔滨、

大连两市，同时任命了九个主席和两个市长，声称要接受“东北主权”，开始了对东北的争夺。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毛泽东就指出：抗日战争阶段过去了。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为了争取中国革命的巩固的基地，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调兵遣将。

1945年9月15日，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中央局，立即赴东北工作。

9月19日，中央又决定派林彪、罗荣桓、高岗、张闻天、李富春赴东北。

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条件下，高岗离开了陕北高原，踏上了东北大地。

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成立，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

11月2日，中央决定组织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高岗、张闻天为北满分局委员，高岗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

11月22日，中央继9月17日提出全国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之后，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

11月30日，北满分局领导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分析东北形势，总结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由陈云主持起草了给东北局和中央的电报：《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电报提出：

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按：指沈阳、长春、哈尔滨），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撤到北满、东满、西满，

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该电报分两部分，前后两天发往中央。中央在收到一半后，即加审阅，立即回电：完全赞同。

12月5日，东北局电报中央：“我们仍积极准备夺取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走，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领沈阳，再夺长春。”

12月7日，中共中央接到东北局5日电后，给东北局发出战略指示电：“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

12月7日，北满分局在接到中央战略指示电后，立即致电中央和东北局。电文指出：由于北满地区许多战略要点为国民党势力占领或控制、群众尚未发动、我两万多新部队阶级觉悟低、成分复杂等情况，决定我们要“准备和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现在“各县不忙于扩大部队数量，应立即讨论如何掌握现有的部队，……配备干部，加强领导，清洗坏人，补充兵源，解决服装，团结内部。……军事首长率领此部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决地扫清各战略要点、中心城市的主要敌人，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主要关键，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

12月28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应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目前，“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

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这一指示，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作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

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政委，陈云、罗荣桓、高岗、程子华为副政委。

2月25日，北满分局陈云等给东北局电报，提出“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迟阻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

北满五省在北满分局领导下，整顿部队，消灭土匪，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开始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

5月12日，中央决定，因罗荣桓出国治病，高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政委，主持军事行政与军队政治领导工作，长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5月26日，根据东北局建议，为了加强党在东北地区的集中统一领导，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

6月16日，关于东北干部分工问题，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指示：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组成东北局常委。

7月3~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在东北的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萧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还有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

会议根据中央关于东北工作的精神，分析了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及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的经验教训，在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会议委托陈云起草《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于7月7日通过。决议向东北党政军提出的任务是：

- (一) 必须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
- (二) 要把发动农民、创造根据地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 (三) 阶级矛盾已变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 (四) 我军的作战原则，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方针；
- (五) 共产党员应走出城市，换上农民服装，下乡发动群众。

这个决议是 7 月 7 日通过的，通称“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标志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开始变成东北地区党政军民的实际行动。

9 月 4 日，林彪、彭真、高岗、陈云联名发出关于对敌作战原则的指示，提出“采取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根本方针”的十条原则。

10 月 19 日，林彪、彭真、高岗、陈云就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与工作方针问题，联名向中央报告。报告分析了敌人进攻的严重形势，提出了党在东北工作的方针：

首先是站住脚，巩固现有地区。具体工作最主要的是着重发动农村群众，推广现有地区，并准备将来军事上转为优势时，形成对全国的影响。

其次是在政治上巩固军队。在作战上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着重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保持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

10 月 31 日，林彪、彭真、高岗、陈云致电中共中央：

敌利用松花江阻我北满部队，而集中主力进攻南满和西满，最近正布置攻洮南。但长春以北敌兵力较空虚。我拟以 5 个师兵力，以火车运输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起攻势，以破坏敌攻洮南及策应南满。

11 月 1 日，毛泽东电复林彪、彭真、高岗、陈云：

“你们作战计划甚好，望坚决执行。”

11 月 4 日，中央决定陈云去辽东，任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治委员。

12月17日，林彪、高岗、彭真联名发出关于坚持南满局面给南满分局的指示，提出内线作战、内线外线相结合作战、少数兵力在内线主力到敌后外线作战三种作战方式，要求南满的斗争必须准备在最困难的局面下坚持奋斗。南满分局作出部署，将主力深入敌后，即四纵深入敌后与地方武装配合歼灭敌人，三纵坚持在临江地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当即批准这一部署，并指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在于使敌不能全力向北摧毁我北面根据地，使我得以互相依存。

194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就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问题致电林彪、高岗、彭真：（一）最近北满、东满开始打胜仗甚慰，包围其塔木一点，引起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敌无计划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这一经验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的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地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之薄弱据点，采用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二）南满四纵20天敌后作战经验亦指明，只有采取勇敢进攻方针，才是胜敌之道。

4月3日，东北民主联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对临江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人，收复城镇11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和发展了北满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迫使其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5月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总结了贯彻“七七决议”后，东北敌我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在军事上敌人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进攻。这样，东北全党的新任务，便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我军向敌人发动了夏季攻势。

5月20日，在夏季攻势顺利进行之时，毛泽东就全国军事形势及东北作

战问题，致电林彪、高岗，庆祝他们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主力及其他各线的胜利。电文指出：“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

5月下旬，为了适应东北革命形势的需要，东北局决定组成26人的东北局委员会，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林枫7人为常委；林彪为书记，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高岗兼秘书长。

7月1日，东北我军发动的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夏季攻势是东北我军转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右二）与黄克诚（左起）、谭政、聂荣臻、萧华、罗荣桓、刘亚楼、林彪等领导人在一起合影

入战略性进攻的第一个战役，历时 50 天，歼敌 83000 余人，扩大解放区 16 万平方公里，使我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将东北敌军压缩在中长路、北宁路及沈吉路沿线以沈阳为中心的狭长地带的少数数据点上，迫使敌军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继续分割我解放区、各个击破我军的计划，从根本上扭转了东北战局。

1948 年 1 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包括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

1 月 6 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副政委罗荣桓、高岗、陈云：“庆祝你们 1947 年消灭敌军 28 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3 月 15 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历时 3 个月，歼灭敌军 15 万余人，收复城市 18 座，压缩东北国民党军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4 月 18 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主要负责人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讨论攻打长春问题，并致电中央军委，提议在军事、政治整训之后，用 9 个纵队打长春（其中 7 个纵队攻城，两个纵队打援）。

毛泽东于 22 日回电：同意你们打长春的意见。……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早在 2 月 7 日，即电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提出了“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原则。但是，到 4 月 18 日，东北局和军区领导仍然意在攻打长春。因此，毛泽东在 22 日回电中着重指出“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以免“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此后，毛泽东反复电示东北野战军领导，“应该使用主力于北宁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先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而打下

了锦州，就算实现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此问题，几经周折，一直到10月4日才最后解决。

10月20日，中央军委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电文指出：“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令十纵准备，一经发觉敌有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口守备。”高岗、伍修权“建议以十二纵及3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上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

11月2日，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11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热烈庆祝解放沈阳，完成了解放东北的伟大胜利。电报指出，依靠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的英勇奋斗，三年中歼灭敌人100多万，解放了东北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数年内解放全中国、将中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对于东北的解放，国际舆论纷纷发表评论。

美联社记者写道：“东北已成为勾销的问题了，华北现在能守住吗？……政府军能够守住甚至包括长江在内的任何防线吗？”

《纽约时报》写道：“问题不仅是在远东的一场内战的胜败问题，世界的均势改变了，而且，它是朝着美国希望的相反方向变化的。”

《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以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我们党同美蒋反动势力在东北的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结束了，党中央在1945年规划的争夺东北的战略任务完成了。

从上述直接涉及到高岗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看来，在这个战略任务完成的过程中，高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是在东北局这个集体之中体现的。

1948年11月23日，东北局在沈阳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三年解放战争的经验，分析了东北全境解放后的新形势，最后，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东北野战军的健儿及其指挥机关，于 11 月底以前，先后穿过巍峨的山海关城门，入关作战。

高岗留在了东北。

硝烟渐渐散去。高岗面对着具有雄厚工业基础和千里沃野的东北大地，以及“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这幅粗略的蓝图，觉得喜出望外。

陕北曾经是中国革命的“两个点”。

东北呢？现在是巩固的基地。想到自己的双脚，总是踏在“点”和“基”上，高岗在神思昏昏之中，有一种微醺的感觉。

1948 年 12 月 18 日，高岗收到中央来电，中央要讨论 1949 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以及准备召集七届二中全会问题，请高岗考虑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到中央参加此次会议。

按照中央指定的日期，高岗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1 月 6 日至 8 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主要是听取并通过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的大气磅礴、海阔天空的报告，高岗并不陌生，也很能理解。毛泽东说：现在，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基本上打倒不等于全部打倒。因此，毛泽东又强调不应该有轻敌观念，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能半途而废。

对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和告诫，高岗以为都是对的，虽然他并不觉得同自己关系那么紧密，相反，倒是觉得有些遥远。但是，当毛泽东讲到 1949 年的任务时，高岗就感觉心驰神往，大不一般了。毛泽东说：

“1949 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将是一个新的殿堂，一个前所未有的光辉的殿堂。毫无疑问，在这个殿堂里，必须有新的席位，新的座次。几天的会议，

这恐怕是给高岗印象最深、最使他兴奋的一点。

两个月后，高岗再度来到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次来的时候，著名的三大战役只打完了两个，即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这次来，平津战役也已结束，北平市已于1月31日和平解放。如果说上次来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只能算是基本上被我们打倒，现在则可以说已经被我们消灭了。

中国正在“天翻地覆”，情况瞬息万变。“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再来一个漂亮仗，再来一个打得好”的歌声，正在黄河流域及长江以北地区，向长江以南地区滚动。

然而，毛泽东在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却“热”中有“冷”。不陶醉于眼前的胜利，不被眼前的、哪怕是天翻地覆的大胜利冲昏头脑，几乎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对毛泽东的这句话，高岗觉得思想跟不上，有点难以捉摸，觉得有些空泛，有点玄虚。什么“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呀，什么“务必使同志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呀，更不过是“姑妄听之”了。

毛泽东报告中有一个思想，高岗则牢牢记住了。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在参加革命以后，在武装斗争的漫长岁月里，高岗形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作风，这就是：抓住主要的东西不放，一旦他觉得抓住了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他就敢说敢干，大刀阔斧。这个特点对于高岗来说，已经性格化了。毛泽东讲了两种基本的矛盾。基本的矛盾，当然是要死死抓住不放的。这两种基本矛盾，在国外是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哪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不难辨别，我们吃帝国主义的苦头够多了。再说，高岗专门同帝国主义打交道的可能性不大，机会也不多。而在国内，同资产阶级打交道，那恐怕就司空见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睁开眼睛就会看见一个资本家，一迈步，就

会碰上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这可是要当心的。那么，紧紧抓住国内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就成为须臾不可忽略、不可轻视的问题了。社会主义不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吗？不消灭资本主义还叫社会主义吗？

1949年6月上旬的一天。

高岗办公室。

高岗在看一份题为《关于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报》的文件。

“呸！”高岗看到最后一句“据说东北城市工作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时，实在控制不住，“啪”地一下把这份文件扔在桌上，呼地站了起来，在屋里乱转。

这是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中央在这份电文前还加了按语：

“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些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市委、省委、区党委！错误、错误、路线错误！这不等于通报批评吗？！这不是在全国出我高岗的洋相吗？！”

高岗知道这份文件是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还举了刘少奇在天津发现的所谓种种“左”的表现。

高岗又回到办公桌前，没有入座，左手撑着桌子的一角，右手拖过文件。——在这里：

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为，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

看到这些对资本家要“照顾……应有照顾”、“帮助……克服”，对工人

要“坚决……纠正”的字样，高岗的呼吸再一次急促起来。

高岗抬起头，缓了一口气，接着看下去——

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间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说来说去，不就是害怕消灭资产阶级吗？！”高岗大声说，似乎是在进行一场辩论，又像是对一场辩论所作的结论。

其实，关于刘少奇在天津的活动，他的多次讲话，高岗从各种渠道得到过不少信息。刘少奇说，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保护资本家就是保护生产。刘少奇还批评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去。

关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方式，刘少奇多次讲过，中国可以不采取苏联推翻资产阶级的流血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

刘少奇在天津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说：

不要怕说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

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的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关系拉好了，弄的立场失了，那就是右了。关系极好，发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

等等，等等。

这些，高岗都知道。

特别是刘少奇说的“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这些话，高岗听到了以后，吃惊不小。高岗在听别人转述这些话的当时，总要反复订正一下，刘少奇是不是这样讲的。转述的人说确凿无误，千真万确是这样讲的。

高岗得到这个“千真万确”的答复，又转“惊”为“喜”了。他觉得他可以而且应当做一件事，一件对他很意义的事。

可是，这件事他还没有着手呐，刘少奇倒是打上门来了。“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纠正”什么？“检讨”什么？向谁检讨？还“立即”呐！

高岗“立即”倒是“立即”，可不是立即检讨。

高岗立即叫来了秘书。

“你把刘少奇在天津视察期间的所有讲话，文字记录的、打印成文的，包括报纸上的报道，都整理一下，立一个‘档案’。”高岗向秘书交代。

“还有，少奇同志 1948 年 9 月在西柏坡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12 月间，他在华北作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也都收在一起。”高岗想了想，又交代说。

十几天以后，1949 年 6 月下旬，中央派一个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次出访的主要任务是，沟通和建立中苏两党之间的直接联系，通报中国革命发

展的新形势，通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的打算，以及中苏关系问题、苏联援助问题，等等。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成员有高岗、王稼祥。

刘少奇、王稼祥及其他随行人员和工作人员，从清华园上火车，第一站到达沈阳。高岗从沈阳上车，同车到达大连，然后乘飞机去苏联。

飞机从大连机场起飞后一个小时左右，机上的几名苏联保卫人员，神色紧张地在机舱里匆匆来往。然后，飞机下降，并且着陆了。苏联保卫人员请刘少奇及代表团的同志们下机。大家都不明所以，到了休息室一看，才认出来是又回到了大连。

这时，苏联方面有关人员才向代表团解释，飞机起飞后，机器发生了故障。为了安全起见，飞机又飞回大连机场，进行检修，再待命起飞。

代表团的同志听到这一情况，有些不安。刘少奇扫了大家一眼，然后，走到王稼祥和高岗前面，低声问：

“飞机为什么会发生故障？不是苏联派来接代表团的专机吗？”

高岗一声不吭。

“我想不会是政治上的原因。”王稼祥想了想，认真地说。

这时，高岗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坐在对面沙发上的科瓦廖夫。

科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作为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曾经长驻东北，同高岗早就认识。科瓦廖夫是1949年4月才去北平的。这次中央派代表团访苏，决定请他陪同前往。毛泽东亲自找科瓦廖夫谈过话，意思是说这次请他陪代表团走远路，会很辛苦的，不过，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同家人团聚一番。毛泽东还问科瓦廖夫有没有什么个人要求，或者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

科瓦廖夫这次陪同代表团前往苏联，高岗没有想到。他在沈阳上车时，同科瓦廖夫也只是一般地打个招呼，问个好。唯独在听了刘少奇和王稼祥那番对话以后，鬼使神差般地注意起了这位苏联人。

他情不自禁地对坐在对面的这位金发碧眼的洋人端详了一阵以后，又鬼使神差般地坐到他身边去了。正好那里有一个空位子。

“科瓦廖夫同志，这次你也陪我们去，辛苦你了。”高岗说。

“谈不上，谈不上，干我们这一行的，在流动中生活惯了。”科瓦廖夫说，“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也可以顺便同家人团聚团聚。你说对吗？”

“那倒也是。”高岗说。

“原来说的是你们前天动身，怎么又推迟了？”高岗又问。

“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科瓦廖夫说，“前天下午，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海接见我，谈的时间比较长。会见结束后，我同师哲同志从中南海出来，要返回香山，准备傍晚时出发。按照我们俄罗斯人的旧风俗习惯，逢 1 的日子出远门是不吉利的。我同师哲同志正在嘀咕，我们的车子就撞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我们车上的玻璃碰破了。我往车窗外一看，那青年的自行车被撞坏了，看来他的腰和腿都受了伤。”

“这么说，你们俄罗斯的习惯还真有点道理。”高岗插话说。

“闯下车祸啦，我们只得停下来处理。后来还是中南海派人把那受伤的青年送到医院检查治疗。等我们回到香山，已经天黑了。只好第二天出发。”科瓦廖夫说，“不过，后来我也听说，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出来以后，他同刘少奇同志又谈了好长时间，他也不可能在当天出发了。”

“这么说，今天是你此行的第二次事故了。”高岗说。

科瓦廖夫摊开双手，耸耸肩，做无可奈何状。

“但愿这次事故不至于引出一些别的什么来。”高岗话里有话。

科瓦廖夫当然听不出这话里的弦外之音。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晚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会见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表示祝贺。

三天以后，代表团提出需要向斯大林商谈的问题，包括：贷款问题、专家问题、国际形势估计问题、帮助我们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即中国大学）问题，以及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贸易问题，等等。

每次会见后，回到寓所，刘少奇总要召集代表团的同志，一起回忆这次会见和谈话的内容，哪些是重点，哪些是一般性的，哪些问题斯大林已经明白，哪些问题他还不清楚。这些工作，都进行得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

有时也开些玩笑，说说会谈过程中的花絮。

会谈中决定，有一个条约要由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于是，苏联报纸立即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便公开活动。

7月30日，高岗提前回国。

对此次苏联之行，高岗非常满意，仿佛一股热流，在胸中涌动。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却比其他任何一个成员更能体谅苏联政府的困难，说话也更公正和公道，加上他借助科瓦廖夫而表现出来的对苏联同志的特别的热情，因而也获得了对方特别的好感。这个代表团的访苏，本来是一次秘密行动，高岗在苏联报纸上见报，公开露面，不过是从工作需要出发，为了工作的方便。在高岗看来，这似乎有什么深意。

这一切，都使高岗精神亢奋，踌躇满志。回国后，他向身边的人不止一次说：

“这次访苏，收获很大。这收获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肯定地说：斯大林是不喜欢刘少奇的，对周恩来也不怎么重视。相反，无论斯大林也好，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也好，看见我的时候，眼神都有些不同。为什么呢？大概他们不是赏识我脸上的麻子吧？”高岗最后来了一句志得意满的自我解嘲。听的人，很为他的潇洒、为他的不拘小节的大将风度所折服。

1949年8月27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一致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9月21日，高岗出席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开幕式上，毛泽东致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政治协商会继续开会。会上，林伯渠作《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谭平山作《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董

必武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周恩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的报告》。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一个辉煌的日子。对于高岗来说，当然也是一个金光灿烂的日子。

下午两点多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会。休息片刻，中央领导人和政府委员们的车队，从勤政殿门口出发，出中南海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向南，进入中山公园后，又驶进故宫阙右门，然后向南一直到达天安门城楼后面。

这长长的车队，停在御道右侧。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右一为高岗）



1953年1月，高岗（右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毛泽东的专车走在最前面。他迈出车门，回头望去，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都下了车。高岗，当然也跟了下来。

人们向毛泽东聚拢了一些以后，又调头向天安门后西侧的马道走去。

高岗看见前面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城楼上的时候，广场上的扩音器里响起了播音员洪亮激动的声音：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聚集着30万人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海洋，红旗的海洋，欢呼声的海洋，沸腾的海洋！

开国大典开始了。

毛泽东按下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

50门礼炮齐鸣。

当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到旗杆顶端的时候，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说：“升得好！”

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告》。

本来，这个公告的内容，高岗不是不知道；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列在张澜之后，是六个副主席的最后一一名，也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当毛泽东宣读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

全国人民的意志……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高岗的注意力还是高度集中。他等待着自己的名字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典上，伴随着毛泽东的声音，覆盖整个广场，传遍中国，传遍世界。

毛泽东的宣读继续着：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等待变成了事实，高岗的注意力随之松弛了下来，下面还有多少张三李四，就都无足轻重了。

他的眼前只有一片海洋，一片人群的海洋。他是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俯视这片海洋的一小群人中间的一个。

“有为者亦若是。”这句话忽然从高岗的记忆中蹦了出来。这句话好像是王明告诉他的一句古话，一个古代人讲的。

是啊，“有为者亦若是”。高岗心里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和惬意。

时间，在这满足和惬意中悄悄逝去，阅兵式完了，欢呼的群众开始游行。群众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前时，“万岁”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高岗忽然发现，游行队伍停在天安门前不走了。

原来，那汹涌的海洋，是冲着另一个人：毛泽东。由于站的时间太长，毛泽东被周恩来劝进休息室去休息了，游行队伍看不见毛泽东，就停在天安门前，不再前进。当周恩来把毛泽东从休息室请出来，毛泽东又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的那个位置上出现的时候，“万岁”的欢呼便再一次如海啸般迸发出来，队伍也开始前进了。

毛泽东将上身探出白玉栏杆，向群众挥手致意，又走到麦克风前，用那人们熟悉的湘音高呼：

“人民万岁！”

“同志们万岁！”

天高地厚，气壮山河。

看到如此这般情景，高岗似乎有一种失落感袭上心头。他好像觉得，“有为者亦若是”的“是”，并不是他脚下站的这方尺之地……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这场战争很快国际化。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关于朝鲜局势的提案。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我已命令美国的空海部队给予朝鲜部队（按：即李承晚部队）以掩护及支持，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我已指示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我也指示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及其联邦成员国的部队。

显然，美国已经把朝鲜战争，同刚刚诞生半年多的新中国连在了一起。

朝鲜人民军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南朝鲜军队和美军，压缩在釜山一带。

为刚刚诞生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操劳的毛泽东，不得不关注朝鲜战局。他面对那有着“蜂腰部”的细长的朝鲜地图，忧虑地说：

“我们的朋友太轻敌了，该停一停了。闭着眼睛跑，地下会有石头的，会绊倒人的。”

果然，9月15日，美军利用朝鲜人民军主力被“粘在”釜山之际，在仁川登陆成功，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

战局急转直下。

10月2日凌晨，高岗被机要秘书从睡梦中叫醒，中央军委来了紧急电报：

（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

高岗迅速看完电报，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早在7月7日，朝鲜人民军攻克汉城、长驱直下、向南挺进的时候，周恩来就主持召开军委会议，专门讨

论保卫国防问题，并作出决议：调四野主力部队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属十三兵团）和四十二军，以及三个炮兵师，于7月底以前全部往安东（今丹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组成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当天就同意照此执行。

8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高岗，东北边防军应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军委再次致电高岗，“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东北地区，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名副其实的一衣带水。作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理所当然地关注朝鲜战争形势。但是，在七八月间，战争形势很好，金日成满怀信心地发布命令，要使8月成为完全解放朝鲜国土的月份。高岗虽然完全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部署，具体负责解决边防军的一切后勤供应问题，但思想上却不以为然：人家自己打得很好，信心十足，我们何必如此多虑，如此紧张？

然而，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港登陆以后，高岗就着急了。

特别是10月1日，高岗得到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的消息，更是紧张，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党政军干部中，已经作了不顾一切进行疏散的动员。

现在，中央军委要他立即去北京开会，并要邓华“随时待命出动”，他觉得像是有一个巨大的不祥之物，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高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于10月2日午后飞到北京。3时，到颐年堂参加会议，出席的人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

因为高岗刚到北京，毛泽东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送来的，你看看吧。”

高岗看完了电报。毛泽东瞄了他一眼，他没吭气。

毛泽东神情严肃，断然地说：



1949年10月20日，高岗（第二排左起第二人）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领导人合影

“朝鲜形势非常严重。我看，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早一天出兵还是晚一天出兵的问题。早一天出兵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一个出兵的时间，一个是谁来挂帅？”

高岗插话说：“挂帅的人选不是林总吗？”

毛泽东大声说：“原来是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同志确实有病，而且病情很重。我就劝他安心养病。后头美军、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地上爬的，天上飞的，黑压压，乱哄哄，形势越来越严重。这样一来，我们出兵援朝，就不是几个军就能解决问题了。

于是常委又考虑林彪同志挂帅。没想到林彪强调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的工作都未就绪，美国又是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有各种火炮 1500 门，我们一个军只有 36 门。美国的空军、海军都很强大，我们的空军、海军刚开始组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

高岗暗自吃惊，林彪的这些话，同自己的想法如出一辙，简直说到自己心里去了。看样子，毛泽东是不同意林彪的意见的。幸好当时没有征求高岗的意见，要是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也会像林彪这样说的。

“前些日子，我同林彪谈了一次，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冒险出兵，出兵又有哪些有利条件，不出兵又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对美帝国主义，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又说他体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有这‘三怕’，怎么能挂帅带兵打仗呀！”

会场一片沉默。

“‘闻鼙鼓而思良将’啊！”毛泽东打破了寂静，“我看还是彭大将军彭老总吧！”毛泽东继续说。

“对头嘛！老彭这人靠得住！”朱德很快接过了话。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当天晚上，高岗去看林彪。

“要你挂帅出兵朝鲜，你不同意？”高岗一点儿弯儿不拐，直通通地开门见山。

“挂帅！我根本就不主张打这一仗！”林彪冷冷地说。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已经找了别人。”高岗打住话，看着林彪。林彪并没有马上问“是谁”，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高岗一眼，好像既不庆幸，更不羡慕，无动于衷。

高岗把下午开会的情形，向林彪一五一十讲了一遍。关于挂帅的人选，最后还是毛泽东提出彭德怀，朱老总立即表示同意。

林彪仍然冷冷地说：“谁愿意打、谁能打，谁打去。我们是‘大树底下

好乘凉'。”

高岗说：“林总，这可不是‘乘凉’的事儿！我同意你的看法，弄不好就‘引火烧身’，还乘什么凉？”

林彪说：“我们是胳膊，人家是大腿，你拧得过？！”

高岗说：“看样子还得开次会。你是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你的话还是有分量的，你得说话！”

林彪盯着高岗的眼睛，似笑非笑地说：“你是怕这把‘火’一烧起来，首先烧的是你吧？东北，现在成了你的‘本钱’了。”

“我不否认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我们有多少钢，美国有多少钢？人家的装备是现代化，我们是什么‘化’？这不都是明摆着的吗？”即使在林彪面前，高岗的话也还是半真半假。

10月4日，还是在颐年堂。

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大区负责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陆续到会。

应该到会而没有到会的，只有一个彭德怀。原来，毛泽东交代周恩来3日派飞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因为气候不好，飞机无法起飞，只好延到4日，飞机才飞赴西安。

到会的人，几乎每个人心头都翻腾着波浪。

这一仗，非同小可啊！

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呀！她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1840年以后，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这一仗，直接关系到共和国的存亡，怎能不令人忧思百结，殚精竭虑？

出兵有利还是不出兵有利？

究竟是出兵有利还是不出兵有利？

毛泽东毫不例外，心中翻腾着的也是这个问题。

利弊，好坏，得失，大小，强弱，胜败，现象与本质，正义与非正义，

勇敢与怯懦，一、二、三、四，前、后、左、右，天、地、人，过去、现在、将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亚洲、美洲、欧洲，陆地、空中、海上，白天与黑夜，时间与空间，进一步、再进一步，退一步、再退一步，物质、精神，可能、现实，长期、短期，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样、那样，如果、不如果，赤橙黄绿青蓝紫，软硬高低你我他，……翻过来，覆过去……

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感情，他比谁差？他已经献出五个亲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正是出自他的手笔，他何曾忘记过“三年以来”、“三十年来”、“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为了人民幸福、民族独立而牺牲了的先烈？开国前夕，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回到中南海，哭了。他想起无数革命先烈，想起了方志敏，想起了杨开慧……“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是一面。

另一面呢？

人家的国家正在危急关头，人家向我们呼救，而我们只站在一边看，见死不救，心里能好受？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英雄！仅仅一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是他奋斗的最终目标。打出了一个人民共和国，这是好事，不能让这个好事变成坏事，变成一个包袱背起来，开始怕这怕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怕什么战火烧到自己家里来？烧来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回到山沟里去，重新干！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

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波澜壮阔。

他的性格中没有退缩，只有迂回。

他生命途中的失败，只不过是通向胜利的垫脚石。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是彻底地“动心忍性”了。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只是坐在颐年堂中间的大沙发里抽烟，还没有说话。

他只是在听，听大家发言，听同志们争论。

反对出兵的意见不少，理由也很多：刚刚建国，解放战争并没有结束，西藏、台湾还没有解放，中南、西南等边远地区都有国民党军残部的匪患，新解放区的土改还没有进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战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人民太苦了，急需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甚至在党内，存在着厌战情绪和崇美、恐美思想。万一打不过人家，引火烧身，怎么得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毛泽东都听着，静静地听着。

林彪发言了。他说：

“主席让我们摆摆不利的因素，我很赞成。旧中国这个烂摊子，我们刚接过来不到一年，国力很弱，我们没有什么力量到外国去打仗，而且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不打无把握之仗。我们有胜利的把握吗？我看没有。没有现代化的装备，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怎么能有把握？没有把握就打起来，打起来了，就由不得我们了。那时，不仅没有把美国顶回去，反而把战火引到我国的东北来，就太糟糕了。”

林彪讲完最后一句话，扫了高岗一眼。高岗在沙发上扭了扭身子。

毛泽东依然静静地听。

彭德怀来了。

彭德怀同近在身边的人握握手，远一点的就招招手，点点头。

毛泽东走过来，握住彭德怀的手：

“彭总，你辛苦了！正在讨论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请恩来给你介绍一下情况。我还得同你谈谈。”

周恩来坐到彭德怀身旁，三言五语、提纲挈领地把朝鲜的局势、金日成来电以及同志们的不同意见，向彭德怀作了介绍。最后，周恩来说：

“你听听，会上还有人要讲的。”

会议继续进行。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也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赞成出

兵的理由，基本上也就那么多，有的换了说法，如不说没有空军、海军，而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不说我们的装备不如美国，而说美国有九千多万吨钢，我们只有几十万吨。结论呢？有的干脆说不出兵，有的用缓和的口气说：是否暂不出兵。

总之，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什么叫“万不得已”？看法又各不相同。

毛泽东觉得大家的意见讲得差不多了，就说：“你们讲的都是事实，也有道理。我只想说一点：一个兄弟邻邦，处于危急时刻，向我们求援，我们只站在一旁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静场。

散会。

散会后，彭德怀被安排住进北京饭店。

那天晚上，他怎么也不能入睡，翻过来，睡不着，侧过去，还睡不着。他想，咱这大半辈子，不是马背就是土炕，要不就是行军床、木板床，今天睡这沙发床，咱没这福气，消受不了。

他从沙发床搬到地毯上睡。

在地毯上也睡不着。

……

美国钢多我们钢少！打败蒋介石，我们有几块钢？还不是蒋介石把美国的钢送到我们手上来啦？

美国有了侵略我们的借口？帝国主义要打我们，找个借口还不容易？什么借口不行？老虎要吃人，是看它自己的肠胃，什么借口不借口？！

不是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吗？不是说社会主义阵营吗？人家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向我们伸手求援，我们却袖手旁观，这还算是兄弟？还叫社会主义？

美帝国主义占领了朝鲜，同我们隔水相望，又控制台湾，威胁上海、华东，我们怎么安心搞建设？

美国侵略朝鲜，还想打过鸭绿江来，速战速决对它有利。我们就用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对付它！

我们打日本的时候，手里没有全国政权，一块钢也没有，现在全国政权在我们手里，总还有几斤钢吧！过去行，现在怎么就不行？！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这个“道理”，如果不同眼前的局势联系起来，还是个“道理”，如果同当前朝鲜的危急局势联系起来，这些“道理”还能成立吗？我们究竟是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

“你们讲的都是事实，也有道理。我只想说一点：一个兄弟邻邦，处于危急时刻，向我们求援，我们只站在一旁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毛泽东这几句话，在彭德怀心里翻腾了几十遍。他领悟到这是爱国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思想，是大丈夫气概！

一股战斗的豪情，在彭德怀胸中涌动而澎湃起来，转眼之间，便“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了！

10月5日上午，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

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意见一拍即合：

一、出兵援朝，非常必要。

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美国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里去，就当我们晚胜利几年。

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征的任务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没得说。”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拍板：彭德怀同志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彭德怀、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发布命令，要点如下：

(一)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彭德怀同高岗登上了由北京去沈阳的飞机。

坐定以后，高岗先开了口：

“彭总，这次你可是辛苦了。”

彭德怀胸有成竹，语调轻松：

“从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到现在，休整了快三年了。那时怎么样？人家不也是天上有空军，地下有机械化？我们不就是一支步枪加几十发子弹？人家

二十三万，我们才两万五千。”

在出兵不出兵的问题上，高岗持反对态度；后来彭德怀受命挂帅出征，高岗自然也觉得这位热血将军过于“热”。但是，他打内心深处对彭德怀更增加一层敬佩之情，却也是良心话。因为，他自己的心思，他自己最清楚。现在，在此时此地，彭德怀提起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却深深触动了高岗。他虽然没有参加那场保卫战，但那块黄土高原，是自己的故乡呀！他究竟是在故乡的土地上，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革命的戎马生涯的。一种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对逝去的战斗岁月的怀念之情，不期而然地从心头升起。

“不出兵显然是不对的。”高岗这话，不知是在责己还是责人，“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彭总！”

彭德怀友好地望着高岗，说：

“那一半还得靠你呀！我们再有本事，也不能饿着肚皮，用木棍捅吧？”  
彭德怀指的是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希望高岗能做好。

高岗立即回答：

“用彭总的话，就叫‘没得说’！”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毛泽东很重视高岗，并且使高岗充分发挥作用。

当时，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方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毛泽东给志愿军下达指示和命令，大部分是发给他们的。电文的台头，有时是“彭，并告高”，有时是“彭高”，有时是“邓洪韩解并告彭高”。

1950年10月24日，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全文是：

高岗同志并告彭邓：

六十六军先头师到安东后，请即令其前进控制新义州铁山线（暂不

去宜川），如敌来攻则阻击之，巩固该线于我手中。该军主力位于安东，在该军未与彭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请你予以指挥。该军应即编入志愿军序列，请你将志愿军的各种办法指示他们。

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高岗处在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的位置上，发挥着相当于“二传手”的作用。

毛泽东正式发布志愿军入朝的命令是 10 月 8 日。从 10 月 9 日至 10 月



彭德怀在抗美援朝前线

31 日这 23 天之中，毛泽东给彭德怀、高岗等的电报就有 31 封，最多的是 10 月 26 日，一天发了 6 封。

毛泽东的电报中，多次出现这样的话：

请高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11 月 9 日）

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十二月中旬有几万人补入部队。（11 月 30 日）

明年一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12月13日）

增加汽车，速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请高岗同志设法解决。（12月21日）

应该说，高岗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交代的任务，是完成得不错的。

1951年1月25日，在朝鲜前线，在一个很大的矿洞里，召开中朝两军高干会议。会上，彭德怀作了报告，金日成和高岗都发表了讲话。高岗说：我是一个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人员。因为住在后方，对前方的情况不了解。关于战争准备问题，中心是把前方需要的物资运上来。历史上有好多部队由于供应不上而遭受挫败的。为此，东北局已拿出6个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已拿出4个部长专门做后勤工作，以保证供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紧抢修铁路；必须赶修机场；必须从各方面以各种办法与敌人的空军作斗争；必须增加汽车部队，改善管理，提高运输能力，按实际需要配备大车、手推车，弥补火车、汽车的不足；必须加强后勤部门。在以上工作中，应特别注意抓紧抢修铁路与机场，以及加强运输的计划性。

1951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一周年的时候，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功勋，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

彭德怀在受勋后说：“我彭德怀去接受这个勋章，是作为志愿军的代表去接受的。”“如果真要论功行赏、授勋的话，应该授给两个麻子，前方应该授给洪学智，后方应该授给高岗。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为我们志愿军搞后勤的，他们的工作是最艰苦的，他们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没有他们的大量的艰苦的后方保障工作，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

胜利。”

彭德怀的这些话，一半当然是谦虚，一半也是实情。

抗美援朝前线物资需要量之大，一般人是很难想象的。这里仅举两例。

1952年夏季，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坑道作战以后，在坑道里，除了潮湿而外，最大的问题是终日不见阳光，只能靠灯光照明。由于事先缺乏准备，用的灯五花八门，有用搪瓷碗、茶缸做的，有用罐头盒、炮弹壳做的。在这些器皿上，放一条棉花拧成的灯芯，灌满豆油，就成了灯。据计算，一个排，60多米长的坑道，要点8盏灯，一个连至少要点30多盏。某部9连，驻守16条坑道，总长600多米，每月耗油400斤。一个军在一个月内，光点灯的油就要10万斤。

这10万斤油怎么来的？

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此次战役中，在3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敌人投入兵力60000余人，火炮300多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共发炮弹190多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为了我军坚守阵地，在43天的战斗中，后方供应各种物资16000吨，实际消耗11000吨。其中，仅弹药一项就达5000多吨，平均每天120吨。

43天中的16000吨物资，又是怎么来的？

这些，当然离不开高岗的决策、筹划、调动、指挥。

然而，战争进行过程中也曾暴露出高岗的阴暗面。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连续作战两个月，打了三个战役，三战三捷。美伪军丢枪弃炮，狼狈逃窜。1月4日解放了汉城，8日又攻占仁川，将敌人赶到三七线附近。美军威风大减，我军士气大振。

英勇无畏、足智多谋的彭德怀察觉敌人有“诱我深入”的意向，于是下令：停止追击。

有些人，在挫折面前会吓昏头脑，在胜利面前又会冲昏头脑。当彭德怀下令“停止追击”的时候，有人质问：现在敌人望风而逃，连汉城也不要了，你们为什么要停止追击？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国鬼子赶



1950年11月15日在大榆洞商谈中朝军队联合指挥问题。左起：高岗、金日成、彭德怀

到海里去？

当时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甚至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坚持要我们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大海。

彭德怀断然回答道：

“不要管他，我对人民负责，错了我承担责任。”

不料，固执的拉佐瓦耶夫竟然把这件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

彭德怀知道后，便给毛泽东发电报，申述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回电，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说彭德怀的意见和做法是正确的。斯大林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以后，拉佐瓦耶夫

就被调回国去了。

中国也有一个拉佐瓦耶夫式的人物，这就是高岗。他的头脑，曾经被困难吓昏过；这时，也被胜利冲昏了。他当时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人讲：

“彭老总这是怎么啦？应当乘大好形势，立即解放全朝鲜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抓住时机，一举歼敌，真是岂有此理！”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多月以后，高岗的热情就开始下降了。特别是到了1951年春末夏初，朝鲜战争出现相持局面，高岗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与敌人相比，在技术装备上我们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等等问题，又在高岗心里翻腾起来。尤其到了我全线部队不得不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以迟滞敌人进攻的时候，高岗悲观极了，又觉得他当初认为不能出兵打这场战争的看法还是对的。

“我为什么不坚持呢？为什么不明明白白站出来反对呢？确实存在很多很多困难嘛，后勤供应也是困难重重嘛。我们在物资的生产、征集、调配、运输方面，想了多少办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前线的作战部队，仍然经常没有粮食、没有弹药。彭德怀在前线多次大发雷霆。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或者还要继续闹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怨谁呀？怨我？当然也怨我，怨我没坚持。人家不正确的意见倒是坚持了。都怨，怨不正确的意见坚持了，怨正确的意见没有坚持。

“你看人家林彪就敢说，叫他挂帅，他也敢顶住，不去。现在的事实证明，林彪是对的，是有远见的。他现在真的‘乘凉’了。我当初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可就是没有人家那个‘敢’字，那个‘硬’字。怕什么呀？自己放弃了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而且是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在这么紧要的关头！我当初……唉！”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岗这时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公开讲出自己的意见，没有公开顶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为自己庆幸了，幸亏当时没有公开讲出来，没有公开顶，包括他不主张出兵的意见，包括他主张一鼓作气把美军赶到海里去的意见，包括他后来的后悔，要是一次次在当时都公之于众了，而不是仅仅在少数人中间嘀咕，那局面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苏联驻朝

鲜大使不是被调回国去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就都难说了。

然而，高岗毕竟是高岗。

高岗自有高岗的才干。

高岗自有高岗的运气。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1951~1952年（特别是1951年）间，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运动和斗争。而这些重要的社会事件，都有高岗的参与、作用和影响。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自1951年上半年志愿军取得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就没有像前面的两次战役那样作更多的具体部署和指挥了，只是对战略性问题作出决策。例如，6月间，金日成来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关于朝鲜停战问题。其后，中央委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苏联，向斯大林表明中朝方面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7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指示应在准备谈判和谈判期间，“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并指出，“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因我方有充分准备，敌人未能得逞。

关于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问题，高岗于1951年10月14日向毛泽东作了报告。高岗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渐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对单干户在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要帮助解决，不能有任何歧视和强迫。毛泽东认为高岗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并指示要印成小册子，发给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

关于镇反问题。东北军区党委于1951年4月8日作出在东北军事系统

内执行镇反工作的计划，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认为“这个计划很周密恰当”，并批转各大军区注意研究，作为参考。5月21日，毛泽东又批转东北军区党委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是根据最近中央指示而规定的方针和办法，除时间一点外，各区均应当照此办理”。

1951年11月1日，高岗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并呈报中央。高岗在报告中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其要点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第三，反贪污蜕化是复杂尖锐的斗争；第四，已弄清的问题及时处理；第五，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推动运动前进；第六，以强有力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助手，深入检查，反映情况，协助领导机关指导运动。

毛泽东于11月20日为中央起草转发高岗报告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

12月1日，中央又正式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各大区中央局负责人的电报中又讲到：“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从11月下旬开始到年底，毛泽东为指导“三反”斗争写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信件，还批转了大量报告。毛泽东指出：要通过这场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实现七届二中全会关于“防止腐蚀”的方针；开展“三反”，要形成社会舆论，要抓住典型的重大案件的处理，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

在党中央的推动下，“三反”运动迅速地在全国开展起来，至1952年初，同反对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

济情报的“五反”斗争相配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必须坚持不懈地同各种腐败现象进行斗争，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个运动，清除了我们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

“三反”运动开展后不久，有一个轰动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刘青山、张子善，是天津地委前后两位书记。刘青山，1931年入党，参加过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2年入党，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刘、张二人，确曾是我党的优秀干部，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但是，进城以后，他们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他们利用职权，盗用公款；

他们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

他们破坏国家政策；



审判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现场

他们盘剥民工；

他们腐化堕落，拒不悔改。

在他们的罪恶被揭露出来以后，中央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法院判处刘、张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到薄一波。他对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是，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去反映一下。

薄一波说：你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找毛主席。

黄敬说：我不去了，你一定去一下。

薄一波只好找到毛泽东，如实转达了黄敬的意见。

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有资料显示，三反、五反运动中，共查出贪污分子 120 多万人，2 万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其远见超过常人。早在 1949 年 3 月 23 日离开西柏坡向大城市北平开拔时，就断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还可以回溯得更远。1945 年黄炎培先生访问过延安。有一次，毛泽东问他的感想怎么样。黄先生回答：“我生 60 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

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这就是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新路”。

高岗又如何呢？他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吗？

直到1952年上半年，高岗的名字还发着光。

在东北，有人一口一个“高主席”地称呼他了。

有人说：高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还有人在下面称高岗为“英明领袖”，东北地区，要“在英明领袖高岗领导下前进”。

对这些，高岗都觉得十分惬意，如浴春风。

195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沈阳市举行群众集会并游行。游行队伍抬着的领袖像中，就有高岗的画像。

高岗站在观礼台的正当中，看见了自己的画像。他说：

“嗬，抬个大麻子干什么？！”

一句戏言，暴露了高岗心中的一切。

## ■ 同高岗接触过的女性，多少人有口难言，或敢怒而不敢言。

1971年夏天，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说：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 50 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 10 次。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 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 1930 年 6 月到 9 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 年到 1931 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据说，罗章龙对毛泽东这些话，作过别出心裁的“注释”：

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上面是两个“目”字，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就是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我罗章龙的“罗”字，头上顶着个“四”字，就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1980 年 3 月 19 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讲到所谓 10 次路线斗争。他说：

“过去常说 10 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事实证明，这些“路线斗争”，有些是完全搞错了，不能算了；有的谈不上有什么“路线”，就是说，是一次“斗争”，进行这个斗争是正确的，但犯错误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人们也都知道，在这些斗争中，对于那些代表人物的揭露和批判，都没有涉及私生活问题。这似乎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

然而，唯独对高岗是例外。

1954 年 2 月，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于 2 月 25 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发言的提纲，后来送毛泽东审阅过。这个发言提纲中，就一再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

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的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除周恩来以外，还有好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如：

高岗的私生活腐烂透顶。高岗极端腐化的生活和无法无天的流氓恶霸行为，长期无人揭发。

很长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是腐化的，进入城市以后，更采用各种卑鄙手段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在道德上极端堕落。

高岗诱奸、强奸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简直和军阀官僚淫乱的生活同样，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党的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用这样的语言，讲到一位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私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独一份儿”的。

其实，50年代初期的东北，在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于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如果不是尽人皆知，也是流传极广的。高岗喜欢跳舞，喜欢在女人中间混。高岗善于也敢于向女人调情。高岗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的桃色新闻很多。一见了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高岗的眼睛就放射出淫邪的光芒，在她们身上的女性特殊部位扫来扫去。

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不少地主资本家和没落贵族，也就是所谓“白俄”，逃到我国东北。“白俄”中的一些年轻女性，实际上过着卖笑生涯。有一

次，高岗在一个“白俄”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第二天，那女人打电话给高岗，向他讨债。高岗放下电话，一个电话打到东北交际处，命令他们向这个“白俄”女人送去一笔不小的“交际费”。



高岗于东北工作期间在沈阳市的寓所

还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外国女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活动。此人爱好男装打扮，身穿皮夹克，头戴礼帽，身材窈窕，风姿绰约。这个女人，是公安局掌握和注意的重点人物。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她突然在舞厅门口出现了。便衣保卫人员立刻警觉起来，走上前去。正想对她进行盘问，发现她向舞厅门里面打招呼，便衣人员回头一看，舞厅里的那人正是高岗。

珍妮被高岗请进舞厅。顷刻之间，便搂着她纤细的腰身，翩翩起舞了。

保卫人员又紧张，又坐蜡。这可怎么办？据内部掌握的情况，这个女人有一枚特殊的戒指，只要这戒指在你身上划上一道，见点血，你就甭想活命了。可是高岗居然把她请进舞厅，还同她跳舞！出了事可怎么办？他又不

能直接去找高岗，更不能向高岗陈述这一切。

保卫人员只好跑回公安局，找局领导反映。

几位局领导经过研究，觉得事关重大，决定由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面，找到高岗，总算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了。

高岗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是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有权有势，“炙手可热”。想玩哪个女人，就把她调来；玩腻了，或者不顺心了，就调走，都是易如反掌的事。这类事，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到了外地，也一样。有一次，高岗在南方一个大城市视察，看见一位漂亮的的服务员，高岗越看越心动，就对一位负责人说：

“这姑娘很不错嘛，调到我们东北局去吧！”

说办就办。第二天，高岗就又多了一个漂亮而年轻的情妇。

高岗在他的住地，经常举办家庭宴会和舞会。他的宴会，带政治性的居多，而舞会，则完全是寻欢作乐。

高岗开始搞家庭舞会的时候，总要让秘书通知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务必请总理光临。

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又调到中央，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周总理听说高岗郑重邀请，曾经高高兴兴地去过。可是，在舞场上，高岗那追逐女性曲线的目光，那粗俗的调情话语，以及同女性互相抚摸的不堪入目的动作，使周恩来不能忍受，就愤然离开舞场，不辞而别。

后来，高岗又多次让秘书通过周恩来身边的人员，邀请周恩来光临他的家庭舞会。周恩来断然回答：

“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也不要参加！”

■ 饶漱石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设计整陈毅。陈毅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饶漱石，1903年生，1975年病死，活了72岁。

饶漱石是江西临川人。临川这个地方，是颇有点名气的。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说的就是这个临川。“临川之笔”，有人说是指谢灵运，有人说是指王羲之，因为谢、王二人都在临川做过内史。到了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也出生在临川。江西省，是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临川，又是一块充满灵气的地方。出生于临川的饶漱石，终其一生，既没有革命者红色的心灵，又没有文人的灵气。

饶漱石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他20岁。

1925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饶漱石26岁，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

1932~1935年间，饶漱石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全总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

1935年，饶漱石赴苏联，任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这时，他才32岁。

1940年夏，饶漱石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1941年1月，随新四军军部转移。皖南事变中，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身份，命令叶挺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谈判，叶挺被扣。

1941年5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

1942年，39岁的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这期间，他为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的发展，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贡献。

1945年6月，42岁的饶漱石，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8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12月，以新四军政治委员身份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年底，中央决定成立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饶漱石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一年，饶漱石才46岁。

1953年3月，饶漱石50岁，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40年代初，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同饶漱石共过事的有前后两任军长，前任军长是叶挺，后任军长是陈毅。

我们这里先讲两个故事，一个是饶漱石和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故事，一个是饶漱石和陈毅在黄花塘的故事。

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14日。

1940年9月，德、意、日这三个法西斯国家，正式结成同盟，英、美等国则加紧拉拢国民党政府。周恩来于1940年11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电报中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

在此种形势下，蒋介石以为时机对他有利，反共活动就更加积极起来，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坚持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必须统统撤到黄河以北。

为什么要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呢？

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恶毒用心，他在1940年11月3日的一封电报中指出：“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毛泽东还指出：“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



建国初期的饶漱石

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当时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新四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次提醒皖南部队注意。当时，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以外，全国上下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同意皖南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多次指示项英应抓紧时间行动。

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下达命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同时，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江南新四军至期仍不北渡，“应即将其解决”。国民党还有意泄露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并令国民党部队在江北加强布防，准备与日军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

皖南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等人，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犹豫动摇，行动迟缓。为此，毛泽东于1940年12月26日，致电项英、周子昆、袁国平：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法无决心，则在顽敌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1941年1月4日夜间，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向南，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

6日，新四军到达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7个师80000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英勇拼杀，血战7昼夜。

13日晚上，新四军部分领导干部和党员，集中在山上竹林里，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

大家心情沉重，没人发言，只听见竹叶在微风中互相磨擦，发出沙沙的声响。

怎么能不心情沉重呢？事情太意外了，不仅战士们感到意外，就是军部的领导人，也是没有想到、没有精神准备的。而且顽军又那么多，我方和敌人力对比，悬殊太大了：9000人对80000多人，几乎一个对十个。国民党部队，由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挺）项（英）”的命令，进行了周密部署。一方有心，一方无意；一方在暗处，一方在明处；一方武器精良，一方武器低劣；一方以逸待劳，一方征途困顿。新四军凭着英勇顽强，同仇敌忾，血战了七天七夜。

现在，已经弹尽粮绝了。

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几个重要领导人，离开了队伍，不知去向。

竹林上面，依然是竹叶互相磨擦发出沙沙的声音；地下是厚厚的、发着灰白色的竹叶层；竹叶层上，露出一段段竹根，像是拱出叶层的一条条毒蛇的脊背。露出的是蛇身的中段，不知道哪一端是头，哪一端是尾，也不知道它是要钻进竹叶层，还是要窜出地面，无论是钻进去还是窜出来，都可以在一瞬间完成，可是又不知道它究竟会在哪一个瞬间动作。

“叶军长，”饶漱石打破沉默，虽然看不清楚，但脸是冲着叶挺的，“你是不是到三战区找顾祝同谈判一下？”

“谈判什么？”叶挺觉得这问题太突然，过了几秒钟以后，才反问饶漱石

一句。

饶漱石说：“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回到苏北新四军里去。”

叶挺说：“我现在是败军之将，身边没有部队，凭什么同人家谈判？根本没有条件嘛！我坚决不同意去。”

饶漱石说：“我是东南局副书记。不是你自己要去，是党派你去的。”

饶漱石这句话，使叶挺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同时也感到一阵隐痛。他语调低沉地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了，至今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我的一个惨痛的教训。这个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不会忘记！”

会场的气氛，在沉重之上又加一分庄严。

饶漱石说：“我会向党中央报告的。”这句话一出口，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念头：“我能不能突围出去，还很难说，我向党中央报告什么？”于是又加上一句：“在座的同志中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证明是党派你去的。”

饶漱石说完这句话，依次看了看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张元寿、王聿先等几位重要干部，夜色中虽然看不见彼此的目光，他们也未必赞成叶军长去找顾祝同谈判，但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向党中央报告真实情况，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一定会做的。

谁也不好说什么——又有什么好说呢？

叶挺也没有开口。

头上仍然是竹叶互相磨擦的沙沙声。

地上也仍然是那一段段拱出地面的毒蛇的脊背。

“事情明摆着，不会有好结果的。”叶挺终于沉重地说，“为了顾全大局，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党的命令。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我的几个侄子叶育青、叶一舟和叶钦和他们，同我一道去。”

饶漱石说：“这个可以，你们互相还有个照应。还可以多去几个同志。”

其他的同志还是什么也没有说——能说什么呢？说什么好呢？

第二天，叶挺带了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黄炳

生、吴振邦，以及两个警卫员，一行十多人，下了山，来到顽军一〇八师师部。

果然，叶挺等被扣押了。

第二天，饶漱石等了一天，叶挺没有回来，与叶挺一道下山的同志，一个也没有回来。什么消息也没有。顽军的包围则照旧。

饶漱石越等心里越发毛，越等越绝望。

午夜时分，饶漱石化装成连队文书，同秘书一道下了山。天明后，还是被国民党军抓获。关押期间，饶漱石动用携带的新四军军费——几根金条和几十块大洋（银元），买通了一个敌军的连长，才逃脱虎口。

饶漱石是这次谈判交涉的决策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争论。这是一。

第二，在当时情况下，向国民党顽军提出谈判交涉，也是可以的。1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转叶挺、饶漱石，指出：“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为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这份指示电中分明指出“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由于当时已失去通讯联络，叶挺等没有收到这封指示电。虽然如此，还是可以说决定叶挺去谈判这件事本身，是符合党中央精神的。

然而，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既然饶漱石是在没有接到党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命令叶挺去谈判的，那么，饶漱石的决定，并不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这样一来，人们就要问：饶漱石作出这个决定，是与党中央精神“不谋而合”呢，还是另有企图呢？可不可以说，饶漱石的决定只不过客观上符合党中央的精神，歪打正着呢？

这，只好留待历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去研究了。

饶漱石和陈毅在黄花塘的故事，就是发生在 1943 年 10 月的黄花塘事件。

皖南事变中，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中共中央果断地在事变发生后的第六天，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941 年 1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



1941 年重建新四军军部后，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与奥地利籍医生罗生特（中）在苏北盐城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几次提出调刘少奇从华中新四军军部回到延安。1942 年 1 月 13 日，中央又电告华中局：“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启程，望告。”

1942 年 1 月 20 日，在苏北阜宁县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对他回延安后的工作，作了如下交代：

“……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指：即陈毅）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毅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毅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离开华中，踏上了赴陕北的征途。

刘少奇走了一个多月以后，华中局与军分会决定饶漱石到淮南检查二师的工作。饶漱石行前，与陈毅联名通知各师及各区党委，饶已外出巡视工作，大约三个月后方能返回军部，在此期间，华中局书记及政委职务，由陈毅代理。

刘少奇离开华中时交代，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饶漱石代理；现在，饶漱石出巡，又交代由陈毅代理。陈毅便是“代理的代理”了。

陈毅这个“代理的代理”，集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于一身，十分认真负责，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干部战士，各得其所。

9月中旬，饶漱石巡视完淮南的工作，回到军部，陈毅便将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的工作，向饶漱石作了交代，饶漱石仍然是华中局代理书记和代理政委。

半年以后，问题出来了。饶漱石和陈毅前后两任代理书记和代理政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大干部战士中议论纷纷。

“我们的前后两任‘代理’，前一任比后一任差多了，后一任比前一任强多了。一个别别扭扭，一个顺顺当当。”

“可不是吗？少奇同志走的时候，让他代理而不让陈代理，我就纳闷儿！”

“这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不是‘何必当初’，是‘当初何必’！”

这些议论，陈毅也有所耳闻，但他是个坦荡的人，没往心里去，也没当回事儿。

但是，这些议论传到饶漱石耳朵里，却非同小可了。他在精神上感到一

种沉重的压力。这压力使他感到气闷，感到痛苦，感到恐惧。还有什么？羡慕？嫉妒？报复？总之是，有些儿酸，有些儿苦，有些儿怨，有些儿恼，或者一下子说不清。

1943年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饶漱石翻到了1942年秋天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个文件，触动了饶漱石的内心深处，引起了惊恐和震动：中央提出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位置将更加重要。屈指算来，从刘少奇走后，我饶漱石代理书记和政委，已经10个月多了，就是刨去出巡3个月，也有半年多了。辛辛苦苦这么长时间，至今头上还顶着一个“代”字。“代理书记”的帽子，只要有一点微微的风，就可以吹掉，正儿八经的书记将来会是谁呢？

从其他地区调来一个？这个可能性有，但不大，各地都需要干部。再说，深入了解一个地区，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办得到的。八成得从本地区选拔。在本地区，在华中，在新四军军部，谁能成为饶漱石竞争的对手？

陈毅！只有陈毅！

是陈毅又怎么样？

还是“先小人、后君子”吧，先狠狠地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制服他，制服得了就跟我走，就听我的；制服不了，你就走你的。

看来，只能如此了。

等待时机吧。

不料，时机没有等到，倒是又发生了一起令饶漱石极为憋气的事。

1943年3月中旬，我新四军正在苏北地区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反“扫荡”作战，而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却率总部特务营和保安第三纵队王光夏部，两渡运河，侵入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中心地区。为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新四军多次对韩德勤提出劝说、警告，均无效果，韩德勤反而下令捕杀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人员，收缴地方武装的枪支，抢夺老百姓财物。

在此情况下，陈毅迫不得已电令我四师主力及其他部队，向韩德勤发起攻击，并明令如在俘虏中有韩德勤，应给予空隙让他逃走。

韩德勤所率部队，很快被击溃，王光夏被击毙。在查询俘虏时，我方人员向一位军官询问：

“你是不是韩德勤？”

对方回答说：“不是。”

“你认识韩德勤吗？”

“不认识。”

我方人员便将他当作一般俘虏予以释放。这时，这位军官忽然又主动招认自己正是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他怕混在一般俘虏中释放，安全没有保障，同时表示要求会见我四师师长彭雪枫和政委邓子恢。于是，我方人员把他带到师部。到了师部，韩德勤一会儿要吞火柴头，一会儿拒绝进食，一会儿要写遗嘱，表示要“杀身成仁”。四师领导同他谈话，他痛哭流涕，倾诉他到苏北的苦衷，并表示要见新四军军长陈毅。

陈毅听取了四师领导的汇报，结合当时全局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最后说：韩德勤被俘后，最害怕我们杀他，后见我们不杀，就又力争保住自己的江苏省主席职位。韩的多方哀求，就为这。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韩德勤现在没有什么力量了，汤恩伯的反共实力比韩德勤大得多。汤恩伯听说韩德勤被我俘虏，就想当江苏省主席，汤当了省主席，就会把他的武装主力开来，这样对我们反而不利。因此，我们最好是快些释放韩德勤，在蒋介石还没有下决心撤换江苏省主席之前就放韩德勤出去。放出去以后，可以增加反共派内部矛盾，为我所用。

陈毅将他的这些考虑，致电华中局和中共中央，请求指示。

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复电陈毅：“我们主张暂不释韩。”

中共中央电复陈毅：同意按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德勤问题。

饶漱石在释放韩德勤的问题上，又丢了重大的一分。1940年夏天，陈毅指挥的黄桥决战的胜利，为打开华中的局面做出了出色贡献，使新四军获得了重要的基地。现在，又正确处理了韩德勤问题，饶漱石便更加觉得是火上加油。

饶漱石要对陈毅实行“先小人、后君子”的决心，更加急不可耐。

终于，时机到了。

1943年4月上、中旬，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并接连下达指示：

“自1942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他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央的指示还指出：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党内生长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内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

饶漱石几乎是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中央的这些指示，并且一个字一个字地同陈毅的一言一行挂钩。饶漱石费尽心机，冥思苦想，掂量来，掂量去，最后落实在1929年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七次党代表大会问题上。

“对，就从这里入手！”饶漱石决心已定。

那么，怎样一步步付诸实践呢？

饶漱石整整想了一天一夜，才找到了一种理想的方法和步骤。

第二天上午，他叫秘书约军部机要员小李和小吴，到他的办公室来。

两个年轻的小干部坐在饶漱石办公室的板椅上，饶漱石亲自向他们布置任务。

“最近，党中央号召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斗争目标是党内的自由主义。党中央真是了解下情，英明决策，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军部，不就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吗？我们的军长就是一个。”饶漱石为了使这两位青年干部的思想能紧紧跟上，故意没有点陈毅的名。“当然，陈毅同志是好同志，少

奇同志讲过嘛，他是我们党内很好的领导者。但是，好的领导者不一定没有自由主义，而且，中央指示里特别指出许多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走到哪里都不怕。”

饶漱石扯起了这面义正词严的大旗以后，又说：

“军长向很多人讲过，在井冈山时期，他主持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就把毛主席选掉了。你们说说，这样的事情，能在下面到处乱讲吗？这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今天我找你们两个来，就是要你们把你们听到的关于红四军‘七大’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这几天你们可以把其他工作让别的同志做一做，同你们科长讲，就说 I 给你们交代了别的任务。当然，整材料的事不要声张，倒不是怕什么别的，是声张出去不好。你们如果要找人核对一些他讲的话，也要自然一些，像讲个笑话似的，不要一本正经地像进行一项严肃的工作。”

这两位年轻干部，一会儿紧张、一会儿轻松，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地接受了任务。

5 天以后，一份题为《陈军长谈红四军党的‘七大’情况》的材料，摆在饶漱石的办公桌上。材料的全文是：

陈军长说：

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1927 年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后，朱德同志和我带领一部分起义的部队，从三河坝转战到湖南。1928 年 4 月，会师井冈山，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主席任党代表。

1928 年 9 月，红四军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根据地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但是，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也更加严重。这样困下去可不行啊，前委便决定彭德怀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而朱德同志和毛主席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外线作战，毛主席任前委书记。1929 年 1 月至 4 月，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了，

但随之问题也出来了。红四军党内和军内，都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这些错误思想，涉及到如何建军、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如何建设根据地、红军武装斗争的原则，以及“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等重大问题。

1929年4月，中央派刘安恭带来了“二月来信”，信中的一些悲观情绪和不正确观点，加重了红四军内部的错误思想，激发了某些争论。刘安恭刚从苏联学习回来，思想上完全是“照搬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刘安恭的作风是热衷于抓权和搞宗派主义。他搞了一些非组织活动，在红四军干部、战士中造成极大混乱，甚至引起一部分人拥毛、一部分人拥朱的不正常派别现象。

陈军长说，就是在这种思想分歧巨大的时刻，前委决定6月份在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

陈军长说，在当时，他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于是就由他来准备这次大会。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期望能在他的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于是满怀希望找陈军长谈话，要求陈军长支持他，使大会能做出一个好的决议。但是，陈军长对这些争论的意义认识不足，非常害怕红四军分裂，宁可息事宁人，也不愿意争论。另方面，陈军长自己也是血气方刚，要表明自己有独立见解，不愿意接受毛主席的意见。

红四军党的“七大”于6月22日召开，陈军长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报告一开始，表达了他自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对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某些错误思想的看法，等等。陈军长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赞同毛主席的主张的，但思想深度上要差得多。

陈军长说，但是，他的话题一转，就对朱德和毛主席提出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采取姑息态度。他又批评毛主席有个人英雄主义，采用家长制领导方式。毛主席经常说，“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去创造。”这本来是正确的观点，而陈军长说这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陈军长说他还批评毛主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强调只要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陈军长说，他的这些话，表现了他当时的思想水平，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是很模糊的。陈军长在大会上还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那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

陈军长说，他是很敬佩毛主席和朱德的，但是他认为革命同志是可以批评的，所以他才在会上讲了那些话。

陈军长说，朱德是忠厚长者，听了他的那些话，没有讲话。而毛主席则在重申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之后说：“至于陈毅对我个人的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

陈军长说，他的报告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会议结束时选举前委书记。毛主席原来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结果没有当选，陈军长自己被选上了。陈军长在谈到这里时说：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就不知道，到了那个位子上一干，前后一比较，就觉察出问题来了。

“七大”以后，毛主席对陈军长很失望，愤而离开红四军，到闽西蛟洋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去了。

“七大”刚刚开完，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陈军长说：我并没有意识到毛主席对我的愤慨，仍然把毛主席看作自己的上级，和朱德一起赶到蛟洋召开前委会。会议决定由我前往上海。我请毛主席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毛主席拒绝了。他说：“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这时，我才感到问题有些严重了。临去上海前，我又专门去请示毛主席向中央汇报什么，毛主席只是淡淡地说：“请中央有机会到苏区来看看，鼓舞鼓舞士气。”看来，这时候已经是话不投

机了。

陈军长7月下旬化装去香港，由香港转道去上海。一路之上，陈军长多次听到群众议论“朱毛”厉害，才知道红四军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苏区，已经在全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陈军长说，他8月下旬来到上海，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不得不频繁变动住地，等待中央来人接头。有一天，在五马路的新蜀旅馆，一位蓄着胡须、戴着墨镜、身穿长衫的人来了。这位商人模样的人摘下墨镜，陈军长喜出望外，差点高兴得跳起来——这位“商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在中央分管军事工作。

陈军长说，这以后，他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七大”的情况，又参加了一些会议。这些活动，使陈军长看到红四军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因而也使他认识到“七大”选掉毛主席是一个大错误。周恩来对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并明确指出：朱德、毛泽东仍在前委工作，毛泽东应该仍旧任前委书记。他任前委书记，中央本来就明确指示过。这一点，应该使红四军全体指战员了解，并且接受。

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毅、李立三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陈军长说，他根据周恩来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信，就是中央的“九月来信”。这封“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交陈军长带回红四军。“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还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信中还强调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陈军长说，临回苏区前，周恩来对他说：“中央要求你去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你怎么样，会介意吗？”陈军长回答：“请中央放心，我一定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

陈军长说他经过粤北时，见到了朱德。他向朱德简单说了一下到中央开会的情况，重点说了一下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要请毛泽东回来

领导。

朱德当时说：我个人服从中央的指示。老毛那边，你欢迎他回来，他愿不愿回来，还很难说。

陈军长信心很足，他说：这我可以负责。

朱德说，你负责，他最不满意的就是你，你知道吗？你走了以后，我们又开了个“八大”，很多政治工作人员要求毛泽东回来工作，我们就去找他。他不愿意回来，还写了一封信。

朱德就把那信找出来给陈军长看。信中的这样一些话，是陈军长没有想到的：“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陈军长说他看到这里，脱口喊出一句：“我陈毅哪来的什么‘主义’嘛！”陈军长还说，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七大”对毛主席伤害得厉害，一方面心里难过，一方面欣赏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他硬是寸步不让。陈军长看完信对朱德说：我去向毛主席检讨，我相信他会回来的。

一回到苏区，陈军长就派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主席，还附上陈军长的一封信，请毛主席回来工作。不久，陈军长又写一封信去，信中再一次明确地说：“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也不好。请见信后即准备回来，我们派人去接。”

11月底，毛主席回到了红四军军部，陈军长再一次作了检讨，承认在“七大”时犯的错误，毛主席也承认因为情绪不佳，“八大”时那封信，说了些伤感情的话。

陈军长还讲到，毛主席很欣赏中央“九月来信”，问陈军长是谁写的。陈军长说是大家讨论，主要是周恩来的指示，由陈军长起草，周恩来看过，一字未改，就通过了。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说，想不到陈军长的思想提高得这么快。

陈军长说，那以后，他同毛主席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

听取意见，讨论如何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精神。12月，由陈军长主持在上杭召开了古田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同志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部队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陈军长说，古田会议后，他找过毛主席，说他在上海的时候，中央曾考虑安排他到其他根据地工作。他当时表示，要把毛泽东请回来以后，再考虑自己的工作问题。他问毛泽东，现在你已经回来了，我是不是可以走了？毛主席坚决地说：“你哪里也不要走，就留在这儿。”

这份材料并不算短，但饶漱石看得很仔细、很认真。看完后，他想了一会儿，便叫秘书找来机要员小李和小吴。

两位小干部，像交了答卷的小学生等待老师的评判，望着饶漱石这位首长的严肃表情，心中有几分骇怕。

饶漱石终于说话了：

“这份材料，写得还可以，是不是找了一些人？”

“找了，找了好几个。”小李和小吴抢着回答。

“看来还不完全，还有遗漏，有重要的遗漏。”

饶漱石说到这里，又不响了。

两位小干部心里的小鼓敲得咚咚响，不敢吱声，眼睛直愣愣地望着饶漱石那张圆呼呼的、没有棱角的脸。

“你们听没听说过，红四军‘七大’最后选举前委书记时，赞成毛主席的票数和反对毛主席的票数相等，只差陈军长这一票，而他就投了反对票？”

小李瓮声瓮气地说：

“我听胡旅长的警卫员小高说过，我记不清。这次我们两个去找小高，小高直问：‘你们干什么？！’吓得我们什么也不敢说。我们就……没写上去。”

“这些话，他散布的范围可能更小一些。”饶漱石说到这里，又不响了。

“他是讲过的，我就听见过。你们还是把这一段加上。”饶漱石过一会儿

又说。说完后又不响。

“还有，”饶漱石又说，“不一定前后顺序、逻辑性那么强，像个报告稿。也不一定一口一个陈军长、陈军长，称同志也可以，只写名字也可以嘛。”饶漱石把那一摞材料推到桌边，又加一句：

“你们照我说的改一改。如果再没有别的新材料，就抄清楚，把这份烧掉。”

两位小战士站起来，说了声“是”，拿起材料，转身走出了那间气氛森严的办公室。

饶漱石干起这种事来，真是按部就班，得心应手。材料是准备好了，就是说，坑已经挖好，弓弩手已经埋伏好，下一步就是引诱对方入彀。

6月中旬的一天，陈毅正好回到新四军军部。饶漱石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亲自登门去拜访陈毅。

饶漱石说：“最近，中央作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提倡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正确的领导，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特别是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农村调查》，更受启发。我对农村情况不太熟悉，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调查，而农村问题，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所以，我想最近到基层去，好好进行一些调查和研究。”

“这很好嘛！”陈毅没等饶漱石说完，就用浓重的四川乡音答上话了，“你们当书记的，对中央的指示就是说干就干。我这个拿枪杆的，何尝不要深入调查研究？可我现在对农村只是走马观花哟！”

“别的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饶漱石也没等陈毅说完，就接过话茬，只要陈毅已经同意他去，这就够了，他不愿意听陈毅一打开话匣子就没完。“就是整风工作，你得主持一下，按照中央的精神，向干部动员一次，特别要注意解决好领导的问题。”饶漱石作了郑重交代，最后还添上一句，“我去的地方不远，就是40多里地的大刘郢农村，有什么事很快联系得上。”

“好嘛好嘛！”一向光明磊落、没有心机的陈毅大声说。他哪里知道这个承诺，就意味着自己向那个陷坑开步走了。

饶漱石第二天离开军部。临走前，他对自己信得过的几个干部交代：整风中，如果意见尖锐激烈，就马上通知他。

饶漱石走后，陈毅按照他的一贯作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抓起了工作。

下面有些干部又议论：

“别别扭扭去了，顺顺当当来了！”

懂点古文的就说：

“这叫‘似曾相识燕归来’！”

对于整风，陈毅也不例外。

开始是动员，动员完了学习文件，文件学完了就动真的，向华中局和军部领导提意见。

8月中旬，陈毅召集直属队领导及司令部、政治部的部长、科长开座谈会。座谈会在参谋处作战室举行，主要是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

与会同志真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因为大家敞开了思想，彼此的发言互相启发，会议越开越热烈，经常出现几个人同时说话，一个比一个嗓门高，不知听谁的是好的局面。

不知不觉中，大家的发言越来越集中了，政治部的部长们，摆出了一件又一件事实，说明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而说来说去，焦点集中到兼任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身上。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有些人说完了还要求再说，时间不够了，陈毅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再找时间接着开。并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集中，分成若干问题进行整理，以便上报中央和中央军委。

第二次会开得更加热烈，除了摆出具体事实，还有人在事实基础上提出问题，有些言词相当尖锐激烈，什么“政治部削弱和放弃政治工作是为了什么”，“政治部”是“政治不”，“政治部主任”是“政治不主任”。

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饶漱石突然回到新四军军部。陈毅听说后，就叫政治部秘书长把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的材料，送饶漱石审阅。不料饶漱石连声说：

“早知道了，不用看了！”

秘书长感到诧异，饶代政委在农村搞调查，离军部 40 多里路，机关开会的情况，怎么会“早知道了”呢？

陈毅听说这个情况，也感到蹊跷。陈毅找过一次饶漱石，想听听他的意见。不料饶漱石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地说：现在用不着谈，他还得了解一些会议以外的情况，也就是要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吧。饶漱石还话里有话地点了一句：“我还是相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

陈毅还没有往深处想，更没有往坏处想。“为人没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慌”，他只顾成天忙他分内的工作，做他该做的事去了。

饶漱石也在忙，忙他认为该忙的事。

饶漱石几乎每天都用相当多的时间找人谈话，找华中局的负责干部谈话，找新四军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

饶漱石同各方面的干部谈话，基本问题和路数都差不多，只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对这些基本内容，有的讲得详繁一点，有的简略一点，有的明讲，有的暗示，有的侧重这个方面，有的侧重那个方面。饶漱石谈话的基本路数和内容是：

(一) 这次整风会上发言的情况如何？你对这几次会有什么看法？你在下面听到一些什么议论？

(二) 你知道不知道 1929 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那次会上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性质？

(三) 红四军的“七大”同前一段的整风会，有没有相似、相通的东西？

(四) “皖南事变”中，我军损失惨重，究竟是谁的责任？周恩来 1939 年初到皖南新四军视察工作，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可是，几年没有执行，这难道只要项英一个人负责？

(五) 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对这些问题应当怎么看，怎样对待才算是正确的？

(六) 饶漱石抓这次整风会的问题，找各方面的干部谈话，仅仅是饶漱石个人的意思还是另有来头？

饶漱石在同各方面干部谈话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他所需要的“反映”和“情况”，他都叫那些干部本人写成文字材料，或者通过口头汇总到他的秘书或机要科的小李、小吴那里。

饶漱石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谈话。慢慢地，一股阴冷的气流，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涌动。大致说来，这股阴冷的气流是：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陈毅在部队中排挤党代表、企图取代党的书记职务，不自今日始，而是由来已久的；陈毅反对军队中的政委制度，也不自今日始，也是由来已久的；1943年新四军的整风，几乎是1929年红四军“七大”的翻版；饶代政委抓整风中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受中央委托，要对陈毅算个总账。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陈毅和饶漱石不知怎么见面的机会极少，交谈的机会更少，也几乎没有相见的愿望。有时不得不碰头决定一件什么事情，总是三言五语，说完了各自走人；有时在路上碰见，也只是打个招呼，或者来两句“今天天气……”就擦肩而过。

然而，陈毅慢慢地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头了。很多干部，包括很好的干部、同他关系不错的干部，也都有些异样。他们之中有的见不着面了，有的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了，有的大老远就绕开了，有的虽然说说话，但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有少数关系相当好的同志，也只是不着边际地说些宽慰的话，或者提醒他多加注意，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

慢慢地，陈毅也明白了。他非常气愤！

然而，陈毅究竟是1923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陈毅，究竟是从自己战斗生涯中体味到“创业艰难百战多”的陈毅，究竟是即使死去，也要“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陈毅。对于这样一个陈毅，眼前的一切，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现实毕竟是现实，坑就是坑。既然你已经掉进了坑里，你总得花点力气才能爬得上来。

饶漱石终于找到陈毅，当面摊牌了。饶漱石的摊牌，无非是把在下面暗地里吹的那股冷风，端到了陈毅面前：什么自由主义的不良倾向啦，非无产

阶级思想啦，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路线啦，借整风之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啦，一贯反对政委制度啦，等等，等等。

陈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文过饰非，不管人家上纲上线是思想片面还是居心叵测，只要是他的账他就认账。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他常常闹得很被动。他承认自己有自由主义的东西，承认自己的心直口快并不是优点，而是掩盖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他指出饶漱石背后搞小动作、收集材料不是光明正大，指出他在同志中挑拨离间是别有用心。陈毅还指出饶漱石开始代理新四军政委，工作不熟，缺乏经验，自己热情帮助过他；可饶漱石一旦熟悉了工作以后，就骄傲自满，权力欲也随之增长，对陈毅的批评怀恨在心。陈毅还着重质问饶漱石：明明说是要下农村搞调查研究，为什么突然回到军部？这个行动究竟说明什么，意味着什么？陈毅虽然觉得这个问题未免是诛心之论，未免管得太宽，饶漱石只用一句“你用不着管”就能应付过去，但他还是要揪住这一点不放。奇怪的是，饶漱石并没有用“你用不着管”来应付他，相反，饶漱石倒是被质问得有些慌乱。

就这样，新四军的代理军长和代理政委，唇枪舌剑，交战了一个通宵。

几天以后的下午，新四军军分会举行会议。会上，首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个会，实际上是饶漱石组织、策划和煽动的对陈毅的一次斗争会。所谓“黄花塘事件”，就是指这次会议，因为发生的地点是在苏北盱眙县黄花塘。

饶漱石借陈毅作了自我批评、大家发表意见之机，抛出了所谓陈毅有“十大错误”的材料，陈毅针锋相对，逐条进行驳斥，并且当众警告饶漱石：

“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黠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会议结束后，饶漱石立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出长达 1500 字的电报。电报内容无非是：

(一) 捏造事实，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说陈毅在干部战士中散布，他陈毅从来就看不上毛泽东，早在 1929 年红四军中，就敢于同毛泽东唱对台戏，敢于在“七大”上当众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在选举前委

书记时，敢于投毛泽东的反对票。陈毅还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连毛泽东这个政委他都瞧不上眼，刘少奇又算老几？

(二) 夸大事实，认为“皖南事变”我军失利，责任不在项英一人，陈毅应负同样责任。因为中央于1940年1月，就指示“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但陈毅没有执行。

(三) 歪曲、夸大和捏造事实，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多名部长科长开会，公开批评政治部、批评华中局、批评饶漱石，说政治部是“政治不”，政治部主任是“政治不主任”；对刘少奇，陈毅都可以说：你算老几，对饶漱石，连“你算老几”都不须问了。

(四)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工作，已经无法正常开展，干部的思想，出现极大的混乱，希望中央从速决定派遣德才兼备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还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

这个电报发出以后，饶漱石还担心力量不够，于是又煽动和蒙蔽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一方面，饶漱石致电中央这件事，陈毅有所耳闻，另方面，他觉得黄花塘发生的不是一件小事，应当向中央报告。于是，陈毅也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一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陈毅，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的经过，还着重检讨了自己说话随便、不顾后果等缺点错误。最后，还息事宁人地表示：“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常有：你光明磊落地对待人家，不存任何戒备，人家偏偏背后使绊子，对你落井下石。那些人又偏偏活得自在、滋润。你有什么办法？

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回复：

陈毅同志，并告饶：

(一) 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 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

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吃过早饭就离开黄花塘，踏上了西去延安的漫漫长路。

陈毅走得冷冷清清。

陈毅的夫人张茜和两个孩子，离开军部到后方医院去了。老战友陈丕显特意前去看望，还代表苏中区党委送给张茜母子数百元法币，帮助解决当时的困难。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陈毅走后，工作人员收拾陈毅的屋子，发现壁橱里有一副围棋。

这时，饶漱石正在召集一师、苏中区党委以及各地委、专署的负责人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做“解释工作”。他听说发现了围棋，便当众说：

“嘿，围棋呀！——其实，围棋我也会下，但是我不下，因为一下起来，就忘乎所以，太费时间，耽误工作。耽误了工作就不好了。”

大家明白饶漱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饶漱石接着对大家说：

“军长为什么走，因为他反对我，结果很多同志就反对他。本来，一文一武，应该合作得很好。文武合作得好该多好呀！可惜，只有我愿意，他却不肯。

“他走了就走了吧！我们是军部，不是营团，我们只管战略问题，军长不在不要紧。希望大家安心工作，我相信只会工作得更好！”

行程数千里，费时近百日，陈毅于1944年3月7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陈毅一见到毛泽东，有满腹委屈急于倾诉。因为毛泽东既是他的老战友，同时，在毛泽东面前，他找到了作为下级和学生的感觉，他要向毛泽东一诉衷肠，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然而，毛泽东却机智地给他浇了一点冷水。毛泽东说：

“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按：即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看为好。”

陈毅爽快地回答：“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一个星期以后，善于知人的毛泽东对陈毅说：

“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观察和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说：“这样好，我照办。”

毛泽东和陈毅一拍即合。

黄花塘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是怎么处理的呢？他对陈毅、饶漱石二人，虽然了解的程度有所不同，各人的长处和短处也有差异，他与此二人的相交，也有深有浅，但是，他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作为最高统帅，难道能够完全支持陈毅、批评饶漱石？或者反过来，完全支持饶漱石、批评陈毅？何况陈毅已经到了延安，就在自己身边了，而饶漱石还在华中，有一大摊子工作。他只能对双方都作些降温工作，使双方都不把问题看得那么重、那么

难，使双方都看到对方的长处，看到自己的短处，各自多作些自我批评。至于更深层次的是与非的问题，不能着急，一是要经过时间考验，二是还要做些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三是真正的是与非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有水到渠成、彻底解决的时日，这是不能着急的。太急了，条件没有成熟，就着手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常常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毛泽东这方面的经验，实在是太多了。

陈毅这方面又如何呢？

陈毅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热情欢迎。有不少领导人，自从在中央根据地分别之后，将近 10 年不见面了，10 年之后的今天在陕北重逢，10 年戎马倥偬的岁月，革命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令人感慨殊深。中央领导同志，为了指导全国各战场的抗日战争，指导革命根据地及各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和斗争，夜以继日地操劳，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运筹帷幄。这一切，陈毅不仅从政治家、军事家的角度去理解，也以诗人的激情和敏感去感知和接受。这里不是黄花塘。他思考问题的视角、立足点和出发点，似乎有了新的变化。政治家应有的气度和诗人的激情，推动着陈毅，使他和毛泽东更加亲近。

陈毅说干就干，立即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一个电报。电报以巨大的热忱，叙述了他到延安后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帮助和教育。电报还诚恳地说：

“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我的某些认识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电报最后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看后，起草了一份电稿，连同陈毅的电报，于 3 月 15 日一同发往华中。毛泽东的电文是：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

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在苏北黄花塘收到毛泽东和陈毅两封电报，心里颇不平静。他用他的智力、从他的水平和角度，对这两封电报、尤其是毛泽东的电报，一字一句地进行推敲，也用他的心，来度陈毅之腹。

好嘛，你陈毅已经到了毛泽东身边，汇报也方便了，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捏造理由，也都方便了。我发电报总不如你当面谈呀！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发展”？你陈毅倒是会在毛泽东面前表功啊！

“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什么“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你毛泽东只听陈毅一面之词，就这样定性？你陈毅就这样一手遮天？

“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哪有这么轻巧！陈毅指不定胡诌了什么！什么“饶漱石承认自己错了”呀，“我陈毅已经原谅他了”呀，陈毅都可能捏造得出来，所以毛泽东才说已经“谈清”、“不成问题”。

“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这岂不是说，陈毅还要回到华中，回到新四军军部，继续当他的军长？可不是，陈毅的电报也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如果说在别的问题上，我饶漱石还可以通融，还可以让步，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行。我能让你回来？！让你回来我就不是饶漱石！除非把我头上的“代”字去掉。

下面还有一大串，什么陈毅这个陈毅那个，无非是说陈毅有功，陈毅没错。

“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你毛泽东也要起了花招，“如有同志不明了”，这分明是说给我听的，我就“不明了”，我还“解释”什么？！

饶漱石怀着极不平静的心情，立即给毛泽东复电，其中主要一段是：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方面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给陈毅电报的基本调子，在他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已经定下来了，但在落实到文字上以后，却是如此的刻薄和盛气凌人。电报说：

来电悉。你去延不久，思想觉悟有大提高，甚慰。你对自己陈腐作风有初步认识，并对此种作风对党的工作妨碍之大，亦有初步认识，我表示热情欢迎。但，你对你在统一战线方面、组织原则及文化干部方面的右的观点，还有思想意识、组织观念方面的陈腐观念和极坏作风，尚缺乏明确认识。而这些，正是我希望之所在。你仅表示惭愧，是不够的，惭愧总不如认识和改正好。

陈毅患了感冒。通讯员送来饶漱石电报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休息。

陈毅匆匆看完电报，顿时怒火中烧，一脚蹬开被子，跳下床来：

“咯老子！咯老子！欺人太甚哩！”这句粗俗的四川话，多年以来他几乎忘记了，这时候鬼使神差地一下子蹦了出来。

陈毅披上大衣，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写完，又立即派人给毛泽东送去。

毛泽东照样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到4月9日，才给陈毅回信：

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给陈毅送去这封信的第二天，毛泽东去看陈毅。陈毅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近几天的病情和心情。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又不能马上回去，横直搞不清楚。等你将来回去后，这件事还是容易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现在，你越生气、越解释，可能误会越大。

毛泽东的话语，充满了规劝、体谅和关切之情，陈毅听得很顺耳。于是立即向毛泽东表示：

“本来我的气很大，你今天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陈毅毕竟是陈毅。

1944年4~11月这段时间内，陈毅协助毛泽东做了一些外交工作，听了毛泽东的多次讲演（包括《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演说），了解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和修改中的精神，同时，陈毅自己也写过文章，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作了修改。所有这一切，使陈毅的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触动和提高。

9月1日，中央决定派遣王震、王首道带领三五九旅进军华南，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0月2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毛泽东说：

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反共抗战不积极，没有一点希望了，政治、军事、经济都没有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

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现在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其次是讲团结。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党内也要加强团结。

关于去年（1943年）的审干、反特务问题，毛泽东说，这项工作发生了许多毛病，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就马上叫它停止了。当时，毛泽东看过被审讯人的口供，说像是小说，看不下去。同时向审讯人员交代：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回去把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早在今年5月间，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的学员讲话，毛泽东说：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对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11月1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在誓师大会上又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仿佛给正在积累着量变的陈毅的思想，投进了一粒粒火星，使它爆发出耀眼的光辉。12月1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恳切感人的信。陈毅说：

你对湘赣部队的讲演，启发作用很大。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可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毛泽东接到陈毅这封信，飞快地看完一遍以后，又仔仔细细读了一遍，非常高兴，也很兴奋，这就是他所了解的陈毅，就是他所希望看到的陈毅。井冈山的陈毅到了延安，现在是延安的陈毅了。毛泽东立即欣然命笔回复道：

陈毅同志：

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

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整个党在政治上日见成熟，毛泽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整个党的成熟，不是每个党员都成熟，也不是说党内就没有阴暗面。

薄一波同志在一篇回忆中写道：

党的“七大”之后，陈毅同志本应立即返回新四军，前方很需要他，但他却迟迟未走，天下下围棋。我感到有些奇怪，问他为何不走？他说，我应该回去，但他们不让我走。“他们”是谁？我不便也无须深问，显然是指负责整风工作的同志，而站在前面的就是康生。康生讲过，如果陈毅不明确表示拥护饶漱石的领导，就不能让他回去。陈毅同志宁肯等着，也不表这个态。我是很佩服他这个硬劲的。

康生如此，饶漱石呢？

生活毕竟是生活，现实也毕竟是现实。

■ 中央意图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  
会主席，陈毅谦让。饶漱石得知后，  
说：“你不担任我担任！”

“七大”后，陈毅滞留延安期间，中央对陈毅的工作安排，作了认真研

究。从中央对当时全国形势的通盘战略考虑出发，收复东北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谁去完成这一任务？中央考虑的人选有二，一是陈毅，一是林彪。但是，看来陈毅去华中似乎更为合适。

1945年8月中旬，毛泽东找陈毅谈话。毛泽东说：

“你的工作问题，中央反复考虑过，觉得你还是回华中去更为合适。你以为如何？”

陈毅思索了一会儿，毛泽东的话是不错的，他自己对华中情况熟悉，几天前还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的指示。但是，一想到同饶漱石的关系，心里就发怵。他便坦率地说：

“回华中去恐怕做不了什么事，起不了什么作用。”

毛泽东笑笑说：

“怎么起不了作用？只要你往那里一坐，就会起作用！”

毛泽东气势不凡的语调，感染了陈毅。

“那好吧！只要我去，就请中央放心，我陈毅答应的事是算数的。”

1945年8月25日上午，陈毅便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等二十多名高级干部一起，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到晋东南黎城县，然后各奔东西。第二天，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饶漱石接到这封电报，自然高兴，代书记的“代”字，终于去掉了。当然，毛泽东还算是“知人”的，不然也不会下这个决心。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我饶漱石咬紧牙关“顶”的结果，1944年春天毛泽东那封电报，不是叫我给“顶”回去了吗？倘若不顶，很难说会出现现在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在关键时刻，是不能退缩，不能让步的。饶漱石这样总结着经验，这样提醒自己。不管怎么说，他陈毅还是回来了，还得同他在华中这口大锅里搅勺子，以后很难说还会发生一些什么。



1945年10月，陈毅（左二）回到山东临沂与（左起）饶漱石、谭震林、刘瑞龙、粟裕合影

饶漱石等待陈毅的到来。

等了一个来月，情况又有变化，中央命令陈毅不去华中，直接到山东去接替罗荣桓的工作。饶漱石想，他不来也有不来的好处。可是，又过了两个月，中央军委又决定陈毅只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而政治委员，还要他这个身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饶漱石兼任。再过半个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华东局，饶漱石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947年1月，为了统一和加强华东全军的领导，中央军委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要论经城略地，克敌制胜，饶漱石对陈毅只能望其项背；然而，要论明争暗夺，巧算机关，饶漱石就整整高出陈毅一头了。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决定以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任各大区军政委



1947年3月中旬，陈毅在淄川以东的大矿地召开华野高干会议上传达中央指示，总结莱芜战役经验。后排左起：陈毅、黎玉、饶漱石、粟裕

员会主席。其他各大区都很顺当，唯独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案。毛泽东只好致信陈毅：

陈毅同志：

请邀集刘晓粟裕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在庆祝上海解放大会上。前排从左至右：张鼎丞、陈毅、饶漱石、粟裕、宋时轮

陈毅照办了。

关于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毛泽东对陈毅说：

“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角，就非你莫属了。”

陈毅说：

“我是大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是上海市长，够忙的了。这个主席，还是让饶漱石同志来当吧！”

毛泽东说：

“这样恐怕不妥。”

毛泽东对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人选作了通盘考虑以后，仍然坚持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应当由陈毅担任，并再次向陈毅明确提出。

陈毅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理由，再次推让。毛泽东说：

“我已经说过两次，你仍然坚持。那么，我就让华东局的同志们讨论一下好了。”

饶漱石得知要讨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陈毅又一再推脱，便找到陈毅，说：

“军政委员会主席，你不担任，那就只好我来担任了。反正一道商量着工作吧。”

陈毅抱紧双拳，连声说：

“感谢！感谢！”

饶漱石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的会议上讨论，也没有同华东局的任何其他同志商量，就用华东局的名义上报中央：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饶漱石担任。

毛泽东接到报件后，心存疑惑，压了下来，没有批复。待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问饶漱石：

“陈毅同志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你们华东局怎么讨论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饶漱石说：“我们商量过，研究过，华东局的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同志担任这个职务，那就只好我来担任了。”

疑惑归疑惑。事已至此，毛泽东就不得不批准了。

这样一来，饶漱石既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又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显然又比陈毅高了一头。

饶漱石在骗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头衔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做了一些工作，有几次还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49年10月11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9月30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制订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会议的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

毛泽东将饶漱石的报告，批给各大区第一书记，指出：



1963年3月3日军委常委会后，陈毅（前排左一）和罗瑞卿、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林彪、陶铸、贺龙、叶剑英、罗荣桓于广州东山小岛

“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

1950年1月9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在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将普遍开一二次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的先决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完后致电饶漱石：

(一) 一月九日报告收到，阅悉甚慰。(二) 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三) 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0年秋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大陆各地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为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时之间，气焰十分嚣张。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上海镇压反革命和肃清特务的工作，原来是饶漱石抓的，由于他态度消极，进展很慢，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

饶漱石在对待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暴露出了他骨子里的右倾情绪，由于他的伶俐机智，中央批评了以后，很快转过来，掩饰下去了。然而，他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警惕性却出奇地高，并以此对陈毅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又强调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陈毅根据中央的这个精神，大胆做资本家的工作，同资本家“交朋友”。

1950年秋天，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陈毅请干部讨论，去不去？有人主张去，有人反对去，怕影响不好，犯错误。陈毅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陈毅摇着大葵扇欣然赴宴。一进门，陈毅便大声说：“我是来交朋友，不谈工作。”

事后，党内就传出嘁嘁喳喳的议论：“陈毅同志没有经过华东局讨论，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谁也不知道，饶漱石同志也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资本家拖延不向国家交税，陈毅知道此事，在一个大会上狠狠批了一通：“为什么不交税？不交税怎么行呢？共产党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你们敢站出来说说吗？！”这么一批，不出半个月，资本家几乎全交了税。陈毅说：要打，也要拉，不要搞得太紧。于是组织了一次舞会，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和他们的太太都请到了。事后，党内又有人出来非议：“又是赴宴，又是舞会，饶书记对这些事都不知道，有看法。”

后来，陈毅到北京，向毛泽东谈起过这件事，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舞会搞得好！”

1952年4月4日凌晨3时。

北京西郊万寿路新六所。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这里的值班人员总是通宵坚守岗位，住在这里的都是高级干部。

值班员听见有个房间总是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便轻轻走过去看了看。  
这是饶漱石的房间。

房间里的窸窣声依然不断，一会儿像是来来回回的踱步声，一会儿像是写字台上的轻轻敲击声，一会儿像是纸张的沙沙声，一会儿像是沙发弹簧的嘎吱声，还有开门声和关门声。

忽然，房门大开，饶漱石走出房门，大声喊叫：

“你们这里的人呢？人哪里去了？”

值班员赶紧跑步到饶漱石跟前，怯怯地问：

“饶书记，您……有事吗？”

“赶快给毛主席打电话！我要同毛主席谈话！”饶漱石吼道。

值班员更糊涂了，深更半夜，怎么找毛主席谈话？究竟是毛主席找饶漱石还是饶漱石要找毛主席？值班员又不敢问，便只好说：

“好，好，我去找我们所长。请您先进屋休息一下。”

值班员跑到前楼敲开了所长的门，向所长报告晚上发生的一切。所长问：

“他没有说是毛主席要他去，还是他要找毛主席？”  
“他只说要同毛主席谈话，究竟是毛主席叫他去，还是他要去找毛主席，我也听不明白，又不敢问。”值班员回答。

所长也为难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到饶漱石那里问个究竟。

“饶书记，现在是凌晨 3 点 10 分，不知道毛主席请您几点钟去？”所长很会说话，不好出口的话全都省略了，但是几层意思都点到了。

“毛主席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这我知道。赶快打电话吧！”饶漱石说完挥了挥手。

究竟谁找谁是搞清楚了，可这下子更坐蜡了：一个大区书记，半夜三更心急火燎地要找中央主席，这都哪儿是哪儿了！再说，毛主席是有夜间工作的习惯，可是，也不一定夜夜都干通宵，何况，总不能招呼也不打，就往毛主席那里闯呀！

“我先挂个电话吧，请您稍休息一会儿。”所长也只能这样了。

所长挂通了毛主席秘书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田家英。田家英很为难：主席已经睡了，他是难得在天亮以前睡觉的，现在要喊醒他，实在于心不忍。田家英便对所长说：

“主席已经睡了。现在是 3 点多，你好好跟饶书记商量一下，问他，可不可以等到明天上午再谈？”

所长压低声音说：“看样子恐怕不行，他一个晚上都在折腾，这会儿更是心急火燎……”

田家英一听，便只好狠着心去找毛泽东了。

毛泽东听后说：“既然‘军情’那么紧急，那就请他来吧！”

事情原来是这样——

饶漱石从 1 月上旬开始，眼神经痉挛状况越来越重，难于坚持工作了。粟裕对此很关心，向中央建议饶漱石应离职休养。

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立即回电：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二月二日上午二时

2月2日下午，陈毅、粟裕带着中央的电报，去看饶漱石。电报也给饶漱石看过，陈、粟二人建议饶漱石3日动身，宜早不宜晚，别耽误了治病。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同志们，都是对同志对工作负责，都是一种关心。但饶漱石不这么看，他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名堂，但他又不便说什么，勉强同意了。

如中央指示的那样，粟裕陪同饶漱石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一路上，粟裕对饶漱石照料得十分周到。饶漱石心里总不踏实，总是翻腾：我的病真的那么重吗？要由粟裕给中央报告，中央马上决定“必须休养”，而且“必须离开上海”？而且，一休息就是两个月，我的职务立即由别人代理。我的职务，别人动不动就可以代理，我饶漱石岂不是可有可无吗？

饶漱石心里不是滋味。

但他还是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

不几天，饶漱石又听说中央决定派彭真去华东帮助开展“三反五反”。随后又听说彭真没有去华东，中央改派薄一波去了上海。饶漱石更加疑惑：这是怎么回事？搞什么名堂？他在“病友”中不止一次发牢骚。

接着是陈毅向中央提议，谭震林代理华东局书记，陈丕显代理上海市委书记。中央都同意照办。

饶漱石在北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病情有所好转，便吵着闹着要出院，

他觉得住在医院里，消息总不大灵通，心里不踏实。医生没办法，只好同意，但要求相关方面给饶漱石找个条件又好又安静的地方，继续休养、治疗。这样，饶漱石便被安排到颐和园北边的一所院子里住下，继续疗养。

在颐和园里，饶漱石将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思前想后，心里更是开了锅：好嘛！我饶漱石“必须离开上海”、“必须休养”，这个必要性现在总算看出来了！我“休养”了，人家才好上来；我“离开”了，人家才好进去。彭真为什么说去又不去，又换一个薄一波？无非我那几把交椅不好瓜分。薄一波去，当然就在陈毅之下了，就好安排了。华东的工作，三反五反也好，城市社会改革也好，无论哪方面都是有问题的。现在，我离开了，别人进去了，他们肯定会发现问题，也肯定会向中央报告，这就对我太不利了！中央还信任我吗？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对别的大区有表扬，但更多的是批评，唯独对华东、对我，表扬多，没有进行批评。这是怎么回事？大概中央已经不信任我了，觉得我不值得批评，让我靠边儿就算了。还有，我到北京治病，为什么非得跟个人干什么？粟裕真是陪同我、照顾我吗？没有别的意思吗？“解差”、“押送”，饶漱石脑子里不知怎么一下子出现这两个字眼儿。愚弄、暗算、阴谋、小丑、可怜虫，……这些乌七八糟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一个跟着一个从脑海里跳到心脏里。

4月3日，饶漱石从颐和园转到万寿路新六所。他听说毛主席最近也暂住在这里，而且离他住的这幢楼很近，差不多算是“隔壁”。

中央的主席，就近在咫尺，这件事更刺激饶漱石。他心中划的那些问号，更是翻腾得无法控制。饶漱石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快得神经病了。如果那样，就更糟糕了！趁现在还没有得神经病，还能控制自己，赶紧同毛主席谈谈，不然，就来不及了，就全完了！

于是，才发生4月4日凌晨3点钟吼叫着要见毛泽东的那一幕。

饶漱石同毛泽东一谈就是3个小时。他饶漱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是在赣东北、浙西从事青年工作，然后是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1935年赴苏联，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

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抗战，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战斗，华中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总之是走南闯北，文治武功，死里逃生，风霜雨雪，陈谷子烂芝麻抖出了一大堆。

如果归拢一下，饶漱石提出的不外四个问题：

第一，我饶漱石对敌斗争是否勇敢？是否右倾？

第二，我饶漱石在华东的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第三，我饶漱石的病是否真的这么严重？是否必须离开上海？

第四，为什么要用粟裕陪同的方式把我饶漱石调到北京？

毛泽东多次说过自己只想当教师。当饶漱石深更半夜闯来、无理取闹一谈了3个小时的时候，毛泽东真的像个极有耐心、极有涵养、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师。

毛泽东首先说明，此次调他到北京，就是为了让他治病，是同志们和中央对他的关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把身体搞好了，将来工作有的是。对饶漱石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作了解答，对饶漱石的工作进行了肯定。毛泽东说：

“谁人说你在华东犯了路线错误？你看，我刚才还批转你们上海市‘五反’的经验。”毛泽东从他宽大的办公桌上找出一个批件。毛泽东继续说：“就是这个，我念给你听：

“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

念到这里，毛泽东停下来，问饶漱石：

“听见没有？我说你们的经验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下面是：‘望一切正在进行五反或准备进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你看，这怎么能说你斗争不坚决，犯了路线错误？”

“4月2日的报告，那是我到北京以后的事情。”饶漱石嘀咕着。

饶漱石的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毛泽东就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上海市的经验，不是这一两个月才有的嘛，总有个过程嘛！你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工作，又是华东局的书记，难道没有你饶漱石一份？”毛泽东每说完一句话，就用食指指尖敲一下桌子。

饶漱石无语。

“你饶漱石就是有缺点、错误，发现了，改了就好嘛！”毛泽东不想把话说绝、说死。

饶漱石无言以对，但还是坐着不动，没有结束这场马拉松谈话的意思。

“这样吧，如果你自己以为你的身体能够支持，可以让你立即回华东工作。今天就走，派飞机送你去。”说完这句话，毛泽东往沙发上一靠，望着窗帘上透进来的曙光。

饶漱石无话可说，感到中央的底他也摸到了，看来中央也确无他意，这才辞去。

第二章

..... — 封 秘 信

——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打秘密报告

## ■ 斯大林将科瓦廖夫的报告递给毛泽东：“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只出国两次，第一次是访问苏联，第二次还是访问苏联。

1949年春天，毛泽东和党中央还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时候，斯大林派米高扬作为特使访问中国，专程到西柏坡来见毛泽东。米高扬此次来华，一是要摸摸中国共产党的底，二是代表斯大林再次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

毛泽东答复米高扬：接受斯大林的邀请，访问苏联。但目前正忙于指挥三大战役和农村的土地改革，抽不开身。请报告斯大林同志，待我们把蒋介石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大概在今年12月斯大林同志70大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了。

1949年秋天，毛泽东正式向汪东兴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

当时，聂荣臻是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滕代远是铁道部部长，李克农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汪东兴同他们研究后决定：为确保毛泽东此次出访的安全，派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而毛泽东身边的保卫工作和专列的组织，则由汪东兴负责。

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按：即科瓦廖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做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毛泽东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12月1日，以中央名义致电山东分局，请山东分局准备一部分山东生产的最好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为给斯大林的寿礼。

此外，有关负责人还准备了其他礼品：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以及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上海的名烟等。

党中央领导同志，生活都是艰苦简朴的，除了做了必要的衣服外，没有其他的要求。苏联的冬天天气较冷，汪东兴等提议为毛泽东做一件呢料大衣，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只同意做了一件呢料斗篷。

毛泽东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前卫车有5个车皮，上面有铁道工作人员和50个战士；后卫车也是5个车皮，50个战士担任警卫，还有送给斯大林的寿礼。主列车有10个车皮，包括餐车、行李车。

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宣布了三条纪律：

- 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为，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
- 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
-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毛泽东出访苏联的专列，12月6日从北京出发。

到达沈阳站时，高岗上车看望毛泽东。在毛泽东面前，高岗表现出特别的谦恭，一再提请毛泽东注意身体，苏联比中国冷，尤其是外出或一早一晚，要注意加衣服。

最后，高岗用一种近乎恳求的态度和口吻说：

“毛主席，我送您一段路，送到满洲里，到了国境线，再回来，可以吗？”

毛泽东说：“不必了。”说完后问汪东兴，他宣布的三条纪律是否都通知沿途各地了？

汪东兴说已经通知了，高岗也连声说“知道了，知道了”，才无可奈何地下了车。

1949年12月16日，白雪覆盖着莫斯科。

伊凡大帝钟楼上洪亮的正午的钟声，列车的呼啸声，车站上男女青年的欢呼声，连成一片。

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了莫斯科北站。

当天下午，莫斯科时间6时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斯大林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欢迎你来苏联访问。你很年轻，很了不起！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国家不断前进！”

毛泽东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们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当谈话逐渐转入正题的时期，斯大林问毛泽东：

“你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神情泰然，不卑不亢地回答：

“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另外，当然是要完成某项工作的，就是搞出个什么东西来，这东西，必须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答话中的要害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毛泽东的东方人的含蓄、幽默和机智，让苏方翻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脸都急红了。师哲连忙用俄语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

苏方人员仍然面面相觑，不知所云，贝利亚竟然笑出声来。



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周年诞辰大会上。左起：师哲、毛泽东、布尔加宁、斯大林、乌布利希、泽登巴尔、赫鲁晓夫

沉着老练的斯大林，继续委婉地询问毛泽东，毛泽东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

斯大林一听到毛泽东提出这个敏感问题，立即接过话茬，表示他的意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sup>①</sup>，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

<sup>①</sup> 即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问题。

很明显，斯大林之所以倾向“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是担心修改这个条约，会牵动雅尔塔协定，从而影响到改变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归属问题。

毛泽东接着婉转地表示了态度。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

毛泽东的意思也很明确，我们不必顾虑美国、英国的立场，我们应当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斯大林没有反应。

毛泽东又用试探性的口气问：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斯大林说：

“上次你们的大使提过这件事，我没有答复。这个问题由你们自己决定吧！”

斯大林仍然坚持，不废除旧约，不签订新约，周恩来不要来。

条约问题无法继续讨论下去了。

毛泽东心里盘算：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存在了，新中国成立了，你斯大林也承认了，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可你却要保存同国民党政府的“友好同盟条约”。这怎么能说得通呢？不行，绝对不行！废除旧约，签订新约，是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必须达到！

斯大林心里疑惑：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底究竟在哪里？

本来，斯大林就不大了解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到了面前，又增加了一层迷惘。

“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一次会见以后，斯大林不断这样问自己，也问他的助手们。谁也没有找到答案。

然而，秉承高岗的“见机行事”意旨的科瓦廖夫，以为时机到了。12月

24日，他向斯大林递交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

这个报告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存在一个反苏的“亲美派”。这个“亲美派”的代表就是刘少奇。中央的领导现在是支持他们的。中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中，只有高岗可靠。由于高岗在国际国内的阶级路线问题上，同他们存在意见分歧，刘少奇便组织对高岗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批判。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也很成问题，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同中共中央个别人和国民党上层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关系过于密切，关系极大。

看了科瓦廖夫这个“报告”，斯大林更“二乎”了，对毛泽东的疑心又加重了几分。

有一天，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

“你上他那儿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

莫洛托夫到毛泽东下榻的斯大林别墅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向莫洛托夫表示，不知何故，斯大林几天没有接见他；毛泽东还表示，他坚信马列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是个聪明人，值得一见。

斯大林仍然犹豫。他又派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去看毛泽东，看看毛泽东身体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有什么事情要办。

斯大林的这些做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瞒不过毛泽东。毛泽东心里很窝火。科瓦廖夫一来，毛泽东的火气更上来了，对科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毛泽东说：

“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干什么？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了给你斯大林祝寿吗？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

斯大林从各个渠道获得了关于毛泽东这几天的信息，包括他发脾气。斯大林开始深思：人家的国家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人家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给自己祝寿。可是，我们，我，对人家疑虑重重，横挑鼻子竖挑眼，这对吗？

想到这里，斯大林立刻找来科瓦廖夫写的那个报告，重新审阅。如果说，在现在，在目前，西方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离间苏中两党、两国关系的话，那么，这份报告，不就恰恰适应这种要求、满足这种需要了吗？想到这里，斯大林不寒而栗。

斯大林立即断然决定：把这份绝密的报告，当面交给毛泽东，这比什么样的语言都有力。

一天夜里，斯大林带着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来到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拜会毛泽东。

中苏双方领导人进入客厅，桌上摆着各种菜肴和食品。

莫洛托夫首先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

接着，斯大林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外国欺侮，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特别是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中国对世界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理解与支持，表示感谢。根据目前国际形势，毛泽东建议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

斯大林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妨碍过你们，我们感到内疚。现在，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很好，就由我同毛泽东先生签字。

毛泽东笑着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们的总理找来。”

斯大林当即表示同意。

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西方帝国主义都不会高兴。相反，他们会破坏，会造谣中伤。对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

斯大林说：新中国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强大了，帝国主义当然要破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正是敌对势力

常用的手段。斯大林说到这里，把科瓦廖夫那份秘密报告交给了毛泽东：

“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毛泽东接过那份文件，递给了身边的师哲。

斯大林解释说：“这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科瓦廖夫只是一个技术员，不懂政治，也没有政治经验，或许在政治上完全是个门外汉。他如果往政治里钻，就会像老鼠钻进风箱里一样。”

作为毛泽东重要随员的汪东兴，在他的日记里有一段记载：

1949年12月28日

深夜，毛主席对我说：“等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完了，我有话对你讲。”

毛主席办完公，把我叫来，对我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告洋状吗？”

我说：“就是向洋人告状嘛。”

毛主席点头同意。

(多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说斯大林这样做是“出卖”。他说：“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正对我们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部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赫鲁晓夫当时是苏共中央的核心人物之一。从他的话里，人们不难理解高岗秘密活动的性质和严重性。)

1950年1月2日，晚10点。

毛泽东送走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精神很好，心情愉快。他穿好衣服，戴上皮帽，披上斗篷，到了走廊上。工作人员前来问他到哪里去，毛泽东兴致颇高地说：

“到园子里走走。”

两个工作人员匆忙抱着冬衣，一边走一边穿地跟了出来。

毛泽东深色的斗篷，在夜雪的映衬和对比下，显得格外鲜明。积雪在他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忽然停住脚步，环顾周围，赞叹道：

“在莫斯科郊外，看看冬夜的雪景，有多好呀！”

园子里是一片银色的世界，花园、菜园、鱼池，都在冰封雪掩之中。毛泽东沿着园中的小径，停停走走，走走停停。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他感觉到的不是冷，而是思路清新和精神亢奋。近几天来，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态度，十分尊重和友好，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就更不待言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是否完全解决了问题，那还要看。对了，那个秘密报告，当然要当回事，但也要看，静观其变，徐徐扑之吧。多行不义必自毙。斯大林把它交给了我毛泽东，这一点很不容易，也很说明问题。

对了，今晚得给中央发封电报。

毛泽东向白雪覆盖的高大的林木和低矮的灌木扫了一眼，回到室内，沉思有顷，奋笔疾书：

中央：

(一)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 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

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恩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庄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三）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要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一月二日下午十一时

发出前面一封电报后，毛泽东解衣就寝了，因为在莫斯科究竟不是国内，不宜于晚上通宵工作，白天睡觉。

想起前一封电报，有些话似乎该说但没有说。毛泽东实在难以入睡，于是又起床，再写一封电报。

中央：

昨日下午十一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

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

一月三日上午四时

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商定的一致意见，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如期到达莫斯科。

1月底的一次会谈中，谈到苏联给中国派专家的问题。毛泽东乘机问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可否把科瓦廖夫同志还派给我们？”

斯大林立即回答说：“不，科瓦廖夫只是一个技术干部，而且技术知识也不全面，他又不懂建设，不懂政治，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聪慧过人的毛泽东，想起了科瓦廖夫，一丝笑意从他的嘴角浮现出来。

这个科瓦廖夫，作为中长路苏方负责人，担任过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



1949年春，毛泽东与苏共中央驻北平代表伊·瓦·科瓦廖夫在香山双清别墅

总顾问，苏联专家总负责人。原来他住在东北，1949年春天，陪同米高扬到过西柏坡，后来从东北搬到北京，在香山住了一段时间。毛泽东（有时同刘少奇一起）向他详细介绍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情况，1949年夏天，刘少奇出访苏联，还特地请他陪同。此次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也请他陪同，毛泽东还专门给斯大林发过电报。这一切，无非是想借重他，在中苏两国、两党之间，起些沟通作用，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隔阂。可他倒好，反而打起小报告来了。斯大林断然决定，不让科瓦廖夫再度来华，当然是正确的。

可是，给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提供情况的人，又是谁呢？

### ■ 高岗到满洲里车站迎接毛泽东访苏归来，得知科瓦廖夫不再来华，若有所失。

1950年2月27日，高岗同罗瑞卿、滕代远等专程到满洲里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归来。

高岗依然一副谦恭模样，握着毛泽东的手，嘘寒问暖。

同毛泽东同车归来的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伍修权及其他同志，高岗都一一见过了，唯独没有看见那位科瓦廖夫。高岗情不自禁、自言自语般地脱口而出：

“科瓦廖夫呢？”

他并不是在问哪一个具体的对象，因而也不知是谁应了一句：

“老科没有来——也许不再来了吧！”

高岗有些失望。

他突然觉得不对，好像有人是说科瓦廖夫“不再来了”。谁说的？谁？

高岗在张望，想再问个究竟，但是由于人群中这个来那个去，互相打招呼、握手、问好，竟找不到那说话的人。

后来，高岗又拐弯抹角向几个普通工作人员打听过科瓦廖夫的消息，有的说不清，有的不知道，有的说可能不再来了，但什么原因，也说不清。

现在，如果有人把科瓦廖夫的事，摆到桌面上，面对面质问高岗：你同科瓦廖夫是什么关系？你们背着党中央搞了些什么名堂？！那高岗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同志关系！人家不远万里来支援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应当尊重人家，向人家学习，应当让人家熟悉我们的情况，应当安排好人家的生活，使他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倒要问问，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可是不，现在并没有谁向高岗提出问题，也没有人追究他和科瓦廖夫是什么关系。这时的高岗，反倒自己觉得不踏实了。

人们常说：自欺欺人。

其实，欺人是做得到的，自欺，则做不到。

高岗不得不回想了。

至少可以回溯到1949年初夏。那时，刘少奇在天津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后来，又为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通知中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问题上有“左”倾错误。

对，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高岗整过刘少奇讲话的材料，给科瓦廖夫看过。高岗着重挑明过：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国不要采取苏联的方式，而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刘少奇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是什么意思？不是对抗苏联又是什么？不是贬低苏联的经验又是什么？刘少奇的社会关系中，同美国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高岗是说过，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这类国家的上层人物，背后总站着一个帝国主义，不是这个帝国主义就是那个帝国主义。中共的上层人物中，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或者说，这种现象，会不会在中共上层中有所反映？如果有，那么，都有谁，他们的代表人物又是谁？按照一般逻辑，反苏一定亲美，亲美就一定反苏。

对了，接着就是1949年夏天，高岗同刘少奇访苏归来。那是向政治局汇报的情形，刘少奇一边汇报，有人一边插话。高岗追记了一篇记录。这篇记录，高岗也给科瓦廖夫看过。记录的大意是——

刘少奇汇报：当我们讲到1945年国共谈判时，斯大林说：在你们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害了你们？毛泽东去重庆是有危险的，CC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

刘少奇停止了汇报，说：

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总算说出了真心话。

毛泽东说：犹为未晚嘛！

朱德插话说：那时他可不是这么看的。他接连来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一打，中华民族就可能灭亡。主席当时很生气。

毛泽东说：是呀，我就不信，中国人民为了翻身搞革命，中华民族就会灭亡！

周恩来说：第二封电报说毛主席应该去谈判，不然各方面就不会理解。说毛主席到重庆，安全问题由美苏负责。他现在才说主席去是有危险的。

刘少奇说：谁负责，我们自己负责，毛主席负责。毛主席临走时交代，如果国民党来打，就坚决彻底消灭他。蒋介石只认拳头，不讲道理，你消灭他越彻底，我就越安全。

有一次，高岗向科瓦廖夫谈到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说这个决定是刘少奇起草的。这个决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这没什么说的。但是，这个决定还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行动。决定还特别提到中共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列主义进一

步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互相结合起来。决定中讲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说，中共中央早就对共产国际不满吗？而且，对共产国际的不满，又意味着什么？

高岗还向科瓦廖夫谈到1942年在延安工作过的苏军情报组负责人兼塔斯社记者孙平。孙平当时就注意到中共中央是排斥“莫斯科派”的，因为大多数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都受到批判。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中间，只有毛泽东一人没有去过苏联，没有见过斯大林。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重太大，高岗也向科瓦廖夫讲过，至于是不是说过中央人民政府变成了各党各派的“联合会”，却记不清了。高岗对民主人士安排得太多，是早就有意见的。1949年初，高岗在东北就接待过从海外回来的民主人士。他当时就有看法。后来，好，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占了那么大的比例。你看，6个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占了3个，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其中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的副总理共4个，党外人士就占了两个，一个郭沫若，一个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党外人士9人，超过了一半。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其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就有14人，具体任职如下：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两职）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这个名单一列，就很明白了。高岗想，就是我说了中央人民政府像各党各派的“联合会”又怎么样？

至于科瓦廖夫是不是向斯大林写了什么东西，我高岗可不知道。

“见机行事”？我没说过，什么“见机行事”？只有我同科瓦廖夫两个人，我是在他耳边说的，谁也抓不到证据。在党内这么多年，这点经验还没有？

人们常说：自欺欺人。

这是真的，欺人的人首先是自欺。自欺欺人，还是办得到的。

第三章

..... **两 次 会 议**

——1953 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前后后

■ 高岗说：“把我从东北调到北京，  
这是‘调虎离山’！”饶漱石闻听此言，  
顿觉醍醐灌顶。

1953年1月初，饶漱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饶漱石是作为中共中央出席苏共十九大代表团的成员，于1952年10月初去莫斯科的。

本来，在出国之前，饶漱石就已经知道，在完成了经济恢复、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以后，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调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领导进北京，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后来，一个个决定都变成了事实。

邓小平，1952年8月就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

习仲勋，9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高岗，11月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他，饶漱石，无疑是华东的第一把手。可是，关于他的工作问题，至今尚未揭锅。

前途究竟如何？是吉？是凶？是祸？是福？

饶漱石心里没着没落。

找找高岗去！饶漱石同高岗，彼此早就知道了，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见过面。建国后，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接触多了一点。高岗作风泼辣，遇事敢于拍板，饶漱石是知道的。无论是在陕北还是在东北，高岗工作都不错，近几年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也做出了成绩，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饶漱石也都知道。高岗在东北地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培植了一批自己的干部，东北地区不少干部

群众，谈起高岗来，总是一口一个“高主席”。这些，饶漱石也知道。高岗同中央的某些领导人、某些部门，有点疙疙瘩瘩。对这些，饶漱石似乎有所耳闻，但不知其详。还有，这个身材高大、方方脸、高鼻梁、两道浓眉、留着大背头的高岗，虽然戴近视镜、脸上也有些浅色麻子，但还是一表人才，年轻气盛。关于他的风流韵事，也时有所闻。想到这里，饶漱石禁不住独自笑了。



195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代表饶漱石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

对，找找高岗去！饶漱石相信在高岗那里，肯定会得到一些东西，而不会损失什么。

饶漱石要了车，对司机说：

“去东交民巷8号。”

东交民巷8号是高岗的住处。

坐下以后，高岗笑了笑，便开门见山：

“漱石同志，这次又见到了斯大林了。又是你们团长点你的将吧？你们

团长是很器重你的！”

高岗谈笑风生，但是话里有话，气势逼人。

“我可真不知道。”一貫疑神疑鬼的饶漱石，说了这一句就停住了。他知道高岗说的是刘少奇，刘少奇是这次出席苏共十九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对自己是不薄，那年他去延安，不是让自己代理他的新四军政委职务吗？可是，高岗这气势逼人的语气，很使饶漱石为难，不同意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同意吧，那等于当面顶了高岗，就等于说：是刘少奇点的将，刘少奇是很器重我，又怎么样？！这显然不合适，还是同刘少奇拉开距离为妙。饶漱石只好来了这么一句：“我可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不能当面顶撞高岗。何况高岗现在势头很猛，本来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现在又来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计划委员会”，人称“经济内阁”，好生了得！

高岗对饶漱石微妙的心理活动，有所察觉，他自己倒是更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了：

“漱石同志，咱们可是老相识、老朋友了。你今天来得好，你不来，我还想找你聊聊呐。去年1月，我在东北局高干会上有个讲话，《东北日报》1月21日全文发表了，题目是《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学习》杂志去年第一期全文转载了这篇讲话。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

“知道知道，”饶漱石连声说，“只是那天忙忙乱乱，有件什么急事，没仔细看。”

“我那篇讲话，可以说是我对这几年党内不同思想交锋的一个总结。”高岗看着饶漱石。

饶漱石不言语，洗耳恭听。

“我在讲话中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一个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我说的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

高岗还是看着饶漱石。

饶漱石仍然是洗耳恭听。

“1949年五六月份，中央有个《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你一定记得。”

饶漱石点头称是：“记得，那是批评你们在资本家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

“那个文件，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是他起草的。他批评我‘左’倾，按照他的观点，正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天津的那些报告和讲话。他的那些讲话，无非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了路线错误。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要保护资本家，保护资本家就是保护生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还多次讲，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不采取苏联的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他希望资本家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至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因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

高岗说到这里，为他的得意之笔而哈哈大笑。

“这就是说，谁反对剥削，谁就是‘左’倾。”高岗在他的得意之笔上又锦上添花，然后又是一阵大笑。

饶漱石还是洗耳恭听。他没有笑。他笑不起来。他觉得他从文件里看到过刘少奇的这些话，但经高岗一叙述，又不大像是刘少奇的话。说不大像刘少奇的话，刘少奇又确实讲过这些话。他觉得这个高岗的确非同小可，自己应当警惕一点。当然，也可以说，应当学着点。

“这是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高岗接着说，“还有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

“1949年12月，我们东北开了个农村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指出，土改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70%，吉林约2/3，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54%。上升户中一小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缺乏劳动力或患病，或者因为缺乏生产资料，再加上有的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已

经开始向前面的那一小部分人出卖或者出租土地；有的借粮借款。还有，有些农村党员开始雇长工，有些党员听了党员不应剥削雇工的党课后，解雇长工，出卖牲口。有些村干部不让上升户买车马，怕他们单干，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不少区县干部提出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农民应该经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富裕？怎么样才叫提高一步？除了组织起来以外，农村还要干什么？”

高岗接着说：

“我的回答是：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我们农村生产的基本方向。我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着重批评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单干的思想，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的思想。我强调要加强领导，要组织起来。我还提出，现时的互助合作，在生产工具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我宣布了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经济政策，比如，除水利、防疫贷款以外的农贷，全部贷给那些好的、但生产上有困难的变工组；新式农具，首先贷给变工组；各种优良品种、国家有可能给的农业扶助，一切变工组都有优先权。关于党员雇工或单干的问题，我明确地说，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就说服他不要雇；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对这些问题，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解决，不是必要的时候，不采用组织手段。

“我们这次座谈会以后，就有关党员雇工的问题，向中央写了个请示报告。”

说到这里，高岗想了想，对饶漱石说：

“请你等一下，我找一份东西。”

高岗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材料，继续说：

“20多天以后，1949年1月下旬吧，中组部给我们复信，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

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高岗念完这一段，问饶漱石：

“你听清了没有？”

“听清楚了。”饶漱石说。

“下面还有哩！”高岗又接着说，“我还收到他那时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记录是这样的，你听——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高岗又停下来，问饶漱石：

“这一段你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听清了。”饶漱石微微笑道。

高岗继续说：

“我得到这个谈话记录以后，有一次在北京，当面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批给陈伯达看。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对这个谈话很不满，很生气，脸色都变了。

“这是1950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思想分歧没有解决，到1951年，又发生几件同样的事情。1951年10月，毛主席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我就东北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写的报告的通报，认为我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你是知道的，文件你也一定看过。我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经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我们在指导农村互助合作的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经不是什么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什么‘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办公厅将中央的通报，我的报告和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

“毛主席和党中央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是事出有因的。这原因就是，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势力发展了，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因此，山西省委主张，扶植和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势力，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

“可是，山西省委的这个报告，又受到同一个人，还有薄一波等的批评，说什么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说，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错误的。

“他把山西省委批评得好厉害，说山西省委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感到害怕，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阻止和避免这种趋势；说主张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

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山西省委的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对山西省委的这些批评，动静还不小，又是文件，又是讲话，又是批示，又是文章。

“最后，还是捅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找他们几个人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对于认为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都提出了批评。毛主席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也就是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只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可是，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在会议上、在内部刊物上、在公开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这样，毛主席才不得不针对他们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央办公厅把我的报告印成小册子，就是措施之一。

“回过头来，再说我那篇《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我那篇文章，就是针对他的，他的关于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处理问题的观点，都是右的，都应当批判。

“我还想，自从七大以来，他的这类错误不少。我甚至怀疑，在七大上，他的地位是不是捧得太高了？

“还有一点，我今天说句话搁在这里：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而且，事情并没有完。不信咱们走着瞧。”

高岗讲到的这些事情，有的饶漱石听说过，有的看到过文件，但他并没有联系起来进行过系统的思考。今天，听高岗这一席话，那么有根有据，有因有果，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大事了。既然如此，高岗又被调到中央，委以重任，那就是说，中央是支持高岗了？他想想摸底，便对高岗说：

“你现在调到中央，身负重任，看来，中央支持你，这是没有问题的。”

“别这么看。”高岗马上回答道，“告诉你吧，去年8月我就得到了通知，要我到中央来。但是我拖着，既不表态，也不成行。去年9月份，毛主席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请我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我担负的工作，让我告诉他我何时可以到北京，并说习仲勋一两天内就到北京担负中央宣传部和文委的工作。我又拖了一个多月才到北京。”

说到这里，高岗站了起来，走两步，又折回，俯下身冲着饶漱石：

“调虎离山！这你比我都懂。东北这个地方山很大，老虎大有回旋余地和藏身之处，一旦离开了，就不行了。我反反复复考虑究竟是不是调虎离山？是调虎离山又怎么办？！”

“调虎离山”四个字，使饶漱石为之一震，但他未露声色，却故作姿态地说：

“你过虑了。把你调到中央是‘调虎离山’？把老虎调到身边来？那不成‘引狼入室’？中央还是重视你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内阁’，是实权机关，不是闲差。”

“可能吧！”高岗说，“我既然来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饶漱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同高岗说了些闲话，告辞而去。



1953年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主席台。自左向右：邓小平、林伯渠、周恩来、张澜、刘少奇、毛泽东、朱德、李济深、高岗、陈叔通、董必武、黄炎培

高岗送饶漱石到院内，握手时，他看着这位身材矮胖、满头黑发、两道浓眉、留着上髭的华东地区第一把手，高岗眼看着他上了汽车。高岗想：他也是一方诸侯，到时候，会用得着的。

饶漱石心中可不平静，坐在汽车上想了一路。他心里何尝不是七上八下？一会儿觉得中央也应当调自己进京，自己也是一个大区的一把手，现在也有了一些要调他进京的传闻。一会儿也害怕调虎离山，上海那地方，山也不算小，一定意义上讲，比东北的山还大，而且离“皇帝”更远。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到了北京，自己不仅算不上是虎，反倒送到老虎嘴边了，那滋味好受？可是，别人都调进中央，如果自己还在地方上，算怎么回事？别人又怎么看？左也难堪，右也不妙。高岗能坦然说出他怕调虎离山，很不容易，算是做到灵魂相见推心置腹了。至少有这几点：第一，说明他高岗也把自己看成是“虎”，想闹腾闹腾；第二，说明他同中央也有距离，有隔膜，不是一条心，而是两条心；第三，说明他也有自己的“山”，有自己的地盘。

饶漱石觉得自己同高岗很对味儿。

饶漱石觉得高岗这人信得过。

饶漱石觉得应该向高岗学点什么，比如说，学他的胆量？学他的干练？学他的气魄？

在有些方面——不，应该说在很多方面，刘少奇不如高岗。刘少奇没有高岗干一番大事情的锐气，刘少奇也不像高岗那样“体己”，饶漱石从来没有感到和刘少奇的心灵那么相通过，就像今天同高岗这样。

时隔不久，1953年3月，饶漱石也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调来了北京。

他同高岗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调虎离山。即使高岗没有向饶漱石说出这四个字，饶漱石也会这样想，这样觉得，这样认为。

然而，饶漱石还是感到兴奋，无论怎么说，总算是从地方进了中央了。中央组织部，掌握人事大权，闹着玩儿的？！何况，地方上的职务都还兼着嘛，高岗还兼东北局书记，饶漱石也还兼着华东局第一书记。再说，“调虎离山”又怎么样？北京至少有两只虎了，有了虎，也会垒起一座山来。

饶漱石高高兴兴进了北京。

饶漱石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高岗长谈。

在上层没有几个心腹之人，没有三朋四友，谁也别想当京官儿。这一点，饶漱石心如明镜。

■ 毛泽东致函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

时机总是会来的——只要你肯于等待。

时机总是会有的——只要你善于捕捉。

利用时机，常常使人名就功成；然而，你得当心，它也能叫你终生抱恨。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

周、邓、陈、薄：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

一向尊敬毛泽东、也深知毛泽东性格的周恩来，把这封信的分量看得很重，深受震动。他连夜给毛泽东回信，提出了处理办法。当时担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直接参与“新税制事”的薄一波，看过这封辞锋甚严的信，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他特别注意信中的这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显然，事情是有些严重了。

随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一方面派出一些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一方面，每天同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这样紧张的努力，执行新税制中发生的较大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接着，财政部又就修政税制问题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并就如何解决发生的问题作了说明。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修正税制这件大事，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却找资本家商量了。这岂不是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要吗？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就说明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的批评，把着重点放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而且把错误的性质提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这些都使人感到震惊。

### 新税制究竟是怎么回事？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自己的税制的建立，大体上是本着“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逐步整理的方针进行的。

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工商业税暂行条例》等税法，突出了扶持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特点。当时，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为了有利于它们的发展，税法作了一些倾斜性的特殊规定。例如：

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可以不纳税；

私营商业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

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打八折优待；

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三年；  
等等。

到了1952年下半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第一，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有了很大提高，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按原税制，它们又享有免征、少征税的待遇，因而造成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

第二，私营工商业主，看到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产零见面”的办法（即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一道批发营业税。这样，就使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

第三，“三反”、“五反”刚结束，私营工商业经营上有困难，资本家叫苦。

以上是一个方面的情况，即某些税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到了1952年下半年，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保证和增加税收。这里显然存在一个矛盾，而1950年的税法，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难以担负保税和增税的任务。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952年9月召开了一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确定修正税制。会后经过酝酿、讨论，由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政务院于12月批准了这个方案。为了抢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点税，便于1952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还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

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的新税制，就是这样出台的。

修正后的税制公布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波动。1月9日，山东分局几位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月11日，北京市委也向中央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其他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反映新税制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

于是，毛泽东于1月15日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那封信。

新税制，确能起到保税、增税的作用。然而，它本身又确实存在一些严重缺点：

- 一、税制的修正过粗，出台又过急。
- 二、修正后的税制，有些具体条文不当。
- 三、“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也不妥。

毛泽东对修正税制的批评，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小题大做。

毛泽东有更深层的考虑。

1952年11月的一次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现在还要扶持一下。“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从当时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确使一部分资本家捞到了便宜，似乎偏袒了资本家，同毛泽东“一是要消灭，一是现在还要扶持一下”的设想，就有了差距。

毛泽东同党中央早已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因此，1952年底至1953年初，毛泽东特别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新税制的修订及出台，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发生了偏差，毛泽东便敏感地抓住这件事，提出了尖锐而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在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筹划着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高岗却挖空心思，搜集各种材料，捕捉各种信息，窥测方向，等待时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有了新税制的这场风波，高岗自然以为又抓到了几个实实在在的把柄，到时候会发挥作用。

时隔不久，毛泽东为了纠正政府工作中的分散主义现象，建议中央先后作出了几个决定，即关于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加强政府系统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加强中央对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此外，还撤销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和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

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

对国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重新作出分工：

外交工作，由周恩来总理负责；

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

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农林、水利、互助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

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

但是，高岗、饶漱石却不是这样估计的。他们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和措施。

历史是这样经常地同人们开着玩笑：明明想走进这间屋，却进入了那间屋；从大门扔出去的东西，却从窗户飞了进来。

毛泽东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措施，在高岗、饶漱石那里，却产生了正在削弱和分散中央统一领导的错觉，因而他们便加速和加剧了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一天之内，写了两个批示，都是为了加强中央日常工作中的纪律性，有利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

这两个批示是：

—

少奇同志及尚昆同志：

（一）华南分局报告及方方的检讨，应加印分发彭真、习仲勋、高

岗、薄一波、陈伯达、罗瑞卿、洛甫、贺龙及其他参加中央会议的同志，准备讨论。嗣后，有关较重大的问题的文电，都应如此办。（二）贺龙同志未离京前，应邀他参加中央的各次会议。（三）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二

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三）十四号通知照发。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高岗看到这两个批件以后，兴奋异常，立即举办小型家庭宴会。

这次家庭宴会，高岗请了饶漱石，还有三五位亲朋好友。

高岗请客人吃西餐。桌面上看起来并不丰盛，但每个菜的质量档次都不低，旁边还摆了几个食品罐头，意思好像说：菜有的是，请便。这桌菜，同高岗的身份十分相称，既不过分热情，也不寒酸。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那几瓶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一大盘鸡杂。

高岗首先入座，客人也都就座。

一块块洁白的餐巾展了开来。

开酒瓶、斟酒，自有手疾眼快的年轻人侍候。高岗只是说：

“大家都随便，红酒、白酒，也随便。”

有要红的，有要白的，没有不喝的。

举杯，碰杯。

高岗喝了一大口，放下杯子，大口大口地吃着鸡杂。

“关于这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还有个故事。”高岗兴致很好，嘴里一边大嚼，一边叽叽呱呱开腔了。

“斯大林喜欢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起来喝。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年轻时，在流放中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医生悄悄给他喝了少量的红葡萄酒，于是，他被从死亡边缘上救了过来。斯大林过去一直喝白葡萄酒，从那以后，他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有益于健康，他就在白葡萄酒里掺红葡萄酒。”

在“斯大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喊得震天响的年代，能听到关于斯大林生活上的这类小故事，自然很令人提神，饶漱石当然除外。

饭桌上气氛非常活跃：

“真的？”

“你也掺和着喝！”

“我本来是红的。”

“掺和点白的！”

“让白的掺吧！”

“我不敢摹仿斯大林！”

“斯大林厉害得很哩！”高岗接下去讲他想讲的故事，“毛主席访问苏联那年，一次酒会上，斯大林把红葡萄酒掺和白葡萄酒，喝了一大杯。

“毛主席觉得奇怪，不知怎么回事，很感兴趣，就低声问身边的俄文翻译费德林：‘斯大林为什么要把红白葡萄掺和着喝呢？’费德林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要去问斯大林。可毛主席坚持不让费德林问。

“这下子坏了，斯大林发现了，严厉责问费德林：‘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

“费德林慌了，连忙向斯大林解释：‘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种酒掺和起来喝，而别人不这样做？’斯大林

怀疑的目光，仍然紧逼着费德林：‘那您为什么不问我呢？’

“费德林更加慌乱了，又赶紧继续说明：‘请原谅，斯大林同志，我是要问您的，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点不大礼貌。’

“斯大林这才缓和了下来，点了点头。可是，他立即又给了费德林一句严厉的话：‘你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费德林急忙立正回答：‘当然是听斯大林同志的话了！’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高岗讲的故事，也赢得了他的听众、他的客人的笑声。

的确，在那个一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就连喊“万岁”都来不及的年代，能听到这样的故事，真够新鲜、够有趣的了。在这新鲜和有趣之中，笼罩在斯大林头上的神圣的云雾，似乎淡化了一些，而与此同时，在讲这故事的人的头上，却有一些儿云苦雾罩，涂抹上了某种神秘的色彩。

“大家随便，大家随便，酒，罐头，管够。”高岗也如此这般随随便便地招呼着客人。

饭桌上的气氛，仍然是轻松活跃。也许有人还不太习惯于使刀叉，用得不太熟练，不时发出叮当的撞击声，倒加重了这气氛。

“给大家通点情况。”高岗似乎言归正传了。

“新税制问题，捅了个漏子，这个漏子捅得不小。‘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毛主席定的性。‘右倾机会主义’，这用不着解释，‘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算什么问题？反正不是个小问题。这事是谁干的？谁的责任？薄一波是逃不掉的。但是，一个薄一波够吗？他干不成这样大的事，他也不敢。他上面还有人。总要有个人批准嘛！政务院的党组已经撤销了，他那个书记也当不成了，政府各部門的党组，都直接受党中央领导。这个账是要算的，可能为时不会太久。”

客人们有的在咬耳朵：“党组书记是谁？”

“周……”

高岗继续说：“有一次他对我说，‘国家计委作出的重大决策，要上的

重大项目，须先报经中央认可后，才能下达执行。’哼，他还真以为他分量有多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气得我连问两遍‘哪个中央？哪个中央？’他没词儿了，蔫了。”

高岗继续说：

“最近，毛主席在一天之内，写了一封信和一个批示。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实际上是一句话：过去多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今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都得经我看过，否则无效。‘否则无效’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这加了着重号的四个字，就把他们那个门给堵死了。

“前面说的是一个人，这里说的是另一个。这个人胆子更大。也难怪，在七大上，他被抬得太高了。其实他有什么？几年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嘛！一连串的错误，毛主席真没少批评他，我当面给主席也讲过。主席要我找他谈。我找他谈什么？他能听我的？我没谈，没这个必要。我不是他那个圈子的，谈不拢。

“前不久，他找过我，要调整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要搞一个调整方案，问我可不可以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什么这个那个的，无非是想把持书记处的权力！我没理他。

“人家造了几年的舆论，我们也可以造舆论。造舆论当然要靠书刊报纸，我就在报刊上造过舆论，我们的嘴巴也是舆论。嘴巴有两大用处，一是吃饭，一是造舆论。——对了，吃、吃呀！”高岗又回到桌面上来，招呼他的客人了。

有的客人说吃饱了，有的又喝了几口汤。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可能没吃好，没吃好的下次补。漱石同志留一下，我还有点事。”

客人们道过谢，都告辞了，只剩下饶漱石。

“都交叉了，漱石，你发现没有？我这边儿的去捣你的老窝，你那边儿的来捣我的老窝！”客人走后，高岗对饶漱石说。

饶漱石一下子没摸清头绪，不解地问高岗：

“什么我这边儿、你那边儿！你是哪边儿？我是哪边儿？”

“暂且这么说吧！”高岗抢过了话头，好像是说：不必纠缠字眼儿，你听听就知道了。

“安子文不是你饶漱石手下的副部长吗？去年12月，他跑到东北去点了一把火；薄一波应该算财经这条线的，可是他跑到上海去大出风头，也是在去年。”

“姓薄的一到上海，今天一条经验，明天一条经验，他的策略是好的，部署也是好的，好像我是吃干饭的！”一提到薄一波到上海搞“三反”“五反”，饶漱石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去年春天，为这事我还找毛主席吵了一通，也没吵出个结果。”

“你可别胡来，对这个头号人物咱们还是要尊重，离了他，什么也干不成，不管你心里怎么想。”高岗郑重而严肃地提醒自己的伙伴。

“你非要说上海工作抓得不好，没出经验，也行，我认了，可是东北呢？东北的工作都走在前面，这是党内外公认的，你安子文跑去捣什么乱？！”饶漱石回过来给高岗加劲。可见，安子文在东北的活动，饶漱石是知道的，也是不满意的。

“这就是斗争，一场深刻的斗争。”高岗理直气壮地说，“根子还在那一位，你看不出来？其实，薄一波也是他的人，华北局的嘛！这些是组织上的问题。他自己右，总是把正确的东西看成‘左’，这是思想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高岗好像更能把握全局，站得更高，看得更深。

饶漱石没有答话。高岗继续发表高见：

“安子文的报告中说，反对党员的富农思想和剥削行为，必须十分注意防止发生‘左’的倾向。漱石，你听出来了吗？这个话本身就带着姓儿，它不是姓安，而是姓刘！”高岗当着饶漱石的面，很少对刘少奇指名道姓，只是意思到了，心照不宣，哪怕呼之欲出，他也不直接说出。这可能是由于高岗对饶漱石还不大放心，也可能是对饶漱石感情的尊重，不要使他觉得太刺激。但这一次，他开始指名道姓了。

“听得出来，怎么听不出来？从二中全会到天津的讲话，刘少奇不一直是这个调子吗？”饶漱石对刘少奇也直呼其名。他豁出去了。

“你这话我爱听，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不能含糊、不能胡涂的。”高岗又给饶漱石打气。打完气，高岗接着说：

“安子文挑了我们东北的组织工作多少毛病——”高岗伸直左手五个指头，再用右手的食指去一个一个地扳弯：“对干部强调业务能力忽视政治品质；凭个人好恶和亲戚朋友关系提拔和使用干部；喜欢知识分子，讨厌工农干部；强调资历，不敢提拔年轻干部；歧视妇女干部。”高岗的左手已经握成了拳头。“还有什么？”高岗问自己。“还有，党的干部队伍严重不纯，”高岗弯下了右手的拇指，“高级干部中有些人历史上存在问题，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高岗勾拢了右手的食指。

“你看看，这东北成了什么了！”高岗腾地站了起来，走两步，发泄了，又坐下。

“对了，”沉默了一会儿，饶漱石说，“我记得安子文好像也是你们陕北人。你过去同他不熟悉？”

“他是绥德人。这有什么用？他十几岁就到白区跑地下交通去了，没有在根据地呆过。”高岗说，“你这话倒提醒了我，什么白区呀，地下党呀，现在都成了一团了。刘少奇是他们的头。刘少奇是搞地下工作起家的。他就是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嘛！所以，他只能片面地依靠华北的经验来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这怎么行呢？”

“只顾说话了，连水也忘了喝。要不要来杯咖啡，换换口味？”高岗问。

“来杯凉的吧。”饶漱石说。

高岗方便了之后，又坐到原来那个位置上。

“看来，咱们也得有几个得力的人。你看人家，很多事自己不出面，有人干。”这回是饶漱石先开腔。

“不愧为组织部长！”由于这句话正中高岗的下怀，他夸奖饶漱石，完全是心里话，“你手下有不少吧？”

“有是有一些，可是真正靠得住的、能持久的，也不多。”

“不一定要很多，真正顶用的，几个就够。你身边如果有一两个，上海一两个，山东一两个，就满不错了。我在东北是有几个的。”

高岗和饶漱石，把他们认为信得过的、大体可用的人，都数了一遍，排了排队：能力怎么样，特点如何，什么时候用，在什么问题上用，用到什么程度，都交换了看法和意见。

最后，高岗说：

“部长这一层，由我直接联系。”

饶漱石说：

“那当然，这你是当仁不让的。最近外面有个说法——据说是董老董必武说的，你知道吗？”

“什么说法？”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哪！”

“唔，我，国家计委主席；你，中组部部长；邓小平，政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中宣部部长；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席。这是来自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的‘五马’，是不是这？”

“对，‘一马当先’的一马，就是你。”

哈哈哈哈，高岗一阵放声大笑。

“主席对刘、周越来越不重视了，这是很明显的，已经动手削弱他们的权力了！斯大林的倾向也是如此。陕北、东北，中国革命的这个基地、出发点，将来要载入史册的，谁能改变得了？！谁不信谁就试试！挑东北的毛病，给东北抹黑！给东北抹黑就是给中国革命的基地抹黑。这话现在用不着我说，将来的历史学家会这样写。”

高岗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他是这样地气宇轩昂，似乎成竹在胸，稳操胜券。

■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评薄一波的调子居高不下，周恩来无法收场。

毛泽东说：“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1953年5月6日，毛泽东就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准备问题，给陈云等写了一封信：

陈云、一波、富春同志：

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六日

经中央研究决定，此次会议的意图是，讨论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关于财政问题，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等等。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同志（实际上，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第一书记兼）。

会议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

会议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小组。

会议于6月13日开始，预定半个月结束。

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只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方面的愿望。

高岗、饶漱石他们可不这么想。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有他们的打算，有他们的部署，有他们的策略，有他们的办法。

早在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讲，毛主席要对中央政治局进行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身为中组部副部长的安子文过于轻信，过于草率，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名单。政治局委员名单分为两组，一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另一组是：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则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还有中央正副秘书长。

安子文将这个名单给高岗看过，因为是高岗向他转达毛主席的意图；还给饶漱石讲过，因为饶漱石是中组部部长。

这下子可好了，高岗、饶漱石抓住这个名单，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什么政治局委员中，有谁啦，没谁啦，这都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搞的啦，等等。至于他们说有谁没谁，完全根据他们挑拨离间和拉拢人的需要，怎样对他们拉拢人有利，他们就怎样说，当着林彪就说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当着朱德的亲朋好友，就说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反正别人也没有看见过这个名单。

高岗、饶漱石想拉拢陶铸，就对陶铸说：刘少奇不支持你在广西的工作，总是挑你的毛病，还派人调查你。

陶铸后来揭发过，就在财经会议第一次领导小组会开过以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面，高岗说：这次财经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刘少奇对你的工作，从来没有支持过。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发言，要利用财经会这个机会，狠狠地攻一下新税制的问题。高岗鼓动陶铸：“你就打头炮吧！”

高岗找过陈正人，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也不赞成他

出任中组部副部长。陈正人是井冈山老苏区的，40年代，高岗任中央西北局书记，他是常委、组织部长。高岗利用这种关系，进一步挑拨说：中央领导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一个圈圈，周恩来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你从大正统出来，又在小正统工作过，怎么能排挤你呢？井冈山的同志还有几个？太不像话嘛！

当然，陶铸也好，陈正人也好，都没有被煽动起来，而且后来都出来揭发高岗了。煽动起来的有多少，没有揭发高岗的有多少，就不好说了。

高岗、饶漱石，以及他们安排好的一些人，在会下鼓动一批一批同志到会上放炮，就新税制问题，提出种种责难。

会议的进度、情况，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

会议进行了一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得知大家对新税制问题、对薄一波的意见很多，而有人又在底下煽风点火，便表示了明确的意见。周恩来于7月12日晚间，致信薄一波，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有话摆到桌面上来，共产党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作风。

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薄一波于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领导小组会上作了第一次检讨。

薄一波这一亮相，立即成了“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的气氛，也立即紧张起来。

从7月14日起，一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批评薄一波；又一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还是批评薄一波。

高岗、饶漱石所进行的串连、煽动工作，还真的收到了实效。

具有戏剧性的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李维汉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传达了毛泽东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论述。

本来，高岗是出席了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毛泽东讲了些什么，他都知道。但他没有传达的任务，只好在暗中使劲，不便明说。李维汉在大会上一传达，高岗觉得又是机会来了。于是，对薄一波的批评，就上升到背离党的总路线的高度。

还有，高岗还在会下煽风：

“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怎么‘确立’？社会秩序每年每天都在变化，无法‘确立’，‘确立’的想法，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是右倾机会主义。”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管它准确不准确，添点油，加点醋，能达到目的就行了。

高岗还在下面对人说：“你觉得‘巩固’和‘确立’是不是差不多，是不是一个意思？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不是一回事？这些年来，有人一直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主席不满意刘少奇了！”

“刘少奇不行了！”

“薄一波是刘少奇那个圈圈的人，得好好整整！”

“岂止一个薄一波！”

“周恩来怎么样？”

一丝一丝的冷气，从会场的角角落落、旮旮旯旯里冒出来，形成一股冷风。

薄一波你想过关？过得去吗？

再来一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还是批评薄一波。又一次，又一次。

终于，高岗登场了。

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一开始，高岗就向人说过：

“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

这当然半是夸张、半是恫吓，为了给一些人打气。问题的关键是：刘少奇有多少“老底”可挖？刘少奇有什么“老底”怕挖？

话又说回来，对于有一种人，比如高岗，只要他“挖”，那么，无论是谁，哪怕你是上帝，他都能“挖”出东西来的。

高岗在发言中抓的第一件事，是所谓“东北一党员信”。

其实，这封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写的，通过薄一波转给了毛泽东，时间是1952年1月27日。这封信，揭露了高岗和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薄一波在转信时给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很小的范围内的几个同志传阅过。

这又怎么了？

但是，高岗认为，这不行，不允许这样，这是给东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抹黑！这是违反党纪的！

高岗抓的第二件事，是“鞍钢检查组”问题。

原来，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钢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了11人，伤了15人。1952年8月，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因而造成了事故，也推迟了建设进度。

这，又怎么了？

但是，在高岗看来，这也行，他高岗不满意，因为这是薄一波在专挑东北的毛病。东北是什么地方？！

因此，高岗说：薄一波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此人品质不良！

当然，批评薄一波不过是一个题目，文章不在这里，而在后头。

高岗在他的发言中，采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统统栽在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比如，刘少奇在1947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啦，1949年在天津讲过的“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啦，1950年关于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讲过的“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认为党员不能剥削，是教条主义”啦，1951年关于山西互助合作的批语中说的“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啦，都被当成薄一波的错误言论、错误观点，大加批判。

出席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相当负责的干部，谁不知道这些话不是薄一波的，而是刘少奇的？

嗯，高岗就是把它当成薄一波的加以批判。高岗坚决支持这样的意见：薄一波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违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而且是一贯的。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薄一波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的。

这一下，可有些乱套了。这样的干部会，也有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别看参加这次会的，都是相当负责的干部，他们也都是凡人，他们之中，也有明白的，也有糊涂的，也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自由主义。常言不是说，秦桧也有三个朋友，岳飞也有三个敌人吗？何况谁也难说高岗就一定是秦桧，刘少奇就一定是岳飞呢！

再说，高岗是什么人？如果一个基层支部书记，或者中央某个部门的哪怕一个处长，他不可能参加这样的会，就是参加了，也不敢发这样的“言”，就是他胆大包天发了这样的“言”，那还不立即被轰下台来，推出门外，交保卫部门审查个底朝天？

可是，他，是高岗！在东北，只要他一跺脚，整个东北大地就会乱颤；他不点头，老天爷都不敢下雨。现在，他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央刚刚把他调到北京，难道会调来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角色？调他来就是为了让他乱放炮？他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他的话，也并非彻头彻尾的造谣呀！

人们的思想被搅乱了。许多人小心翼翼，少说为佳，也就情有可原了。

薄一波的检讨还没有完。周恩来宣布要他在7月27日作第二次检讨。

薄一波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第二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一恐怕准备不好，特别是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一下。”

好，延期吧，薄一波第二次检讨，从7月27日推迟到8月1日。

中组部那边也出了事了。这是一种默契和配合。饶漱石对安子文施加压力，逼他在财经会上发言。饶漱石说：

“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能不表示态度！”

安子文心里明白，现在不能讲话。他对自己的秘书说：

“我反复考虑过了，决心不发言。如果这样做是个错误的话，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你说也不行。飞扬跋扈的高岗、饶漱石，在任用干部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对中组部进行指责。当然，他们说的是中组部，实际矛头是另有所指。高岗、饶漱石指名道姓地说张三李四使用不当，他们历史复杂，来路不明，为什么中组部要重用？中组部执行什么路线？

安子文为慎重起见，派专人逐个查阅了这些干部的档案。的确，从表面上看，被点名的这几个干部，历史是“复杂”的，但重要的问题是清楚的，有的是有结论的。就说他们历史“复杂”这一面，这也是历史形成的。一切人，都是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活动着。我们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或公开、或秘密、或合法、或非法的斗争，决定了在特定条件下从事斗争的同志历史的“复杂”。能歧视这些同志吗？更何况，他们之中，有的人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

比如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敌我尖锐对峙而又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人强迫游击区各村庄组织“维持会”。群众应该怎么办？开始有人坚决反对“维持”，要把对敌人“维持”的人，一律当汉奸论处。这样做，不但不能打

击敌人，反而只能脱离群众，给革命造成危害。后来，有的同志提出适应当时敌我斗争形势的“两面政权”政策。当敌人强迫群众成立“维持会”时，就口头应答维持，但实际上不维持，这叫“拖延”。一拖再拖，实在拖不下去，就勉强“维持”起来。这叫“从拖延到维持”。但是，敌人要求送的东西不送，要求办的事情不办，这叫“从维持到拖延”。这个“拖延”一拖再拖拖不下去时，就送几个鸡蛋、几斤食油，或者干脆挑空担去，说是送的东西叫八路军“劫”走了。就这样，“拖延中有维持，维持中有拖延”。敷敷衍衍，虚与周旋，到一定时候时机成熟，就把敌人消灭掉。刘少奇赴延安途中，曾经听到过关于这种“两面政权”的汇报。他指出：“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在向敌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两个术语的含义是相同的。”

对于执行这样的政策、从事这样斗争的同志，一定要说他历史“复杂”，甚至硬要说他应付敌人是假，应付革命是真，政治上靠不住，那还叫不叫讲理？叫不叫公正？能不能使人服气？对党对同志负责不负责？

8月1日，薄一波第二次检讨。从7月14日到7月25日，已经连续开了8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是8次批评之后的又一次检讨。

明摆着，通不过。虽然薄一波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自己的主观主义、组织观念不强，还是不行。

薄一波心里也很明白，他决定再也不说话了。当会上要他再作第三次检讨时，他拒绝了。周恩来把薄一波的态度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怎么办呢？原定只开半个月的会，拖了快两个月了。这样下去，还不知拖到猴年马月。

周恩来无法做结论。他说什么呢？批评薄一波的调子居高不下，整个会议显得纷乱而浮躁。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话说轻了，不大好通过，而且有开脱、庇护之嫌。更何况，有些风是吹向他的，闹得不好，局面会

更加复杂化。话说重了，那更不行，会被高岗、饶漱石利用。处理“西安事变”那样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那样错综复杂的矛盾，都游刃有余的周恩来，在重庆、在南京、在国民党的心脏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周恩来，这回却坐蜡了。情况完完全全不同啊！这也许是许多忠诚、正直的共产党人共同的弱点：在对敌斗争中，他们可以斩将搴旗，追奔逐北，而面对自己队伍内部同辈人的拆烂污，却捉襟见肘，束手无策。

周恩来收不了场，只好向毛泽东请教。

毛泽东说：

“你的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没有脸的！”毛泽东又说。

周恩来立即照办。

7月23日，陈云从北戴河返回北京，8月6日在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上讲话。他也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新税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他还说：“去年十一月，我在搞五年计划，要帮高岗同志搞出草案，这件事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工作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新税制问题一波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这样说，是不是我毫无责任呢？不是的。对新税制的错误，我仍然有责任。说多了也不必要，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一九五〇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他们。”陈云明确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也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

邓小平也从外地赶了回来，走上财经会议的讲坛。他说：

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

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财经会议的空气变了。冷气被关掉了，温度开始回升。

陈云、邓小平，这两位至今健在的毛泽东的战友，在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共产党员、在广大干部、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毛泽东的知人善任，多谋善断。

既然会议的空气变了，不再纷乱，不再浮躁，周恩来的结论就好做了。

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毛泽东认真审阅过，并作了修改。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毛泽东第一次引用了他概括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较为完整的提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是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次正式的文字表述。毛泽东在引用这段表述以后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还引述了二中全会决议中四段论述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文字，接着，加了一句话：“对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报告中有几处谈到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凡是这样的提法，毛泽东都删掉了“带路线性”四字，并指出，“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报告中有一段比较概括地讲到薄一波所犯错误的话，毛泽东在这里增加的文字较多。

“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的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这段文字中的黑体字，都是毛泽东增加的。从毛泽东增加的文字中，可以看出：

- 一、强调“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
- 二、充分肯定薄一波的工作有“相当”成绩；
- 三、强调“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
- 四、强调“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好了，周恩来的总结报告，可以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了。

8月8日，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薄一波：

“明天政治局会议，讨论总理的总结报告，你来参加，一定要参加！”

8月9日，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背向北墙，面南而坐，政治局委员们围成一圈就座。

会场气氛，透露出紧张后的轻松，严肃中的活泼。

总结报告顺利通过了。

毛泽东最后问他的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

回答他的是静默。

毛泽东又转向坐在西侧的薄一波：

“一波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薄一波回答：“我有错误，应当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但是有些具体事情，一时还说不清楚。”

坐在会场东北角的高岗嗖地站起身来，冲着薄一波大声说：

“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立即打断高岗：

“高岗同志，请你坐下。你为什么不准上书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检查，进行批评？哪里有这个道理呀！”

“有些问题还得说明一下，”高岗想继续为自己辩解。

毛泽东严厉地说：“不必了！大可不必！”

8月11日晚，在怀仁堂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全体大会。

大会由陈云主持，周恩来作总结报告。

8月12日，出席和列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齐聚怀仁堂。

毛泽东要向他们发表重要讲话。

周恩来的总结报告已经作过了，吵了两个月，总算划上了一个句号，可以打道回府了。许多人的眉心结已经解开，明白人也更加明白，有些人仍然不明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今天能听到伟大领袖的讲话，心情还是高兴的。

毛泽东还是那样高屋建瓴，爽快犀利，诙谐恳挚，侃侃而谈。

毛泽东说：

同志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做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

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分中，国家经济是领导成分。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

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相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领导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由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

义，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和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

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都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我，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在批评薄一波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

(1) 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2) 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

理也是很必要的。

(3) 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元是虚假数字<sup>①</sup>，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得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

(4) 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

(5) 扫盲，我开始是支持的，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

(6) 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一些希望。还有等等其他一些问题。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

---

① 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在这里加了一条注：“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

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由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

会场里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不说百分之百，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在掌声停息以后，陷入了更深入的思索。

毛泽东，一位受到全党尊敬和拥戴的伟大领袖，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不是官样文章，而是有一条条、一件件的事实。这，怎能不叫人反躬自问呢？毛泽东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压力，就减轻了，人们又怎能无动于衷呢？崇高而庄严的思想，在人们灵魂深处升华，而且迟早会在实际工作中，变成物质的力量。

从总的方面来看，这次财经会议并不成功。会议结束后几天之内，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这次会议，原意是要引导大家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但是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意图进行。

毛泽东在讲话中进行检讨，其本意也是希望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亡羊补牢，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改进工作。

可是，由于高岗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的会上和会外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党中央、毛泽东的意图未能实现。

■ 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放炮，饶漱石在中组部大闹。毛泽东说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说高岗同饶漱石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北京，成为共和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大约可以说开始于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结束以后，随着自然界的气温慢慢进入三伏，政治气温也愈加燥热。

毛泽东分别与方方面面的不少同志谈过话。

毛泽东说：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毛泽东说：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检查组两件事批评薄一波，也不能成立。

毛泽东还给各大区负责同志讲过话。毛泽东说：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等等，等等。

这些，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清楚的也会变成胡涂，像大米干饭被搅成稀粥一样。

毛泽东完整的讲话，被切割成一句句、一条条，像一幢房子被拆成一块块砖头，像一件衣服被撕成一条条布带，这些块块、条条，又被掐头去尾，丢三落四，就闹不清哪儿是哪儿了。

比如说，“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是错误的说法”，变成了“少奇有圈圈，是错误的”。

比如说，“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变成了“对呀，财经会上，就是批评‘圈圈’，毛主席支持财经会议，提出要消灭‘圈圈’”。

总之，各种传闻，各种消息，有从这里来的，有从那里来的，有从东边来的，有从西边来的，正面一枪，反面一棒，斜刺里又来一棍，这就乱了。

当然，从辩证的观点看来，乱也有乱的好处。什么说法都有，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就像吃一顿“思想自助餐”。这就可以检验人们的思想，检验人们的情操，检验人们的信念，检验人们的道德，检验人们的灵魂，也检验人们的“鼻子”——识别能力。在鉴别中觉得这个对的，就跑过来了，觉得那个对的，就跑过去了。越听越觉得自己对的，就更加坚定起来；越听越胡涂的，就缩回去，退出了。无论坚持哪种意见，都能从纷纭的“众说”中找到根据，都有继续坚持干下去的充足理由，理既直，气就壮。一次再次，时间长了，“日久见人心”，是钢是铁，自会分明。这就叫历史的筛选。

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饶漱石也在坚持着。他们就会内会外发生的情况，交换了意见。

他们共同的看法是：抓住这次会的时机，以新税制为突破口，突出路线斗争问题，明批薄，暗射刘，这些都是很对的，效果也很不错，弄得周恩来都无法收场，下不来台。虽然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的脸色不大好看，但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场，面对面，毛主席不得不那样做。可见，有毛主席在场的

时候，不能搞得太急，太过，这是一条经验。在公开场合，在大庭广众之中，有些人说点冠冕堂皇的话，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人，不过就那么回事。

他们认为：总的来看，这次会是初试锋芒，初显身手，成绩不错。事实证明，有利条件很多，余地很大，大有可为。结合人们自身的利益，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已经得到事实的证明，以后还要坚持这样做。

他们约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9月就要召开，中央的意图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这很好，总结经验，咱们还是抓两条路线，抓反右倾。刘少奇就怕反右。财经会上咱们是“批薄射刘”，组织工作会就来个“讨安伐刘”。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得狠狠整整他，就像对薄一波那样。

财经会议结束十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秘书报告饶漱石，高岗来电话了。

饶漱石拿起电话说，我正找你，哪儿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你哪儿去了。

高岗说，我出去办了些事，你快到我家来一趟。

饶漱石旋风般地到了高岗家。高岗告诉饶漱石：

可靠消息，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苏联那种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这可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就为这事跑，跑了好几处。罗瑞卿那里，陈云那里，我都跑了，还有几处。

最大的妨碍还是刘少奇、周恩来，主要是刘少奇。因此，我向他们讲，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应该修改。决议中说，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这不对头嘛，需要重新做结论。说刘少奇代表白区那倒可以。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咱们都是红区的。你看，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几乎都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红区的党”的干部有多少？既然要设

副主席，搞部长会议，再也不能让“白区的党”的干部篡夺党了。

我的来龙去脉，大家都知道，一个陕北，一个东北，再加个抗美援朝。这两个地方和抗美援朝，毛主席都是很重视的。毛主席想让我抓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他的“议会”，也就是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可以当个部长会议主席。其实，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还不如林彪当。林彪现在在杭州。我得赶紧到南方去一趟。组织工作会，就由你了。

最后，高岗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主要就是这事，我也听到了风声。再就是你说给我推荐点干部，得快一点，我在中组部的人太少。”

“好，走以前，我给你一个名单。”

“还有，原来东北局组织部的那位还行吧？”

“没问题，他可以在会上发言，我已经同他谈过了。”高岗略加思索，又说：“今后，中组部的工作可以以他为核心。你就不一定还管那些具体事了。”

“那好。”饶漱石那双小而明亮的眼睛，眨巴几下，心领神会。

“有些我自己不好说的话，你是可以说的。——当然，场合要适当。”这句话，饶漱石也一听就懂。

其实，饶漱石在中组部整安子文，早在财经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的7月中旬，就已经动手了。

那是在槐里胡同1号中组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

这之前不久，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和办公室主任赵汉，曾经带几个人，到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很不顺利，有些地方组织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阻挠。王、赵二人找到山东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反映，也没有结果。没办法，王、赵二人觉得工作进行不下去，就回北京了。后来安子文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

就为这，饶漱石在部务会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整整一个上午，饶

漱石声色俱厉，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指着安子文的鼻子进行斥责：

“有的问题，为什么不先向我反映，而先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你这是胆大妄为！你眼睛里没有我这个部长，我就要你认识认识我这个部长！”

“王甫、赵汉是新兵，他们听到枪声，不免有些紧张。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该听到一点枪声就……”

说到“就”字，饶漱石又站了起来，他过于气急败坏，找不到满意的词汇，也就“就”在这里，拉倒了。

7月中旬开始，整安子文的部务会，开了好几次。王甫、赵汉的事饶漱石也提过好几次，一会儿说这件事表明安子文是“支持条条反对块块”，一会儿说王、赵离开山东是安子文指使和纵容他们“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议”。饶漱石还指责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不发言表态，有抵触情绪，是“界限不清，嗅觉不灵”。

对于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政治局人员名单和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那件事，饶漱石一方面加以利用，在许多人中间私下传播，进行挑拨离间；另方面又利用来整安子文。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受到当面警告的处分，饶漱石仍然揪住不放。

刚来不久的部长，在部务会上没完没了地整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中组部的正常秩序被搅乱了。

饶漱石如此大整安子文，搅乱中组部，自有他的想法。刘少奇看来是肯定不行了，而高岗却锋头正健。许多人都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线上的人”，这可不好。高岗明确说过，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正好安子文在饶漱石手下当副部长，能狠狠整一下安子文，就表明饶漱石究竟是不是刘少奇“线上的人”，也会更加博得高岗的信任。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按中央的意图，开这次会，主要是总结组织工作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然而，身为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琢磨的可不是这。

饶漱石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次会同财经工作会衔接起来，如何与那次会配合得更好。上次会逮住了薄一波，这次会要逮住安子文。逮薄一波是因为有个新税制，这次怎么逮安子文呢？得把安子文引出来，使他成为众目睽睽的靶子。

怎么“引”呢？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安子文问饶漱石，是不是得准备一个工作报告。饶漱石说：不用了，不一定千篇一律，总是一开场就自上而下。这次可以先自下而上，先请各地和中央各部委的同志们讲，然后中央作总结，再自上而下。

安子文不了解这里面的机关，当然听他的，他是部长。

等到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饶漱石又突然对安子文说：

“看来，你还得有个工作报告。你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一定要向大会报告工作。不然，是说不过去的。”

安子文有苦难言。没法子，他还是组织力量，连夜突击，终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写出了报告。

安子文“引”出来了，饶漱石就好鼓动一些人放炮了。

讨论安子文报告的发言中，东北、山东，都有人扔出重磅炸弹。这些很有煽动性的发言，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对1953年以前的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说那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他们批判的是安子文，但攻击的矛头，一直在刘少奇的后背心上弄影。他们甚至要公开摊牌，要挟中央，要求改组中央组织部，夺取人事权。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

毛泽东批评饶漱石说：“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邓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解决中组部的

“饶、安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亲自主持领导小组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且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邓小平也在会上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安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很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高岗、饶漱石“讨安伐刘”的计策，又受到挫折。

当饶漱石失败了，并且受到了批评时，他对安子文说：

“我说你对财经工作会议有抵触情绪，其实不是指你，而是指刘少奇。”

这就叫嘴脸。

安子文，不过是中组部副部长，是饶漱石的副手；刘少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当着安子文的面可以这样说，那么，当着刘少奇的面，他又会怎样说呢？找出答案，大概不需要很强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吧？

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方式，关注着组织工作会议的进程和动向，并且从指导思想上、从全局上加以点拨，为的是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致像不久前的财经工作会议那样走偏方向。

毛泽东10月22日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信中说：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

“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的最后部分：《结束语》。这个《结束语》将布尔什维克党发展的基本教训，归纳

为六条：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其中讲到，“这个党要很勇敢，足以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很有经验，足以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很机敏，足以绕过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途中的暗礁。”

第二，工人阶级的党，不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便不能实现其为本阶级领导者的作用。其中讲到，“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善于拿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它，要善于拿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它，要善于发展它和推进它，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代替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第三，假如不把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第四，工人阶级政党，不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其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使命。其中讲到，“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也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第五，如果党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害怕承认和公开改正错误，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其中讲到，“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第六，工人阶级党不与群众发生广泛的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它就不能成为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党。其中讲到：布尔什维克党，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相像，“其所以强而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即与生育、抚养并把他们教导出来的群众保持着联系。”

毛泽东要求到会的同志学习这六条的意义，毛泽东的用心，似乎无须多说什么了。

第二天，10月23日，毛泽东审阅刘少奇和饶漱石10月22日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他在这两篇讲话稿上，各加了一段文字。在刘少奇讲话稿上加的一段文字是：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且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在饶漱石的讲话稿上加的一段文字是：

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这两段话，都讲到总路线，毛泽东在指导一切工作中，都是抓住这个总路线不放，而且抓得很紧。

值得玩味的是，他在给饶漱石加的这段话中，提到了“时机”。毛泽东说的是革命的“历史的时机”，而在饶漱石心目中，“时机”倒是时机，但不是革命的历史时机，而是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毛泽东说到“全神贯注”。饶漱石呢？“全神贯注”倒是“全神贯注”了，但不是干这，而是干那。毛泽东说“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能够……”，他的意思是：你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你这个“组织部门”的总头儿，首先得“能够”，可饶漱石偏偏不“能够”。在饶漱石念这段文字的时候，应当加一句话，即：“唯独我不能够。”

历史又同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又进错了房间。

■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 8 号（即高岗的住处）车水马龙。

高岗同饶漱石上次谈话的第二天，便登上飞机，一翅膀飞到了杭州。离开东交民巷 8 号（高岗的住处）赴机场的时候，高岗提醒秘书说：“这次我们外出，时间不短。最近毛主席身体不好。你的耳朵要灵一点儿，一旦得到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记住了！”

高岗到杭州安顿下来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林彪的住处。

一阵寒暄过去，林彪说：

“你现在也是‘主席’了。听说你要去大连，可是你却作‘东南飞’了。”

“原来倒有那个想法，最近，北京有些新情况，我想见见你这个林总。”

“什么新情况？财经会的情况？财经会上是不是很热闹？”

“财经会倒还可以，刚开始嘛，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我说的是财经会后这几天的情况。”

高岗停下来，望着林彪，想看看他的反应。

林彪什么反应也没有，等待高岗说下去。

“中央提出，从国家行政机关来说，是不是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这就要有部长会议主席；从党中央来说，是不是增设副主席，或者设总书记？”

“啊！”这倒真是新情况，林彪想。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位高麻子来者不善，只是“啊”了一声，仍然镇定地等高岗往下说。

“我想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国，党的问题，枪的问题，红区问题和白区问题。”

诡诈的林彪，立即明白了高岗要说什么，但他也暗暗吃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高麻子也学会了来这一套，看来，这家伙真是费了一番脑筋。

“毛主席说过，有了枪就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对不对？”

“对！这我记得，就是《战争和战略问题》那篇文章。”林彪说。可见林彪对这个问题也想过，至少是很熟悉。

“我觉得，在中国，党是军队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他刘少奇拿了几天枪？他不是一直在白区混吗？他算什么‘党在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这个结论要改变。咱们一直是拿枪的。党本来就有两个，一个军队的党，一个白区的党，主体应该是军队的党。可倒好，白区那些人，就是刘少奇那个圈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里掌握权力。凭什么刘少奇的屁股总是搁在我们头上？！我就不服这个气！主体就要像个主体的样子。主体的代表人物，你林总当然算一个，我也应该算一个。现在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毛主席越来越不重视刘少奇了，越来越重视咱们这些拿枪造党的人，重视军队的党。咱们一直是跟着他的。给长征提供落脚地的人，现在还有谁？东北怎么样？这你很清楚。东北就是先进嘛！东北的先进，东北的正确，东北创造出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一贯的。所以，毛主席有个打算，我来主持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部长会议主席，他想让周恩来当。我向他建议，周恩来当不如林彪当。你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

高岗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有些还很打动林彪的心，所谓“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他终于说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支持你。刘少奇一定要拉下来，周恩来可以当个闲差。只是，我的问题，就不用提了。我身体不好，不必掌什么实权，要误事。当然，话说回来，我的身体不好，还不是当年拼命拼的？上战场，枪一

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不就是这么过来的？”说到这最后几句话，林彪还真是有点动情了。

高岗看在眼里，赶紧说：

“林总，咱们够推心置腹了。我的意见是，不要设什么总书记了，就多设几个副主席，咱们军队的党，都上去，林总你上，我也上。”

就在高岗说话的这么一会儿，林彪就从方才的情绪中清醒了过来，坚决地说：

“高主席，就这么着吧，我的事不提。你完全可以作为根据地的党的代表，上去，设副主席你就是副主席，设总书记你就是总书记。你身体又好，正当年。只要你能上去，有个代表，就行了，咱们分什么你、我？不要争这些个人的东西。我们可不是争什么个人的权力啊！”

林彪的高调，还真的堵住了高岗的嘴，使他一时语塞。高岗大概没有想到，林彪这几句话，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你的客人不少吧？”高岗问。

“总有一些，南来北往的，见见面，聊聊天。”

“最近的这些情况，你倒也可以同他们聊聊，多一张嘴，多一份力量。”

“这倒是。不过也得当心点，事情很复杂，人更复杂。”林彪像是提醒自己，又像是提醒高岗。

“你的夫人出面谈也可以嘛，她那么能干！——她，人呢？”高岗一边说一边向房间里扫了一眼。

“她今天出去有点事儿，不然她那么老实？”

“就说我问她好！”

“好！”

高岗同林彪见面后的第三天，又去陈正人那里游说。

在陈正人面前，高岗除了鼓吹“枪杆子上出党”、“红区党”、“白区党”以外，在谈到谁应出任中央副主席的时候，调子可全变了。他不说林彪可以当副主席，而是把林彪贬了一通，说林彪不过打了一些仗，他高岗却保

住了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成了中央长征后的落脚点，新胜利的出发点。现在要大规模搞经济建设，林彪只能打打仗，会打仗的人多得很，上来他一个，怎么摆得平？而他高岗，既能打仗，又能建设，他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林彪没有。在东北，林彪不过挂个名，日常实际工作，都是他高岗主持。高岗告诉陈正人：毛主席说了，看来，林彪不如高岗，排名次序列，过去是林彪、高岗，现在应该是高岗、林彪了。

高岗就这样当着甲说乙、当着乙说甲、当着丙说丁、当着丁说丙地游说了一通，封了一些官，许了一些愿，谁可以进中委，谁可以进政治局，谁可以当部长。此外，就是找女人跳舞，要女人陪着游山玩水。

混了一个来月，高岗又飞到广州。到广州后，找了陶铸，还有军区的几位干部。游说的内容，无非是毛主席不信任刘少奇，刘少奇的地位在七大上捧得太高，毛主席现在赏识的是他高岗。毛主席说，现在是经济建设时期，搞建设要借重高岗，高岗在东北搞得有声有色，中央的很多决策，都是依靠东北提供的经验，东北就是特殊一些。毛主席还说，高岗同志如果不在北京，本人（毛主席指自己）外出休假就不放心了。

11月上旬，刮起了秋风。

正当北雁南飞的季节，高岗从广州飞回了北京。

高岗哪里知道，他在华东、在中南地区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地进行游说的时候，北京的空气变了。

作为中国共产党首脑的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了高岗、饶漱石的不正常表现。

高岗回到北京，听饶漱石诉说了组织工作会的情况，和他受批评的情况。高岗一拍胸脯：

“我找毛主席说说去！”

高岗真的去了。高岗向毛泽东诉苦说：

“饶漱石同志现在心情很不好，同志们，包括中央，对他有很多误会、

误解。他要我向您解释一下。”

毛泽东说：“哎呀，你高岗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呢？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毛泽东的话不咸不淡，莫测高深，一个软钉子把高岗碰了回来。

12月，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毛泽东为了减轻一些自己的负担，提议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

紧跟着，毛泽东要外出休假，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

高岗本来就心急火燎，方寸已乱，又来个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简直是不能忍受的强刺激。刘少奇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高岗得知，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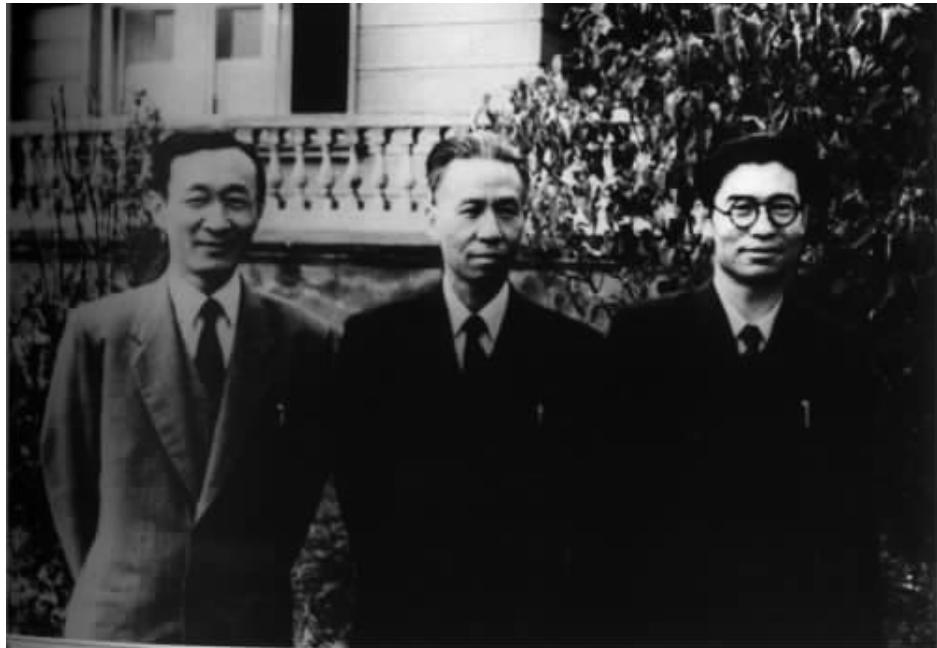
为了当上党的副主席，高岗又四处游说，今日找张三，明天找李四，办法还是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有两个人物，在高岗心目中分量不轻，但又把握不准，经过反复琢磨，还是觉得硬着头皮也得碰一碰。这两个人物就是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搬兵”搬来的陈云和邓小平。高岗要想在中央取得多数票，陈云是非找不可的。从大区的各路诸侯来看，东北是他自己，华东是饶漱石，中南是林彪，这三路都无问题，西南一路就是邓小平。

高岗必须找陈云和邓小平谈判。

高岗同陈云的谈判，干脆利索。他对陈云说，我反复想过，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有我一个。陈云笑了笑，然后开门见山：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

高岗对邓小平，倒是多说了几句。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现在，毛主席要分一、二线，设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并不成熟，他还是去干点力所能及的事为好，何必占这么重要的位置？邓小平也多说了几句。他说：我的态度很明

确，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高岗与刘少奇（中）、王稼祥（左一）在莫斯科

陈云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作了反映。

陈云当时就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sup>①</sup>的原则。”

一两天以后毛泽东同罗瑞卿有一次特殊的谈话。

毛泽东问罗瑞卿：

“我退到二线怎么办？你看，第一线由谁来主持？”

罗瑞卿答：“主席退居第二线，当然由少奇同志来主持第一线。不过……”

<sup>①</sup> 清末民间秘密结社之一，称首领为老大哥。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会众多属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退伍军人和游民，也有地主分子掺杂其间。到后来，往往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摘自《辞海》）

毛泽东说：“不过什么？！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上的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若有所思。然后，把目光投向罗瑞卿：

“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到时候林彪也给扔到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哎呀，主席……”罗瑞卿受到很大震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的鼻子要学得灵一些，凡事要多嗅一嗅。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毛泽东说。

这次谈话后不久，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小会。散会后，有几个人没有走，周恩来、朱德、罗瑞卿，还有高岗。

毛泽东说：“我向几位再交代一下，我要去南方休假。照惯例，我不在北京的时候，由刘少奇同志代理。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说到这里，毛泽东用右手比划着向上：“中央的风这样吹。”毛泽东的手势又转向下：“他的风却这样吹。我们大家要注意。赞成不赞成？”

高岗很不自然，满脸通红地跟着别人回答：

“赞成。”

当天晚上，高岗突然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是要到家里来看罗瑞卿。

罗瑞卿说，请你不要来，有事我到你那里去谈。

高岗说，确实有些事要同你谈谈。

罗瑞卿放下电话，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快去，看他讲些什么。

罗瑞卿到了高岗家，高岗对罗瑞卿说，要很好地注意主席的健康，主席检查身体的时候，一步也不能离开，要看好，可要千万注意，不要马虎。

高岗还说：如果采取部长会议形式，我赞成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

正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

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前些日子听了毛泽东的谈话，罗瑞卿可以说是“理解”了高岗。现在，当高岗的话一出口，罗瑞卿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想干什么，而且也分明感觉到他的不自然。

罗瑞卿暗自高兴。他从容地回答高岗说：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检查身体时也决不马虎。至于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我估计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何况，林彪现在身体也不好。

高岗再也无话可说。

罗瑞卿随即告辞。

12月中旬以后，为了揭露和遏制高岗、饶漱石的非法活动，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中进行了紧张的工作。

毛泽东首先派陈云南下，沿着高岗游说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嘱咐陈云转告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变了再与他联合。”

12月9日，陈云离开北京，先后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有关负责人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在杭州，陈云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最近的不正常活动，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么，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可能自杀。”陈云很快把他同林彪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以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副主席。”

12月17日，毛泽东找陈云、邓小平和周恩来谈话。12月18日、19日，继续找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两次。12月20日，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同一天，又找刘少奇谈话，同周恩来谈话。12月21日，同朱德谈话；同日，再次与陈毅谈话。12月22日，与彭德怀再次谈话。

12月23日，毛泽东直接找高岗本人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毛泽东说：送你一句话，叫“独坐防心”。我看你是有野心的，这个野心还不小，不是鸡蛋那么大，而是鹅蛋那么大。桌子有两面，一个上面，一个下面，上面是阳面，下面是阴面。有意见，有想法，摆到桌子上面来，这是阳面，不要在桌子下面搞，那是阴面。阳面是合乎党的纪律的，阴面就是非组织活动，是违反党纪的。你不要当头，你的“头”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还有东北局那一摊子。不要在阴面当什么头了。中国历史上有过“清君侧”。那不过是幌子。凡“清君侧”者，大都想搞名堂，凡“清君侧”者，几个有好下场？你要注意。不要骄傲，不要逞英雄，要团结。曹操讲：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你的志不“大”，谋也不“良”。你把别人都打倒了，剩下不多几个孤家寡人，这个志还大得了？狭隘得很嘛！你要反省，作自我批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你改，下决心改，切切实实改！

同高岗谈话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了个小会。

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共二十九人，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

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今天就去杭州，要休假，这个“假”，是假“假”，不是真假，因为还有事。这个事，就是带几个秀才，去考虑起草宪法草案的事。

然后又讲到他不在北京的时候，照惯例，由刘少奇主持中央的工作。

接着，毛泽东从容而严厉地说：

我现在宣布，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以我为首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

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这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

“两个司令部”，简单明快，重若千钧。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在这样高层次的重要会议上使用这个提法，还是第一次。

所有出席这次会议的高级干部，都能感到毛泽东这些话的政治分量。

高岗受到的震动最大，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已经到了相当相当严重的地步了！毛泽东同高岗个别谈话时，叫他不要在阴面当“头”，现在公开说有两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的司令，无疑是高岗了！水落而石出，高岗已经无可挽回地浮出了水面，他感到地动山摇了。高岗觉得眩晕。

一阵眩晕过后，高岗又冷静一些。他想，箭已经射出去了，子弹出了枪膛，收是收不回来的。毛泽东说什么“车水马龙”，“门可罗雀”，有些言过其实。但是，经过几个月来，从北到南、从南到北的活动，效果不错，不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有了一半了。可现在情况又难说。那几个月的活动，是由于借重了毛泽东，毛泽东不看重刘少奇、周恩来，而看重他高岗，才有了效果。如果像政治局会议这个调子，毛泽东自己站了出来，那就可就是山崩地裂了！高岗又有些眩晕。

稍微清醒一点以后，高岗该琢磨下一步该如何动作，得想一想出路何在？

毛泽东说高岗要打倒一大批人。这些人现在一个也没有倒，俺再也不打了，不也就拉倒了吗？

毛泽东要高岗反省，决心改正错误。那就作自我批评吧，那就反省吧！

要不打回老家去，还回到陕北黄土高原上去？几十年的革命，算白干了还不行？俺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

还有什么呢？要不，干脆，要脑袋有一个，要命有一条，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一不做二不休，有多少劲就使多少劲，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是鸡蛋，你是石头，也要弄你一身腥！

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重点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第七号炼铁炉，已于1953年12月相继提前竣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重大胜利。

1953年12月21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写信给毛泽东报喜。25日，毛泽东复电，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以及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高岗收到了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报告并鞍山钢铁公司的信件。报告和信件说，26日，钢都鞍山将隆重举行三大工程的开工生产典礼。典礼上，要发奖，要给毛主席献礼，还有三大工程现场的剪彩活动。此外，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要来参加，我国政府得派相当的领导人出席。

12月22日，捷沃西安已到达北京。

高岗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明确答复高岗：

“已经同中央商量过，此事非你莫属。从地方来说，你是东北的第一把手，你一定得出席，谁也不能‘代庖’；从中央来说，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代表中央，中央也就不必再派人了。从外交礼仪来讲，接待捷沃西安，你也是相当的。你在讲话中可以代表毛主席表示祝贺，他们的献礼，你也可以代表毛主席接受。毛主席给鞍钢职工的复电，请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去念，这我已同他说好了。”

周恩来布置任务、交代工作，总是这样周到，滴水不漏。

按高岗的本意，他是又不想去，又想去。说不想去，是因为中央的重大决策，好像到了紧要关头，一种力的较量，他越来越处于劣势。这关头，多一份力量还是少一份力量，早一个小时还是晚一个小时，那结果就可能差远了！眼看着一场大戏的高潮就要来了，而自己又是半个主角。偏偏在这时候，要他煞车，要他离开北京！说想去，因为东北地方是他高岗的天下，在那里，他咳嗽一声都是命令，在睡梦中都有一种大丈夫的感觉。而且，捷沃西安来了，可以乘机向他一诉衷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和平民主阵营的头”，这个钟馗真的拉下脸来，再大的鬼也得怯三分。

12月25日，高岗终于陪同捷沃西安乘专车到了鞍山。

12月26日上午九时，钢都鞍山举行三大工程隆重的开工典礼。

高岗是主席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因而他找回了从前的感觉，频频向鼓掌和欢呼的群众挥手敬意。

高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的结尾是三句口号：

中苏两国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阵营万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沿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前进！

捷沃西安也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话结尾的三个口号是：

中苏两国人民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把这两篇讲话的结尾对照一下，人们也许会发现，高岗是在侧重某种东西，同时也在避开一点什么。这也许是高岗深层次内心活动的反映。

高岗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声音洪亮地宣告：“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表示热烈的祝贺！”

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的厂长，代表全体职工把新产品无缝钢管和重型钢轨，献给毛泽东；在礼品上，工人们亲手刻着表示敬意的词句：“献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岗代表毛泽东接受了献礼。

当天（12月26日）下午，在三大工程现场分别举行了剪彩仪式。高岗先后到三大工程现场剪彩。每一工程剪彩之际，人们热烈鼓掌欢呼，机器发出

轰鸣，掌声和机器声响成一片。

高岗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一方面完全找回了在东北时期的那灿烂辉煌的感觉，另方面，也深深感到苦和酸。而这苦和酸，来势汹汹，几乎淹没了那辉煌与灿烂。

12月25日，高岗陪捷沃西安到达鞍山。29日，又陪捷沃西安到了沈阳。30日，又陪捷沃西安到北京。这五六天时间里，高岗一直在寻找机会，向捷沃西安一诉衷肠。由于人多眼杂，这机会只有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和回北京途中，才被高岗找到。

“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高岗急不可待，没头没脑地对捷沃西安来了几句。

捷沃西安觉得这是个怪问题，便毫不迟疑地回答：

“当然要消灭！不消灭资本主义还叫什么社会主义？”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觉得自己又从苏联老大哥这里找到了同志，找到了知音。但他又抱怨：

“可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闹得现在日子都不好过。请你回去一定报告苏共中央，就说中国党的中央里面，有人反对我。”

“这个我可以做到。”捷沃西安关切地望着高岗，“你也得多加保重。”他想起了科瓦廖夫打报告的事情。

“我倒觉得该豁出去就豁出去！我到中央以后，还不如在东北，现在一点实权也没有了，什么都得听人家的。”

说完这句话，高岗又把他在心里翻腾的那些事情抖搂一遍：什么刘少奇有“圈圈”，就是白区地下工作的那些人；周恩来有“摊摊”，就是跟他在国民党上层打交道的那些人。他高岗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正统，井冈山的人是正统，陕北的人也是正统，高岗和毛泽东都是正统这一边的。从这一点上说，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中间，他高岗算是同毛泽东有点“血缘关系”，其他的都不行。不过，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毛泽东又不赞成高岗，而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调子相像，或者说，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

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而不支持高岗。

捷沃西安很注意地听着高岗的唠叨，但一言不发。作为苏联领导层成员之一的捷沃西安，他的见解不可能超越出他那个集团之外；但是，曾经有过科瓦廖夫的前车之鉴，他表现得更为谨慎小心。

第四章

..... — 夜心潮

——毛泽东心头掠过的风云

## ■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 犯错误，哪一次不是同斯大林有关？

捷沃西安在高岗面前的谨慎，不为多虑。远在西子湖畔刘庄一号楼的毛泽东，很快知道了高岗此次东北之行的种种蛛丝马迹。

毛泽东立即把三年前师哲翻译出来的科瓦廖夫的报告调来，认真看了一遍。

这份材料，有捕风捉影的猜测，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夸大，有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也有一些是中国党领导层中的议论。

不论从哪个方面、哪个意义上说，告这种“洋状”，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放下科瓦廖夫的报告，已是暮色苍茫了。毛泽东向后微微仰了一下身子，双臂轻松地搭在沙发扶手上。透过白色的钩花窗帘，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

这就是江南的雪啊！就是鲁迅笔下的“滋润美艳之至”、如“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的江南的雪。

然而，毛泽东的思绪，却旋转而升腾。

从此刻的暮色苍茫，到次日的曙光初露，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峥嵘岁月，掠过毛泽东的心头……

审视中国革命的历程，有两样东西最使毛泽东感到恼怒，也最能触动他警觉的神经。这两样东西，一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在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不适当干预（此之谓外部的干预），二是有人在党内制造分裂

(此之谓内部的分裂)。

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从党的一大到五大，陈独秀当过中央局书记，当过总书记。这个时期，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党的路线、方针，当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陈独秀又是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的。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党的“上级”，而斯大林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者。那么，陈独秀错误路线的根源，就不可能不涉及斯大林。

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两个大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党，对这两个党及其关系的认识和处置，稍一不慎，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斯大林在这样一个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上，有过失察，有过错误。斯大林把明明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看成是“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要共产党处处迁就它。这种错误，就成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主要根源中的一个。

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这个阶级最集中，最有纪律，这个阶段最无私无畏，这个阶级特别能战斗。毫无疑问，这个阶级（通过它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斯大林又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原则上，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农民的领袖。但是，他又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因而，“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斯大林的这种错误认识和理论，于1923年1月，被共产国际用“决议”的形式，要求中国共产党接受并且付诸实践，这就是那个《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中间派向两极分

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的时候，斯大林却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协派”，并且认为“妥协部分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

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又一个带根本性的错误。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势力，一而再地妥协，一而再地退让，其理论依据，就是斯大林的这个根本性错误。斯大林的这个错误，也就成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又一个主要根源。

其实，对中国革命的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是早就解决了的。1925年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为着反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而写的，这两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共同点是：忘记了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感到力量不足，就要寻找力量，争取同盟军。不要农民而只看到国民党，只知道从国民党那里寻找力量，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不要农民而只看到工人，只注意工人运动，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应该这样解决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也说了：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革命高涨时，这个阶级会分化，它的右翼，会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的。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不听这些。当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一步步反共的时候，陈独秀仍然坚持不要农民而依靠国民党；在北伐战争中，还指令共产党员在军队和政府中向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退让。

1926年10月，斯大林让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斯大林的这个观点，还是不要农民，只知道联合国民党。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贯彻斯大林的指示，认为当前最主要的倾向是“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对土地革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议作出决议，中心内容是“防止我们过于向左”。

这个错误的决议，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出的，并且是在共产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导下作出的。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因此而进一步统治了中共中央。

头顶上压着个陈独秀，陈独秀后面有个斯大林，毛泽东实在无能为力。他只得回到湖南，脚穿草鞋，手拿雨伞，用了32天时间，行程700公里，实地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他想用事实来说话。

1927年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了。毛泽东满腔热情地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呼吁革命的党派，应当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农民运动，而不能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对立面去反对他们。

斯大林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观点，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因之而有增无减，恶性膨胀，一错再错。蒋介石、汪精卫一再得手，相继背叛革命，并且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于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便以最后的大失败而告终。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于大革命失败的同时，宣告破产。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过后，就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了。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共产党员由六万多人下降到一万多人。

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9月9日，湘赣边界爆发了工农武装举行的秋收起义。十天以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决定实践毛泽东的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转移，保存实力，再图发展。接着，毛泽东率部走遍了罗霄山脉，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实行军事割据。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观点，即：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这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国主义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这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叛离）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以后为第三阶段，这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将成为事实”。

斯大林的这些观点，通过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直接灌输给了中国党。

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完全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会后即制订《中央工作计划》，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革命性质问题上，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不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要推翻地主阶级，“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在革命形势问题上，否认大革命失败后明明存在着的低潮，而说“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在革命方针上，认为应当组织全国总暴动。中央先后布置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总罢工，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

国际代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规定政治纪律，并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当时中国人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没听说过。这个“决议案”认为中共湖南省委对秋收起义的指导，“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成了罪过。周恩来等人搞的南昌起义，也成了问题。执行这个“政治纪律”的结果是：给中共湖南省

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解除了毛泽东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给周恩来以警告处分，还牵连到南昌起以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一打就是一大片。

中共史上就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他的“盲动”，还不是从斯大林那里压下来的？

想到这里，毛泽东眼前浮现出那张戴着眼镜、端庄清秀、文质彬彬的脸。

毛泽东还记得，就在三年前的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的出版写过的一些话：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为人民工作的精神、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还想起发生在1927年的两件事。一件是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泽东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从长沙回到武汉，便致信中共中央，说自己的报告很快就会写完，并上报中央，希望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送到中央以后，《向导》只摘登了部分章节，未发全文。瞿秋白不服，由于他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便交给武汉出版单行本，并且亲自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另一件是1927年9月底，瞿秋白在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长江局人选时，提出要有毛泽东参加，他说：“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想到这些，毛泽东不禁黯然神伤。

斯人已逝。他遗留下来的经验教训，不能忘啊！

依次而下，就轮到毛泽东的大同乡——湖南醴陵人李立三了。

李立三进入中央，并且成为党中央起主要作用的领导者，这件事本身就有些滑稽意味，而且根源也在共产国际。

那时，组织工作中有一条，叫“领导干部工人化”，工人干部被当作偶像。在“六大”上，张国焘和瞿秋白发生争执，布哈林就出来讲话，说是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六大”75个代表中，工人有41人，选出的36个中央委员中，有21个是工人。大会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选为总书记，实际上起不了总书记的作用。向忠发曾经是李立三领导下的一个地方工会的负责人，水平较低，对李立三十分敬佩，认为李立三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就逐渐扶植李立三，使他在党中央起着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1930年6月上旬，身为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在中央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暴动，认为上海或武汉，很可能爆发革命高潮。李立三认为，“现在则是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充实”。李立三认为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主张。决议认为，“总的形势，都表明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了”，“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

紧接着，李立三制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计划规定各地红军的任务是：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北

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各路红军向武汉进逼，“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6月15日，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信中还批评毛泽东等“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还指示前委：“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这样的语气和措辞，比强迫命令还厉害，简直近乎恐吓了。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我们党内虽然只统治了3个多月，但是党却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重要原因是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

1929年一年之内，共产国际陆续来了4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其中10月26日那封信影响最大。那封信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那封信还认为：“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

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的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

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然而，斯大林却说：“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以及“苏联中心”论，把俄国的城市武装起义经验模式化、绝对化，一再强调反右倾，一再指令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这些都是形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重要因素和直

接来源。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氏。

一想起王明这个名字，毛泽东就觉得胸中有一股火苗往上窜。

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统治的时间更长，更有“理论”，形态更完备，欺骗性也更大，流毒更广，造成的损失也更大，后果更坏。在促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形成并且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件事情上，共产国际的手伸得更长，做法也更粗暴，更无理。

20年代，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苏联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善于钻营，在学校内部斗争中，王明是支持副校长米夫的。米夫在俄共党内斗争中是支持斯大林的。斯大林重用米夫，王明也因而受到青睐。王明跟着米夫，在中山大学搞了一系列宗派活动。



部分中央领导在陕北合影。右起第6人为王明

1930年12月上旬，米夫突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米夫来中国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把王明抬进中共中央。为达此目的，米夫竟然直接插手干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全会召开前，米夫就起草好了会议决议，还拟定了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候选名单，声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米夫极力美化王明，说王明在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已经是“天才的领导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王明是百分之百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而国际路线是绝对正确的，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就是反对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就在米夫威胁利诱之下，年仅26岁，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了政治局委员。

王明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成了惊弓之鸟，在征得米夫同意后，他又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博古搞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同王明一样，王明便在出国前，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决定由博古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王明再三叮嘱博古：“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王明到苏联后，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这样，就形成了斯大林——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博古这样一个干预中国革命的体系。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甚至赞成毛泽东的斗争策略的不少领导人，也受到排斥和打击。毛泽东本人，最后连军事领导职务也被撤销，丧失了军事指挥权。

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之时，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和李德，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不放弃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等错误的口号、方针和方法，命令主力红军北上应敌，结果是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力挽狂澜的建议，一次次被博古、李德拒绝，有利的战机一次次丧失，国民党军屡屡得手，我军一再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

最后，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切希望都落空，只剩下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这一条路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共中央达四年之久，至此才告结束。

遵义会议是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的时候召开的，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必须解决的军事问题，解决了自己内部的组织问题。

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时隔两年，又冒出了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搞右倾投降主义的，还是这个王明。

1937年，经“七七事变”和北平、天津的沦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高涨，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总动员，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的抗战。至1937年8月，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指出：“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

可巧正在这时候，共产国际将王明派遣回国，11月29日到达延安。王明到达延安第十天，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王明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王明的身份是中共驻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开过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党的任务。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共要运用法共“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

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王明自己有这种身份，这是一；共产国际的领导又有这些意见，这是二；他这次回国是共产国际特意派遣的，这是三；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的一个支部，这是四；此外，再加上王明吹吹乎乎，打着斯大林的旗号，因此，他的一切意见，便都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党下达的命令，中国党只能照办，只能执行。

由于这些原因，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陷于孤立，只是由于毛泽东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到底，王明的错误意见才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其后，王明又到武汉擅自发表文章和讲演，继续宣扬他的错误主张。1938年春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继续坚持他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喊，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

由于王明回国后对中央路线的冲击，妨碍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的执行。1937年冬至1938年春，华中敌后未能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抗日根据地，就是在工作中造成的直接危害。

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中正确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在这种情况下，9月29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

■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闹分裂，企图用武力危害中央。叶剑英将张国焘的密电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你办了一件好事！”

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张国焘闹了一次右倾分裂主义。回想起同张国焘的那场斗争，颇能让人想起鲁迅所描写的“偶经生疏的村外，一声狂嗥，巨獒跃出”，那样一种令人紧张的情景。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以后，蒋介石调动大军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妄图各个消灭红一、红四方面军。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后，终于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广大指战员欢腾雀跃。毛泽东当时就指出，这次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红一、红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会师后，党中央及时提出，今后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张国焘却心怀鬼胎，把红四方面军当成了他个人的资本，



毛泽东与张国焘在陕北

自恃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一方面提出同中央相反的方针，即要“创造川康新大局面”，实际上是向西部荒僻地区（川康、青海和新疆）退却，另方面向党中央伸手要权要官。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张国焘在一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人中，运用请客吃饭、送钱送物、关心体贴、吹吹拍拍等手段，进行拉拢和挑拨，破坏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同时制造和散布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流言蜚语。

会师后，党中央从工作出发，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国焘一方面表示赞成，一方面又诬蔑说，这样作是表明中央急于控制四方面军。张国焘觊觎的是党和军队的最高职务。

当时党中央负责同志顾全大局，主动让位。在一次会议上，张闻天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担任，张国焘立即喜形于色。毛泽东断然否定了这一建议，提出这是遵义会议的决议，不能推翻。接着周恩来提出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是指挥全军军事行动的三人小组成员，放弃总政委职务，既不影响大局，又作了妥协。毛泽东立即赞成这个意见，建议速作决议。于是张国焘便当上了红军总政委（总司令是朱德）。会议规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指挥。

张国焘仍不罢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并且要求把“他的人”更多地补选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才召开沙窝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坚持错误，极力吹嘘自己，同时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进行指责。与会的多数同志，对张国焘提出批评。会议决议指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张国焘被迫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关于增补四方面军的干部进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党中央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北上，也作了让步。会议决议特别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切有意无意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沙窝会议后，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右路军包括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

领，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包括红五军团、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和军委纵队另一部，由朱德总司令率领，实际上是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中央决定：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前进；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再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

张国焘一到阿坝，就违反中央决定，按兵不动，并多次抗拒中央要他抵达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坚持红军应向青海、新疆发展的逃跑主义。不仅如此，张国焘还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命令右路军放弃北上，跟随左路军南下。

三军军长彭德怀当时对这种形势感到非常忧虑，经常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动向。

据彭德怀《我的自述》中回忆，一天下午，彭德怀问毛泽东：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路，已经走了两天，这里只有三军团。四方面军如果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说：“不可。”

赤胆忠心的彭德怀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心里非常难过：一军团已经北进了，如果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强迫三军团南进，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就在彭德怀离开毛泽东住处不到两个小时，叶剑英急忙送来张国焘给陈昌浩的一份密电。据当时前敌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回忆，电文中说，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即北进），同右路军一起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说：“叶剑英同志，你办了一件好事！”

情况危急，千钧一发！

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即巴西会议，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



巴西。1935年8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在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之际，彭德怀派了十一团秘密保卫中央及毛泽东的安全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为了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中断了许久），派中央代表团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张浩完全支持中央的路线。1936年1月22日，中央通过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并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随后，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张国焘自知他的所谓“中央”，本来就是他自己搞的，是违反党纪的、不合法的，如

军、抗拒党中央命令，并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的罪行。会议决定，立即率领中央机关、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脱离危险区域。

在一个乌云满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杨尚昆等领导人，踏上了北进的征途。

张国焘一意孤行，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5年10月5日，竟然另立“中央”，召开高干会议，宣布他“钦定”的“中央”组成人员名单，自封为“主席”，并且狂妄致电中共中央，宣

果共产国际一旦公开否决，局面就更加不可收拾。

张国焘对抗中央命令率军南下的初期，因朱德等领导人指挥得力，在打破蒋介石的围剿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后来屡屡碰壁，军事上接连失利，完全证实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预料：从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各方面看，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另外，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一直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同党中央会合，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由于这种种因素，张国焘才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准备北上。

又经过四个多月的曲曲折折，张国焘也到了陕北。但他一直口是心非，坚持错误，与党对抗。最后，于1938年4月4日，借参加国共双方祭拜黄帝陵



到达陕北的张国焘（后排左三）与毛泽东（后排右一）等合影

之机，离开延安，竟然一个小差开到了蒋介石的怀抱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

由于叶剑英及时送来张国焘那份密电，使毛泽东和党中央得以脱离险境，每当回想起那时同张国焘的斗争，毛泽东总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毛泽东后来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直到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同张国焘的斗争时又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 ■ 毛泽东想：斯大林没有了，会不出“斯小林”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的长空中神游一番以后，回到了西子湖畔。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1943年解散，存在了整整24年，正好三个“八年”。这三个“八年”，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斯大林……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他自己的评价。

对于中国革命，斯大林确实做了一些错事。提起斯大林做的错事，毛泽东简直有三肚子火。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是打过长江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同国民党“划江而治”，使革命半途而废？在这

个重大问题上，斯大林表现暧昧。1949、1950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然而，这并不是一切。斯大林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任务的估计，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带指导性的正确意见，仍然是主要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是斯大林。唯一给新生的共和国提供急需的人力和技术支援的，也是斯大林。这些援助，虽然有限，但非常宝贵，有了它，新中国在国际上才没有成为“孤儿”，才站稳了脚跟。这些，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10个月以前，斯大林逝世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深情而沉痛地悼念这位伟大的友人。

斯大林对中国问题发表过错误意见，一方面是他思想上的问题，一方面是误听谗言，上了别人的当，先是上了蒋介石的当，后来又上了王明的当。

斯大林毕竟是讲理的。对他的错误，你顶一顶，他会认识、会改的。

现在，斯大林没有了，会不会出现“斯小林”呢？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

很可能出。也许不止一个两个。

这些“斯小林”们怎么样？

他们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你顶一顶，他能认识、改正吗？

斯大林后来还是撇开了王明，不支持王明了。高岗向斯大林告洋状，斯大林能够交出来，当面交给毛泽东。这种事，“斯小林”做得到吗？

如果“斯小林”没有斯大林那样的水平，那样的理论修养，而在大国沙文主义方面，在以“老子党”自居方面，倒是超过了斯大林，那怎么办？

谁能保证中国党内不会出现王明式的人物？

斯大林误听王明的话，都闹到那步田地，倘若“斯小林”同王明式的人物纠结起来，会怎么样？该怎么收拾？

谁能保证中国党内不会出现张国焘式的人物？

高岗的权力欲，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在党内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包括使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的手段，都很有些像张国焘。所有这些，在近几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五三年的财经工作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以来，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了。

然而，当时的张国焘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支持，相反，倒是他们借重这个钟馗打了一下鬼。现在，“斯小林”们是很可能成为高岗手里的钟馗的。也就是说，高、饶闹事，很可能导致“外部的干预”和“内部的分裂”二者的结合，那问题可就大了。“外部的干预”，会使中国党不能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内部的分裂”，会使中国党无法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去奋斗。这两条中的一条，就足以断送中国革命，何况两者结合？

无论如何，高、饶的活动，必须到此为止，不能让他们再发展下去了。“毋使滋蔓，蔓难图也。”古人总结的这条经验，是很对的。

毛泽东的决心更加坚定。

毛泽东撩开窗帘，东方已经发白了。雪，也停了。

毛泽东的神思登上了刘庄近旁的玉皇山顶，多么清新明丽的一派江南雪景。左面的钱塘江，虽然并没有“顿失滔滔”，右面的西子湖，却是“银装素裹”了。西北面，是“断桥残雪”，向左一绕，便是“苏堤春晓”，再拐一点弯，便是“柳浪闻莺”了。

■ 毛泽东对捷沃西安说：有人要打倒我。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秦”灭了“楚”。“秦”是他们陕西（毛泽东用手指指在座的陕西韩城人师哲），“楚”就是湖南（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

捷沃西安于1953年12月30日从沈阳到了北京。毛泽东立即邀请捷沃西安去杭州一叙，尤金大使同去，师哲任翻译。

捷沃西安当然喜出望外。西湖名胜，毛泽东接见，恐怕没有比这更有吸引力的事情。

据师哲回忆：1954年1月2日，捷沃西安、尤金、师哲，一行三人，飞往上海，再由上海到达杭州。

第二天，毛泽东在刘庄寓所接见捷沃西安和尤金。

毛泽东接见客人时的礼节性问候，总是那样独特、诙谐而洒脱。

寒暄之后，毛泽东便向客人介绍中国党内和国内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国内，要出点乱子了。”当师哲译完这句话，刚才的轻松气氛顷刻为之一扫：中国党内、国内要出“乱子”？！

毛泽东依然平静：“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客人们听见毛泽东这句话，松了一口气：原来这样，只是一种“可能性”，还要看看发展。什么“乱子”呢？

毛泽东继续他的谈话：“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乱子”的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毛泽东！真是陡起波澜！在场的人，除了毛泽东本人而外，精神上不免都紧张起来。

“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上下千年，纵横万里，观今鉴古，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个性特点和作风。“‘秦’就是他们陕西（毛泽东用手指指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楚’就是湖南（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毛泽东的思路从现实溯回历史，通过历史

加以论证和发挥。

“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毛泽东又从历史平静地回到了现实，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极不寻常，捷沃西安和尤金，好像一会儿被推上浪峰，眨眼之间又被抛下浪谷，脑子全乱了，全都找不着北了，以致他们二人回到自己的住处，嘀咕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还不让师哲听见，对师哲的态度都变了。他们不知道要打倒毛泽东的陕西人是谁，但师哲倒是陕西的，是不是师哲，很难说。说是师哲吧，气氛和情绪都不像；说不是师哲吧，毛泽东又明明指着师哲说秦要灭楚。这个“秦”，究竟是指陕西出生的人，还是指现在在陕西工作的干部？或者从陕西来的干部？这些人都是谁？捷沃西安和尤金都不甚了了。即使他们知道高岗是陕西人，又怎么想到是指高岗呢？几天前，高岗还在鞍钢代表毛泽东表示祝贺，代表毛泽东接受献礼。要打倒毛泽东的陕西人究竟是谁呢？毛泽东把他们从北京召到杭州去讲这番话，究竟用意何在？捷沃西安和尤金百思不解。

也许，这正是毛泽东的博大和雄浑。攻其不备，出奇制胜，像谶语，波谲云诡，扑朔迷离，初听如坠五里雾中，只有等到事情完全暴露之后，你才恍然大悟。毛泽东的超一流的斗争艺术，足够让政治家们，或有志于从政的人们，去领会，去受用了！

## 第五章

# 两 项 决 议

——从《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到《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 毛泽东提示刘少奇：你的自我批评宜扼要，三四千字即可，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毛泽东1953年底离开北京的时候，就向刘少奇、周恩来交代过，准备一份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草稿，送毛泽东过目。

捷沃西安和尤金刚走不久，杨尚昆便将起草好的决议草案，从北京送到了杭州。

在毛泽东主持下，当时在杭州的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田家英等，对决议作了大量修改；林彪也看过，表示同意。毛泽东亲自加了两句重要的话：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1月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

一、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  
二、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

三、为召开全会，可将通过此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列为第三个议程。全会的报告，请刘少奇做，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中，可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讨论和通过这个决议，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除这封信以外，毛泽东又单独给刘少奇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直接着宣读你

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要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十天以后，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及中央书记处，为了使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参加中央全会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建议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立即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同时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

高岗自头年年底从东北回到北京以后，消息就不大灵通。偶尔听到一点什么风声，大都于自己不利。他想找到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外出杭州，只有刘少奇、周恩来同他直接联系。

中国古人说过：“天意从来高难问”，偏偏高岗的姓又正好是这个“高”。

高岗看到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心情就更加不一般了。

说老实话，倘在平时，甭说决议草案中的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增强党的团结呀，反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呀，这算什么？比这更动听、更冠冕堂皇、更深刻、更尖锐的话，高岗都能滔滔不绝、激昂慷慨地讲一大通。可现在不行，现在这些话不是他说给别人听，现在他是听众，是别人说给他听的。这可就不大相同了。

那么，这些话是说谁呢？现实针对性是什么？凭高岗的政治经验，一定是有所指的，决不会无缘无故讲这些话，尤其不会无缘无故作这么个决议。

那么，这些话究竟指谁？这个决议是针对谁？

是针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吗？如果这个决议是高岗主持起草的，那当然就可以是这样，可这个决议草案不是高岗而是刘少奇他们主持起草的呀！说是针对他们，逻辑上不通。从谁手里射出的箭，只能是射别人，不会是射他自己。再说，这里边几次点到“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不好说领导了什么“地区”。看来，不会是针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高岗又把各大区的一把手都过了一遍。西北的彭德怀，不大像。彭

德怀带兵在朝鲜打了快3年仗，去年7月27日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不像是针对他。西南的邓小平，更不像。财经会议上，邓小平是他们搬出来讲公道话、保护刘少奇的一个。而且，高岗清楚地记得，他去串联邓小平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刘少奇是好的。中南的是林彪。高岗心里清楚，林彪同他是有共同点、有共同语言的，但林彪这几年病病歪歪，不大管事，也没有什么活动。看来，林彪也不像。六个大区的第一把手，剩下的只有华东的饶漱石、东北的高岗自己了。难道就是针对高岗和饶漱石来的？决议草案中说的这些话，什么“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什么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搞成“独立王国”，都是指高岗和饶漱石？高岗想到去年夏季的财经工作会议，想到他在会后去南方的活动，想到去年12月23日毛泽东的谈话和12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着实有些心惊肉跳！不过，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六个副主席，党内的只有三个，一个朱德、一个刘少奇、一个高岗，把三个党内的副主席搞臭一个？那岂不是更加削弱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了吗？也许，主要是针对饶漱石，对高岗也顺便敲敲警钟，引起注意？

高岗把决议草案的文字，字斟句酌，掰开了，揉碎了，反反复复推敲，觉得这最后一个可能性最大。高岗便决定再也不找饶漱石商量了。决议草案中有一句话，即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向党中央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

对，找毛主席谈话，当面向毛主席说清，只要能见着他的面，哪怕他不说多少话，也能凭察言观色，摸到一点底。也可以检查自己的错误嘛！

高岗绞了半天脑汁，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最后才得出了这个结论，才确定这个措施。

高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写完后交给了中央办公厅。

高岗把信交给办公厅以后，就天天盼着毛泽东来信约他去杭州面谈，而

且天天在反反复复打着腹稿，怎样使自己的谈话深刻些，诚恳些，用这些来打动和说服毛泽东。

1月22日，高岗收到刘少奇的一封短信，大意说：遵主席嘱，此件送你一阅。你要商谈的问题，由少奇、恩来、小平同你商谈，商谈的时间，由你决定。信的下面，是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全文是：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中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一月二十二日

这封电报，在局外人看来，平平常常，不过是一般的交代工作的信。但在高岗看来，却极不平常了。

第一，这说明毛泽东不让高岗摸底。其实去一趟杭州，方便得很，毛泽东说开会在即，“不宜来此”，完全是托词。

第二，毛泽东不仅不让高岗摸底，而且分明是拉大了同高岗的距离，这个“天”，现在更“高”了，“仰之弥高”，越想够着越够不着；在拉大同高岗距离的同时，却缩小了同刘少奇、周恩来的距离。

第三，不仅对这两种距离一个拉大、一个缩小，而且分明是把刘少奇和周恩来置于高岗之上，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有邓小平，可以秉承毛泽东的旨

意，代表毛泽东同高岗谈话了。这是高岗无法忍受的。

第四，这封电报的倾向，等于毛泽东承认高岗“犯了错误”，是“犯错误同志”。

第五，毛泽东说欢迎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但应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本来，党内一向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回毛泽东开一个口、堵一个口，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第六，这也完全证实毛泽东在杭州遥控着北京，刘少奇、周恩来同毛泽东来往信函十分频繁。

高岗在精神上、灵魂上感到一种高压，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想作一下深呼吸，他想大叫、大笑，甚至大哭一场。

高岗好像看见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还有邓小平站在一起，他看见了毛泽东那种威严和深不可测的表情，也看见了刘少奇、周恩来那得意的、胜利的微笑。

高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对犯有严重错误，但经批评愿意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的分子，必须给以严格制裁。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是以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

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载入史册的。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

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没有出席全会。

1954年2月6日清晨。高岗起床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卫生间，而是走到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窗外隆冬的院落瞭望，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看什么。出现在他视线之内的是院子里几棵高大古槐的光秃的枝条在空中摇曳，一股股寒风，在院子里打着旋儿，扬起一阵阵灰白的尘土。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今天要开幕了。这件事在高岗心中已经压倒了一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高岗是知道的，但他找准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位置，也说不清自己是走向短兵相接的战场还是走上接受审判的法庭，心里有点没着没落。回想去年夏天的财经会议，可真是今非昔比了。那时候，他前后左右总有一帮人，他能够呼风唤雨；那时候，他是怎样地成竹在胸、踌躇满志啊！现在呢？高岗颇有点“众芳摇落”的感慨。不过，一直到昨天晚上，高岗还没有得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四中全会的消息。毛主席同四中全会保持的这个“距离”，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难说得很。也许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高岗心中一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他坐在会场中，听到主持人宣布由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作《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时候，他才有些清醒过来。

然而，恰恰是刘少奇这个名字，又使高岗的思想开了叉。从延安的时候起，高岗就同刘少奇有过多次接触，关系虽然说不上很好，也谈不上坏。现在怎么样？也是今非昔比了。也许他去年夏天干得太猛了？太莽撞了？太缺少韬略？没有考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是干了个“一锤子买卖”？

刘少奇拿着讲话稿开始作报告的时候，饶漱石的心情也许比高岗更复

杂、更难堪。他同刘少奇的关系比高岗同刘少奇的关系要特殊得多。尤其是那年刘少奇从南方北上延安，正是委托他而不是陈毅代理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的政治生涯，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呈上升趋势。后来呢，刘少奇待饶漱石也不薄。再后来，偏偏遇上了高岗，饶漱石一时“聪明”，以为又攀上一个“高枝”，一直发展到去年夏天迈出了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一步。人们说，凡是大麻子，十个有九个脾气暴躁，没准儿真是这么回事。跟着高岗这个大麻子，可真是“聪明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了。但是，一般说来，饶漱石的性情不像高岗那样暴烈，饶漱石有一种隐忍的功夫。现在是应该收敛一下，走着瞧了。高岗这一次也未必一败涂地。即使高岗失败了，只要饶漱石加上一百个、一千个小心，不在他和刘少奇之间增加任何新的芥蒂，凭着从前那层“老关系”、那层“旧情”，事情也许会有点转机、有点希望……唉！

当刘少奇报告关于这次全会的第一、第二项议程时，高岗一直处在“七上八下”的精神状态之中，都没有听清，或者没听进去；当讲到此次全会的第三项议程，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时，高岗收住了千端思绪。他听见刘少奇说：

我们的党，目前在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党在基本上的团结、巩固，并不是说党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党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来考察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析了目前我们党的状况的两个方面。我以为这个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

刘少奇说，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

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刘少奇又说：

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党外和党内的各种状况，认为中央通过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并且是绝对必要的。

如政治局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说，在我们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还不是在所有的环节都能畅行无阻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

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的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刘少奇还有一段话，简直是对高岗直言不讳的警告。

刘少奇说：“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刘少奇这几句话撞击着高岗的耳膜，使高岗全身的毛孔都发了一下热，以致刘少奇下面说的什么“为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言论行动，需要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什么“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应当以身作则”，就都没有听清了。

刘少奇报告结束之后，要就自己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这时，高岗又聚精会神地听下去，并且记住了刘少奇自我批评的要点：

(一)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在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  
(二) 关于老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问题。

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

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地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中央重新发表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 （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6年2月1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了，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个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 （四）关于天津讲话。

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我认为，自己在总的方面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存在的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自己当坚决改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遵循的原则。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与会者心目中的反响很不相同。有的认为，少奇同志这样做，很好，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躲躲闪闪，反正就那么几根小辫子，又不是背后搞什么鬼，而是公开的讲话或见诸文字的批示，公开的辫子在党内公开抖搂出来，这就主动了，就可以轻装前进，该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认为像少奇同志这样的身份，能作出这样的自我批评，态度诚恳姿态高，实在难能可贵。持这些看法的是到会者的大多数。但也有人认为少奇同志不必这样，恐怕会授人以柄；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自我批评未免一般化，太简单。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在高岗心中引起的则是有喜有忧。高岗喜的是，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高岗的优点，刘少奇有几条缺点错误，高岗就有几条优点，而且对刘少奇的每条缺点错误，高岗都提出过，斗争过。

高岗“忧”的是……

正当高岗想对自己思绪中隐约的忧虑理出个头绪的时候，邓小平的发言开始了。高岗意念中飞快地闪过：自己曾经拉拢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但被拒绝了；财经会议上，毛主席又搬他来替周恩来“解围”。此人分量不轻。他的发言得好好听听。

邓小平说：

“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这个决议草案，正如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有所指的，是根据具体事实，指了具体对象的。”

邓小平又说：“决议草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老实说，此时此地的高岗，对这样一些一般的大道理，兴趣都不大。倒

是邓小平下面这样一些话，高岗不能不琢磨琢磨，掂量掂量。比如，邓小平说的，“……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觉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温暖……如果他在中央某一个部门工作，往往会忽视地方的情况，不重视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甚至随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压；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会对全局照顾不够，对中央各部门的情况照顾不够，遇事总以为理在地方，甚至觉得上头的约束对他很不舒服，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

紧接着，邓小平替刘少奇讲了一大段公道话。这时候，会场气氛一片肃静，而高岗，却有如芒刺在背。邓小平说：

“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

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领导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对于这些对主要负责同志的超越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邓小平的这些话，无异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指着高岗的鼻子，挖空了高岗的老底，使高岗觉得脚下踏的，并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一片沼泽了。

滴水不漏的邓小平，接下去又作起自我批评来了。邓小平说：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邓小平的发言，给高岗出了一堆难题。——对了，刘少奇的自我批评引起高岗的忧虑在这里：刘少奇好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列出了几条，高岗能列出几条什么呢？

邓小平的发言也相当厉害。比如，他对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关于富农问题讲话的解释，以及他批评关于刘少奇这些讲话的“流言蜚语”，使高岗有些心慌。还有，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分散主义”“有份”。这次会要解决

的问题本来同他不沾边，可是他也站出来认这个账。使高岗烦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高岗看来，刘少奇的缺点错误，恰恰是高岗的优点，可是，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在这个会上讲的，而这些话，又偏偏像一群管束不住的狼犬，在高岗心里乱窜！当然，出难题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他们之中，有的或多或少参与了高岗、饶漱石的活动，有的虽然没有参与多少活动，但听见过高岗不少言论。他们站出来讲话了。他们各自做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但是，他们都同样程度不同地指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希望高岗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这个难题真是不小。弯子太大，怎么转过来呢？

高岗说过，他最拥护毛主席，毛主席也最信任他，最器重他，如果他离开了北京，毛主席休假就放心不下。毛主席早已不重视刘少奇和周恩来来了，不想让刘少奇管党的工作，不想让周恩来管政府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搞宗派主义的，一个有“圈圈”，一个有“摊摊”。

言犹在耳，曾几何时！现在，要高岗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怎么拐得过来呢？难哪，实在是难。高岗给毛泽东写过信，说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要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那不过是虚晃一枪，为的是要同毛泽东见面。现在，看来是非出台“亮相”不可了。高岗犯了什么“错误”？作什么“自我批评”？“批评”什么？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一夜之间就成了小丑？！

然而，还是得讲。高岗横下一条心，开始他的发言。

他首先讲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团结，党的力量，也在于团结，无产阶级的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有效的斗争，建立自己的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在于党自身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如果不团结一致，步伐也不整齐，党内出现这样那样的小宗派、小团体，那么，不仅党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党本身能不能存在下去，都会成为问题。那么，我们党团结的基础是什么，团结的轴心又在哪里呢？我们党团结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的轴心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应该切实做到：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

团结的事就不做。

高岗这样侃侃而谈的时候，忽然感觉上有些不对，会场的气氛也有些不对。这些车轱辘话，今天好像不是他讲的，大家也不愿意听他这些大道理。

高岗还没有找到角色的感觉。他还没有从旧角色中走出来，还没有进入新角色。

“我也有缺点和错误。”高岗在进入新的角色了，“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现实的情况很复杂，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又不能说很高了，主观同客观不一致、相脱离的情形，随时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犯错误。特别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新时期。”

这又不对了，谁叫你论证一个人会不会犯错误，现在根本不需要你从理论上阐述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的道理，而是直截了当地说明，你有什么错误，你对这些错误的认识如何，打算怎样改正。

“比如说，我有自由主义的东西，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在不同场合，说了些自由主义的话。这是很不好的。我对中央的个别领导同志，有些意见，有些情绪，但我不顾影响，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发过牢骚。这是很不应该的。”

“我还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遇事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一些，心中缺乏全局观念。一个领导干部，应当胸有全局，应当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一点我没有做好，我常常过分强调局部利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

“骄傲自满情绪我也存在，有时还表现得比较严重。思想上总觉得自己正确，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水平，办事果断。也觉得自己对革命有功，从老区里来的，一枪一弹打过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很不容易。抗日战争结束后，开发东北有功；建国以后，建设东北有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又对支援前线有功。总之是思想骄傲了。这种思想和情绪，是很不好的。”

“我在作风上也有不民主的东西。作风上的不民主，根子就在思想上的骄傲自满。既然自己水平高，能力强，还要婆婆妈妈商量来商量去干什么？

拍了板就完了。这样，不仅在工作中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也给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由于骄傲自满、作风不民主，就总是爱听表扬的话，不愿意听批评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作风不纯，希望能够听到同志们更多的批评，以便我提高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纠正这些错误。”

高岗的发言结束后，会场上的气氛较为冷淡。这也难怪，因为听完他的发言，就像在夏天被烈日晒得滚烫的广场上，洒了几滴水，这能解渴吗？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听起来不是自我批评，倒像是自我表扬。

高岗检查完了以后，饶漱石也在会上作了检讨。

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虽然涉及一些具体事实，但是浮皮潦草得使人吃惊。比如在苏北黄花塘整陈毅，他用心那么诡诈，手段那么阴毒，可他这时怎么说呢？他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原因呢？他说是“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陈毅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而他却“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他本来“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做什么了？没有说。

这也叫检讨？

饶漱石也说了几句“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这类话，但是没有实际内容，用那个时代的习惯用语，叫做“大帽子底下开小差”。

同高岗一样，饶漱石检查完了以后，会场上的反应依然是冷淡。

在压抑、烦躁、气闷，浑身不自在之中度过了几天的高岗，终于挨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2月10日。

这一天发言的有陈云、周恩来，最后通过决议。

陈云的发言，哲学性强，言简意赅，抓住要害，也生动活泼。

陈云发言的主旨是：我们党有可能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搞分裂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类分裂主义，不使乱子闹大。

张国焘是何许人，高岗是清楚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延安时批评张国焘，他参加了。1938年，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跑到西安，又跑到武汉，最后他独自一人投到蒋介石国民党的怀抱，当了特务，连他的警卫员也不跟他去。这些，高岗也都清楚。

陈云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决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

听话听音儿，这个普通道理高岗自然懂得。陈云说的是“张国焘这类人物”、“李国焘、王国焘”，这不是分明把高岗归入张国焘一“类”了吗？

陈云说：“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会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

关于第一条，陈云说：“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这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

这时，会场上发出了笑声。高岗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但他还是尴尬地咧了咧嘴。

陈云继续说：“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这句话，在高岗拉陈云一起拱刘少奇的时候，陈云对高岗说过。

陈云接着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这时，坐在高岗前面的人不住地点头，左面、右面，也有人点头。陈云说的好像并不是讲什么道理，而是摆事实。常常有这种情形：越是深刻的道理，就越不像是道理，而是实际，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

陈云继续提醒说：“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关于第二条，陈云说：“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关于第三条，陈云说：“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可能万岁的。”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很有些异样，这气氛分明格外严肃，但又活泼；分明格外庄重，但又轻松。高岗想，陈云说这些话真够大胆的了，他自己可不敢这么说，特别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但他又朦朦胧胧感到，大概越是内心坦荡，才越敢实话实说，心怀鬼胎，才拐弯抹角，吞吞吐吐。

陈云最后的意见是：

“我们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

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以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么，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陈云发言完毕，该轮到周恩来了。

周恩来的发言，篇幅相当长。当讲到党的团结，建议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时，周恩来说：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

为什么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呢？这是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

所利用。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骄傲的起因，多由于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们高级干部中若有这种骄傲情绪，又不加以制止，其危险性就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

我们又要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一种，那些话是见不得人的，是拿不到桌面上的；后一种，应该是言行一致的，表里如一的。这中间的界限就是我上边说的，属于后一种的，不管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会里也好，会外也好，都是可以说的，因为都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嘛！前一种就不同了，那些话不都是可以到处说的，只可以在背后说，在会外说，在一群人中说，在一个地区说，这就有了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的短处了。我们要区别破坏团结的非法活动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我们也要区别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当然，一般的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可以为个人主义的非法活动所利用，并且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这中间有没有界限呢？有的，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

刚才说的是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议的方针，大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对报告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破坏党的团结的危险状况已给了严肃的原则批判，并一致要求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不要错上加错。

我现在先对犯下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

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第三，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这在我们检讨当中是常有的事。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进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的表决。

当《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的时候，春笋般林立的手臂中，也有高岗的一只手臂。但是，高岗觉得自己的这只手，好像是被一种浪涛浮力托上来的，那么机械，那么僵硬。这时的高岗，脑子里尽是周恩来发言中的那些名词、那些短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暗中挑拨”、“非法活动”、“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赖掉一些，隐瞒一些”、“还不完全，还不深刻”、“继续反省”、“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等

等，等等，像是一大盘韭菜炒豆芽，乱糟糟搅作一团了。

高岗用了最大的克制力在克制自己，镇定自己。你是高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你还是东北局书记，你还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也就是“高主席”。你千万不能失态。你还有朋友，你还有希望。这就是堤坝。堤坝后面是汹涌激荡的一腔热血。千万得守住这堤坝。一点蚁穴都不能有，任何一种一念之差，都会成为一种蚁穴，足以使大坝顷刻倾塌的蚁穴。稍一不慎，局面将不可收拾。

这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有一天来到了。

### ■ 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

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重要会议，一般是不公开举行的，如果有必要发表新闻，也只有到会议结束以后的某个时间。七届四中全会，2月10日就闭幕了。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三个文件。到了2月18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同时发表题为《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的社论。就全社会来说，只有这时，人们才知道这次会议的消息。

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对高、饶本人，则是指出他们错误的严重性，希望他们沉痛反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继续为党工作。采取

的方针是治病救人，等待觉悟。如果高、饶能作深刻自我批评，切切实实痛改前非，事情的结局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中央各部同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

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代和作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评。饶漱石承认自己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发展到了个人野心家的地步。饶漱石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仍不诚恳，不愿意挖掘自己思想的本质。如对黄花塘事件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两个问题，虽然承认了一些东西，但保留较多；对从上海调北京休养的问题，承认自己有怀疑，曾对中央进行试探，但仍多方辩解，掩饰自己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也不愿意挖掘思想根源。尤其是对1953年两个会议期间，直接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参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主要关节问题，实行抵赖。

饶漱石是这样。高岗又如何呢？

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天，高岗收到《东北日报》一位同志的来信。这封信中，那“尊敬的高主席”的称呼，那亲切、崇敬到无以复加的问候的话语，那对于曾经几次见到高岗的情景的追述，触动高岗回忆起在东北时的那段灿烂辉煌的岁月。那时候，《东北日报》第一版上，一年之中要出现多少次高岗的名字和照片！各条生产战线重要生产任务的完成，几乎都要给高岗上

书、报喜。人们称他“高主席”，“亲爱的高岗主席”、“敬爱的高岗主席”；什么“在您的领导下”，“在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号召下”；什么“高岗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考验”；什么“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向您宣誓”……高岗多半要给这些“上书”复信的。于是《高岗主席复信勉励》、《高岗主席复信嘉勉》之类的标题，时有出现。办公桌上批示文件，电话机旁下达指令，检阅台上挥手答礼，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餐厅宴会，舞厅舞会，恭敬的体态，谄媚的笑脸，鲜花、掌声、美酒、女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声色犬马的享受……从今以后，这一切都将云散烟消，成为永恒的怀念了！

高岗置身于这个座谈会，思绪却萦回在过去的岁月。大家发言中的一件件、一桩桩事实和材料，像是一刀一刀地戳着他的心，像是一锤一锤敲碎他的过去和他的将来，像是在他高大而辉煌的形象上一笔一笔地涂抹着肮脏。

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已经不相信刘少奇而最相信你吗？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一离开北京就不放心，只有你在北京他才放心吗？有人称你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不是那么乐不可支、以“战友”自居吗？现在是怎么了？你究竟算个什么？

从“九天之上”跌到“九地之下”，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大的。高岗不仅在精神上受不了，肉体上也受不了。他的脑袋要崩裂了，他的心脏要爆炸了。

高岗觉得血的热浪，一阵一阵涌上耳根。

1954年2月17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召开的第三天。

这一天，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他交办各种公务，把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了。

大约9点多钟，高岗来到值班室，问值班员：“就你一个人值班？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高岗一边散步，一边向值班员东问西问，问生活情况，家庭情况，问学习情况，打靶情况，然后又问值班员手枪的性能，并且说：“把枪给我看

看，我有好长时间没摸枪了。”

“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值班员说。因为高岗最近心神不宁，尤其是这几天精神状态异常，高岗家人多次提醒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高岗把手伸了过去，样子有些不耐烦。值班员只好取出子弹和子弹夹，将空枪给了高岗。

高岗把枪拿在手上，一边端详着，一边又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把子弹夹也给我。”

值班员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的脸一下子拉长了，阴沉地说：“亏你是个老卫士！怎么，连我也不信任了吗？！”

值班员坚决地说：“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首长！我要负责！”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责！拿来！”高岗一边断然地说，一边从值班员手中夺过了子弹夹和子弹。

值班员半是无奈、半是哀求地说：“首长，可要当心啊！要注意安全。”

高岗带着手枪上了二楼。值班员目送高岗上楼，转身到值班室给卫士长打电话报告情况。

卫士长说，要想办法把枪要回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高岗身边时刻不能离人。

高岗的秘书、家人、卫士、通讯员，好几个人走马灯似地在楼上楼下转，高岗打发走了这几个，马上又来了那几个。

高岗叫一个秘书到他办公室去，把他刚才封好的几封信，交给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大家又忙乎开了：有人去取信，有人去找机要通讯员，自然，高岗身边还留下了几个。

秘书到高岗办公室拿了几封信，一个信封上写的是“毛主席”，一个信封上写的是“周总理”，他发现信封上有斑斑点点的鲜红血迹，大吃一惊，便找几个人看，商量该怎么办（原来，高岗刚才刮胡子，刮破了下巴，出了

不少血，手指上也沾了不少血。高岗在紧张、慌乱之中封那几封信，手指上的血便污了信封）。

大家觉得事关重大，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些信不能送出去，得拆开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

高岗写给周总理的，竟然是一封托孤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一下他的妻子儿女。

几个年轻人撒腿往高岗屋里跑，跑在前面的秘书哭着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的信，……你决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

高岗先是一惊，接着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

高岗一边说话一边站起来，拉着秘书的手，让秘书坐在自己坐的椅子上，高岗挪到左边的椅子上。

几个人从秘书手上拿走了信件，到壁炉前面去准备烧信。

秘书拉着高岗的手，流着泪说：“你可千万不要自杀呀！”

高岗说：“不啦！不啦！没事儿啦！没事儿啦！”高岗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秘书的左肩，一面提高了一点嗓门，催促快点把信烧掉。

烧信的几个人只顾烧信，高岗身边的秘书，也只顾看着他们烧信。

顷刻之间，屋子里非常寂静，只有撕信纸的沙沙声，信纸着火后轻微的呼呼声。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裤兜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他身边的秘书本能地将左手猛地往上一抬，击中了高岗的右肘。

枪响了。

子弹打飞了。

手枪掉在后侧的地毯上。

秘书拦腰抱住高岗，两个人扭在一起，都摔倒在地毯上。秘书拼尽全力抱住高岗，高岗用尽全力伸出左手去抢枪。就在高岗抢到手枪的那一瞬间，烧信的几个年轻人和高岗的家人一齐扑向了高岗，这位历经战火的高级指挥员，被缴了械。

刚才枪声骤起、大家慌乱的时候，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赶快打电话！”

高岗想起这句话，便说：

“你们打电话了？！他们马上就会来人，把我抓走了！”

中央很快得到了消息。

为了挽救高岗，使他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不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在发生这次事件以后，中央断然对高岗实行“管教”。

高岗在2月24日作了一次检查。在检查中，高岗承认自己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过分裂活动和宗派活动。高岗认为，这种活动是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会反党。高岗还说，那天的自杀行为，是自己一时思想胡涂，企图毁灭自己，一了百了。

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于2月底至3月初全部结束。

座谈会颇有成效，会上不仅核实了许多材料和情况，也揭发出不少新材料。

1952年12月，高岗曾将自己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报告讨论会上的发言，上报毛泽东。这个发言，结合马林科夫报告中讲到的苏联工商业工作中存在的很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联系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关于改善贸易企业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很好的意见。毛泽东看后批示：

“此件很好，使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中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

后经座谈会揭发核实，高岗的这个报告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当时国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高岗窃取别人的发言稿和文章，用以欺骗中央的事件，不止这一起，而是多次发生。

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分别向中央作了书面汇报和报告。

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周恩来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

个人主义错误，已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之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周恩来从十个方面概括了高岗的错误。

(一) 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制造“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 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三) 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

(四) 实行派别性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对干部许愿封官，扩大个人影响，骗取他人信任。

(五) 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 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 窃取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 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

(九) 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

(十) 个人生活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

周恩来最后指出：

“从高岗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评。‘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毛泽东于2月28日，审阅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

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这段话中的“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

3月4日，毛泽东看到合众社2月26日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作了推测，其中还有对高岗的评价，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

对政治风向的观察极其敏锐，而且习惯于把国际国内政治动向联系起来思考的毛泽东，对这条电讯稿非常重视。这时毛泽东还身在杭州，便立即提笔写了三条批语，批给同在杭州的几位领导人：

- (一) “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五同志一阅，退毛。”
- (二) “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
- (三) “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3月12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陈毅、谭震林3月1日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报告就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的事实，特别是1953年两个会议前后破坏党的团结、阴谋分裂党的各项事实，得出如下结论：

- (一) 饶漱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其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最严重的是1953年伙同高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 (二) 饶漱石善于伪装，多年来伪装守法克己，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伸手时也以伪装面目出现，饶漱石是党内少有的伪君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投机家。

(三) 饶漱石在党内争夺权位，采用一套权术，概括起来为：

1. 造谣挑拨，对上欺骗，对下蒙蔽。
2. 对干部或者许以职位进行笼络；或者先予以打击，打击以后再笼络。
3. 专抓同志的小辫子，善于钻同志间的小空子。
4. 处心积虑，四处安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来整人，使人莫知所措。
5. 担任新职时，预先准备好一套整人的下马威，以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6. 对他所不满的人，常常制造借口予以打击。
7. 当面扯谎抵赖，说话反复无常。
8. 伪装恭谨的面孔，实际上常常吹嘘自己。

(四) 饶漱石对自己犯的错误，至今不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关于他和高岗同时进行重大的反党活动，他只承认是“不谋而合”。

(五) 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的错误后，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教育必须加强。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运用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辩证方法，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制作了一个标本，一具模型，五脏六腑，经络穴位，皆历历在目。这个标本，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如果你把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同这个标本对照一下，你会发现一点什么，甚至会想起普希金的诗句——

这时候在我的眼前又重新出现了你……

随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由地委书记以上干部扩大到全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民主人士，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实际上逐步向全

社会公开了。

3月下旬至4月上旬，《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革命警惕》、《保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反对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社论。4月4日的题为《提高革命警惕》的社论，提出国内外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党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社论说，“党和人民的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已不可能和很少用公开面目来进行破坏党分裂党的活动”，他们“必然是采取两面手法，躲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伪装起来，偷偷摸摸地来进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宗派活动”；“另一种方法就是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他们所采用的再一种方法，是不尊重党的统一领导，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作是独立王国”。社论号召，“为了增强党的团结，粉碎敌人破坏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等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图破坏党分裂党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

与此同时，在中央政治局统一领导下，东北、华北等地，陆续召开会议，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揭发批判；4月，中央东北局召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央华东局召开了扩大会议；5月，中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6月，上海市委召开党代表会议；8月，山东省又召开党代表会议。

党中央的这些部署和措施，是根据当时斗争实际的需要，是符合当时的时代历史特点的。对于像高岗、饶漱石这样身居高位、说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干的是分裂党破坏党的勾当的大人物，开展全党范围内的斗争，在建国以后，这是头一回。当时，有些人一下子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党内有些同志就不相信高岗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呢？高岗的《荣誉属于谁》讲得多好：荣誉属于人民，属于党。这篇讲话我们亲耳听过，后来还作为干部学习材料让大家学习。他怎么是个人野心家呢？

这也难怪。全国解放后，全党是第一次开展对这类两面派人物的斗争。只有深入地揭发、批判，才能使人们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高岗于4月29日写了《我的反省》。他不得不承认1953年他在财经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高岗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进行那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当然，高岗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不得不承认自己有这个野心，并不等于他决心改正这些错误，也不意味着他将抛弃这种野心，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事实证明，高岗在第一次自杀未遂之后，并没有放弃和改变他的错误立场，相反，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沿着那条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并且决心坚持走到底。

他觉得他必然要失去曾经有过的那一切，然而，他决心不在失去那一切以后生活下去。

从一个共产党员一步步陷入了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泥坑，他已经无法想象，重新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切按照党的纪律行事，日子还怎么过？

当高岗进行着分裂党破坏党的阴谋活动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岗已经不存在了，消亡了；这时，体现在高岗身上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是失败了，资产阶级是胜利了。高岗如果接受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痛改前非，检讨他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重新做一个共产党员，那么，无产阶级的斗争在高岗身上的失败，就会转化成为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明确指示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高岗检讨完之后，还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

然而，高岗没有放弃同党对抗的立场。

高岗在继续被“管教”的情况下，谎称晚上休息不好，在偷偷积累着安眠药片。

他一边积累着，一边计算着足以致死的安眠药片的剂量。

一天，又一天。

一个月，又一个月。

高岗处心积虑，一次又一次欺骗管教干部，一次又一次瞒过管教人员，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储足了安眠药片的分量。

终于，在1954年8月17日深夜（距离他第一次自杀正好半年），高岗怀着对党和中央的仇恨，吃下了隐藏好的全部安眠药片，结束了他的生命。

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死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通知说：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

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逐步暴露以至最后被彻底粉碎，同中国共产党内消极因素的减少、积极因素的增多、歪风邪气的天天削弱、党风正气的日益加强，几乎是在同步进行着。

当高岗、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时候，党内屡屡出现是非不分、黑白混淆

的怪事，不少好同志受到的待遇，应该说是并不公正的。

陈毅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个。

饶漱石用了明的和暗的各种手段，长期排斥和打击陈毅，以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或多或少受到了饶漱石的影响。

那是1953年12月，陈毅来到北京。其时，正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别墅的毛泽东，约陈毅去谈话。

毛泽东没有开门见山，只是询问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农业互助合作的情况，谈谈国家领导体制方面的情况。

忽然，毛泽东话头一转，问起饶漱石来了：

“你和饶漱石共事的时间很长，应该说，你对他是了解的。此人究竟如何？”

一贯坦率直爽的陈毅，听到这个问题简直有如芒刺在背，直发毛。饶漱石，他当然了解，因为他多次身受其害。搞阴谋诡计，耍弄权术，陈毅不是饶漱石的对手。陈毅早就想躲开饶漱石，但是怎么也躲不开，逃不脱。后来，陈毅下定决心不谈饶漱石，敬而远之。更何况，饶漱石新近调来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究竟现在关系如何，陈毅也全然不知。而且，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直接处理过陈毅同饶漱石的关系问题，那时，陈毅要谈饶漱石，毛泽东制止了他。由于这种种原因，陈毅不敢把自己对饶漱石的看法直捅出来，只是说：

“漱石同志的工作还是不错的，有水平、有能力。至于缺点嘛，谁没有？我也有我的缺点嘛。”

毛泽东表情淡漠。

坐了一会儿，陈毅便告辞出来。但心中很是疑惑，今天是怎么回事？

可巧，陈毅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碰见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向他谈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心中的疑惑。

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时的陈毅，又是那个本来面貌的陈毅，那个真诚、坦率的陈毅了。

陈毅立即回到毛泽东的房里，坦率地向毛泽东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同时，根据自己的接触，把自己所了解和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论与行动，向毛泽东和盘托出。

陈毅倾吐真情，毛泽东频频颔首：“你说完了真话，就该我说真话了。”毛泽东便把当时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在财经工作会议、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分裂中央，高岗企图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等等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陈毅。最后谈到1949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泽东说：

“不要伤风，要嗅觉灵敏，要警惕非法活动。主席职务那件事，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他就使党受损失。”

在1954年2月份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毅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陈毅就高、饶事件坦诚地谈了对党内斗争的认识，也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陈毅还提出，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不是仅仅处分几个人。

听了陈毅的发言，刘少奇深受触动。当初，中央调刘少奇去延安，正是刘少奇要饶漱石代理自己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不久，就发生了黄花塘事件。饶漱石正是在有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职务之后，才掌握了华东大权的。如今，饶漱石不仅屡次整陈毅，还否认刘少奇培养过他，还同高岗串联在一起，散布种种攻击刘少奇的言论，把矛头对准刘少奇。现在，刘少奇又听了陈毅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发言，实在感慨万千。

当天晚上，刘少奇驱车来到陈毅的住处。

“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很对不起。”刘少奇诚恳、动情地对陈毅说。

“可别这么说，少奇同志，我这个人毛病也不少。我们总算互相了解了。来日方长啊！少奇同志！”陈毅抑制不住兴奋和感动。

不投机的话，半句都嫌多；投机的话，一句胜过千言万语。

毛泽东1953年岁末来到杭州。住了三个多月，离开杭州开始南巡，1954年3月14日到达太湖之滨的无锡。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会议的陈毅，闻讯后立即赴无锡迎候，将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

次日，毛泽东约陈毅谈话，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谈阶级斗争，谈假像与本质。海阔天空，其乐融融。毛泽东说：“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这句话使陈毅深受触动。

随后，陈毅回到了南京。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毛泽东的谈话，时时萦回于心。“感触纷来，慨然命笔”，写下了《感事书怀》诗四首。第一首《五古》的结尾是“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后车善择途，前车一再覆”；第二首《满庭芳》的结尾是“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第三首《水调歌头·自叙》的结尾是“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第四首是《七古·手莫伸》，全文为：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慎捉手不伸，  
他道不伸能自觉，  
其实想伸不敢伸，  
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  
权位高高耸山岳。  
岂不爱粉黛，  
爱河饮尽犹饥渴。  
岂不爱拥戴，

颂歌盈耳神仙乐。  
第一想到不忘本，  
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  
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三想到衣食住，  
若无人民岂能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  
岂无过失应惭怍。  
吁嗟乎，  
九牛一毫莫自夸，  
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览古今多少事，  
成由谦逊败由奢。

陈毅这几首诗，实质上是以诗论史，是对高、饶事件的诗化的总结。诗中贯穿着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跳动着一个共产党员赤诚、火热的心。

这些，都将作为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留给人民，传之后代。

1954年6月22日夜，毛泽东又邀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毛泽东依然海阔天空地谈山东，谈福建，谈高、饶反党阴谋事件；还谈诗，谈词，谈文学，谈《聊斋志异》。

陈毅告别毛泽东时，毛泽东把陈毅送到门口。毛泽东握着陈毅的手，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陈毅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的这句话同刘少奇那天的话，说法不同，表

达不同，但意思几乎完全一样。陈毅深为感动，他正要开口，毛泽东已转身进屋了。

毛泽东这句话的余音，却久久在陈毅心中回荡。

高岗自杀身亡后不到一个月，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

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通过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

9月29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会上决定，陈毅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开除高岗的党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  
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各项职务。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为期十一天，3月31日闭幕。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2人，全国党组织选派的代表257人。

会议的议题有三项：

- (一)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
- (二)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 (三) 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于3月21日致开幕词，3月31日发表讲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对高、饶问题做出正式决议。这是会议主席台上就座的部分中央负责人，自左至右：董必武、张闻天、陈云、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康生

在开幕词中，毛泽东讲到高岗、饶漱石事件时说：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3月31日的讲话，对会议进行了评价，还讲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目前形势问题，召开党的“八大”问题，但重点是讲高、饶问题。关于高、饶问题，毛泽东讲了六点意见：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

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功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下，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

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像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像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像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像。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像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

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时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会议进行过程中，3月31日毛泽东讲话之前，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会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邓小平所作报告的基本内容如下：

### (一)

我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彻底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这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新的胜利。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我们的党正在率领广大的劳动人民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但是一切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我们的党的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进攻我们的党。

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地包围着我们，时刻企图颠覆我们的国家。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我国的过渡时期，我们虽然还可能并需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被剥夺和排挤的过程中不会进行反抗，那就是一种极危险的幻想了。事实上，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实力，有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联系，他们还拥有一种不能忽视的武器，那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剥削阶级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经常地包围着和腐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

分裂我们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所以，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看作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决不是偶然的。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标志和纲领。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已经远不是一时地在个别问题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毫无疑问，我们的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而建设起来的坚强的不可战胜的党，证明了我们的党善于从自己队伍内部清除阴谋家和叛徒，用统一的团结的力量来争取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

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还只是在开始，今后我们还要经历比以往几年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斗争。因此，总结这一个斗争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 (二)

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中间和同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期间暴露出来的。这时，他们调来中央工作不久。当他们

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企图是完全隐蔽的；当高岗调到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互相结合起来，而在上述这两个会议期间及其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有计划的有系统的造谣和挑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不满的情绪，并且用他所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鼓吹他的“改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计划，也就是推翻党中央的领导而由他来代替的计划。

高岗在南方活动回到北京以后，自以为他的反中央宣传能够收效，更积极地更狂妄地展开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以至当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问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但是把他形势完全估计错了。这时许多听过他反党宣传的同志已经向中央揭发了他的罪恶阴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在高岗、饶漱石以外的全体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一致支持之下坚决地制止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给了这个反党联盟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七届四中全会中，高岗、饶漱石完全没有悔过的表示。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选举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员四十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三同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报告，这个发言和这个报告都已经为中央政治局所审查和批准。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对党表示仇

恨。他在座谈会还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已经用自杀来表示他背叛党的决心。这次自杀虽未得遂，但是他仍未改变他仇视党、仇视人民的态度，终于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再一次自杀结束了他的叛徒的生命。饶漱石在座谈会上做了初步的检讨，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不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而企图避重就轻，实行抵赖。在座谈会后，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间，饶漱石虽然作出了书面检讨，承认了一些别人已经揭露的事实，但还有许多重要的关键避而未提，并且还不断地企图抵赖，向党反攻。

在四中全会以后，全党讨论了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央政治局并把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首先向全党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然后又向全体党员、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并通知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各个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团员在研究了四中全会决议，听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传达以后，都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并且大大提高了对国内外敌人阴谋破坏的警惕性，大大加深了对增强党的团结的认识。

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从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系统地开始。从那时以来，他为了达到推翻中央领导的目的，就不断制造和散布各种荒谬的谣言以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全党的团结，吹嘘自己的本领，力图用秘密手段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夺取领导权力，并且组成了自己的反党宗派作为他的阴谋活动的工具。

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是他是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像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而只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

更进一步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了。大家知道，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领导者，他们多年来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着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不在中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是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职务的，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攻击中央书记处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

高岗蓄意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并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要夺取领导权力，他要铲除在他夺取权力的道路上的障碍。为达到这种卑鄙目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任何人，不管姓张姓李，只要足以妨害他实现他的野心，就会成为他造谣诬蔑和攻击的对象。

高岗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明知道自己是完全无理的，所以他从来不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地正式地提出他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有什么意见。他不敢把它摆在桌面上来谈，而只是偷偷摸摸地在党内挑拨离间，迷惑缺少判断力的人，并且在他的追随者中鼓舞士气，使他们大胆地帮助他到处散布种种反党谣言。所有这一套正是阴谋家的惯技和特征。

饶漱石在一九五三年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也不是偶然的。根据揭发出来的各种事实可以看到，饶漱石多年来就是一个阴谋家和骗子手。可以说，虚伪是饶漱石的特长。他满脑子都是卑鄙龌龊的个人主义打算，但他竭力伪装成“很有原则性”。他经常装着是小心谨慎地执行中央指示，实际上却是在工作中不断地歪曲中央的方针政策而贩运资产阶级私货；他经常装出道貌岸然的外形，实际上完全是靠说谎吹牛，投机取巧过日子。

饶漱石在党内经常用剥削阶级的权术进行打击和拉拢，以达到他的个人主义目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三年，饶漱石就为了争夺新四军中的领导权力而用欺骗手段发动反对陈毅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斗争。他常说他对待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的手段是所谓“先小人，后君子”。他所谓“先小人”就是找个机会给对方以狠狠的打击，从而“制服”对

方；所谓“后君子”就是把已经“制服”了的人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 (三)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党内使用了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而这是同党的生命不能并存的。这只能符合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中央的领导。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任何党员对于中央的领导同志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经过党的组织提出来。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他们并不公开提出自己的路线政策来反对中央，而只是背着党的组织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他们在这个人面前主张拥护这个反对那个，而在那个人面前又主张拥护那个反对这个。说到底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自己取得权力，只要有利于取得权力，他们的面貌是可以任意变化的。

当然，阴谋家总会替自己吹嘘，说他们怎样正确，怎样有本领，怎样有功劳。但是首先，即令真的是这样，这对党和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暂时在表面上说得正确做得正确的阴谋家，不过是更善于掩护自己，因而对党和人民更加危险罢了。

其次，阴谋家这样的吹嘘照例都是说谎的。如果说谎，不装出一副易于骗人的面孔，这算什么阴谋家呢？

让我们看看高岗和饶漱石在工作中的真相吧。他们在工作中，虽然力求掩饰自己的面貌，但是他们的反党的资产阶级尾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突出。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

土改中的“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都用“左”的借口来加以抵抗。

但高岗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

在抗美援朝问题上，高岗最初本是反对出兵援朝的，而且当敌人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初越过三八线北犯的时候，他简直仓皇失措起来，立即不顾一切地动员疏散。朝鲜战争发展中他的多次发言记录表明，他对战争实际上毫无定见。在朝中方面取得胜利战果的时候，他冲昏头脑，吹嘘“立即解放全朝鲜”；而在战局僵持时，他又强调困难，作出悲观估计。这种情形正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党问题的决定，就因为他本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实质上是要取消党。

如果说高岗的错误表现为“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的政策

上的错误的基本形态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他的这种错误，在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饶漱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一九五二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他经常强调上海工人复杂，借口“怕乱”，不敢在斗争中发动和组织工人，而在另一方面，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极力让步，唯恐得罪了资产阶级。

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并且不认真执行党的依靠和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方针，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捕和所谓“以特制特”。他曾经主张所谓“变大批反革命干部为我们的干部”。

饶漱石在农村工作中也是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摧毁封建秩序，多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冷淡。他认为土改后党在农村中，不应再依靠贫雇农，以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大家不敢向富农方向发展。

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当然，应当指出，在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高度的威信，由于中央的指示直接下达到省市，由于广大干部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一切工作总的说来还是沿着正确的方针前进的，还是有很大成绩的。高岗、饶漱石等人在工作中的错误，或迟或早地都受到了中央的纠正。他们用走私方式进行的反党活动，虽然在不少工作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但终究不能抵消掉绝大多数对党忠诚的同志的努力。但是高岗、饶漱石等人不但把自己的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正确，而且贪天之功，企图把这些地区的全部工作成绩都归于自己，要别人相信他们是“一贯正确的”、“能力很强”的。这就是漫天大谎了。

必须认识，任何共产党员都不应当把在自己主持下的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工作成绩看作他个人的功劳，因为无论他多么聪明能干，如果不依靠党中央和党的上级的领导，不依靠党组织的集体智慧，不依靠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的工作的配合，不依靠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就必然会一事无成。因此，把个人作用摆在集体之上的这种错误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不能相容的。但是高岗、饶漱石还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作用表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是用阴谋家的惯技故意制造他们本领高强的神话，尽力掩盖他们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拿东北的工作来说。东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北地区所以能处于这样的地位，当然不是因为高岗“能力强”、“领导得好”的缘故。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央派了十几个中央委员管理东北的工作，而且那时候领导东北地区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并不是高岗。在东北全境解放，林彪同志入关以后，中央确定了首先稳定和恢复东北经济的方针，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保证东北经济不受关内战争的影响，并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东北的经济恢复。由于中央的领导和全党的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东北在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取得一些成绩和经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施行，那么东北地区的成绩还应当比现在更大些。但是高岗却把东北地区的工作成绩一概看作自己的功劳和资本。同样，饶漱石也善于自我吹嘘，冒充本领高强。

不懂装懂，不能装能，冒充有学问，有本领，冒别人的功劳为自己的功劳——这就是阴谋家高岗、饶漱石所吹嘘的“能力强”的真相！

#### (四)

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为什么会在我们党内出现呢？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党所需要的党员和干部是“懂得马克思

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应当说，我们党内的一切优秀的党员和干部就是这样的。党正是依靠他们取得了我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正在为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但是，正当我们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进入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三年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却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企图推翻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企图夺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司令部，这是包含着怎样严重危险的阴谋！这种阴谋家的出现，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只能是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全党在知道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各种事实，并结合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而进行讨论以后，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已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反党活动的性质和它的极端危险性。但是有些比较缺乏政治经验或比较不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的同志，会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想，为什么像这样的“大干部”还会犯错误呢？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他们的不能理解就因为他们还不是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越来越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党员，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和原则，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如果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一定会滚到社会主义的敌人那一边去，甚至发展成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并不是什么超乎阶级斗争的规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只有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正确地认识这

种反党活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同这种反党分子进行斗争。

也有一些党员曾经这样想，我们党已经是久经考验的党，所以在我们的党内不应当发生反党的野心家。这种想法也会妨害他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认识。要知道，就一方面来说，我们的党既然还处于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同党外的各种社会力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认为党内不会产生任何叛徒或蜕化分子，那是不合乎实际的。就另一方面说来，正因为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在人民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所以反党分子才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反党的纲领，而只能进行无原则的非法的阴谋活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反党分子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也不能从根本上伤害我们的党，相反的，我们的党能够顺利地彻底地揭发和战胜他们的阴谋。这正表明我们的党是能够在任何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面前取得胜利的，这正是我们的党的伟大和光荣的证明。

还有极少数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误，还不能看做是反党的活动。当然，在我们同错误作斗争的时候，必须分别清楚两种不同的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那就是如同四中全会决议所说的，一种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另一种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高岗、饶漱石的活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前一种情况，还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呢？既然这个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党、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露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而且他

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的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

### (五)

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党应当从这一次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深刻的教训。

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就是我们从粉碎高、饶反党联盟中所应该取得的基本教训。全党必须充分认识，无论就国际条件还是就国内条件看，我们现在正处于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四中全会决议中说：“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严格地遵守四中全会决议中所作的各项规定，为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而斗争。

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我们特别应该警觉到的一点，就是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确的结论。曾经有些同志在听到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反党言论之后，既不向党组织报告，也不要他们把意见正式地提到党的组织中来，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必然有害于党的团结，而有利于反党分子的活动。

四中全会决议中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野心家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

中建立家长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生活中民主不够的现象，就会为这些野心家所利用。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这些野心家不可能进行隐藏的反党活动。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使我们看到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拜思想的危害性。

毫无疑问，我们的党鼓励每一个党员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才智，但同时我们的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对任何一个党员（哪怕是最负责的党员）的工作，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自上而下的和由下而上的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工作摆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相反地把自己摆在党组织之上，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遵守的原则。在我们党内，各级党委还不都是认真地执行着集体领导的制度，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党的各个组织特别是高级组织的监督还不是经常和严格的，这些就成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可以利用的空隙，以至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央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能明了真相。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严重的教训，切实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首先是建立和加强中央对全国各地方和上级对下级的巡视检查制度，一定的党的工作部门监督一定的国家工作部门的制度，管理干部的部门同时负责检查干部的实际工作情形的制度，以保证任何党员都在党的监督下面做工作。同时，必须迅速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便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中的各种违法乱纪案件，同一切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分子，进行经常的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再一次向我们指明了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严重意义。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不断地同腐蚀我们党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这方面工作的任何减弱都是对党有害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

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共产主义者的“嗅觉”，使我们能够敏锐而正确地鉴别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以便发扬共产主义的东西，而反对和肃清资产阶级的东西。党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有系统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有系统地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没有学好是我们能否做好领导工作，能否经受得住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的重要关键。党要求每一个高级干部经常地认真学习，并将实行按期分批把党的各级干部调到党校学习的制度。

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决议》从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的斗争中，总结出三条经验：

第一，必须坚决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决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党组织必须同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倾向和分散主义倾向作斗争，同压制党内民主的现象和个人崇拜习气作斗争。

第二，党对任何地区和部门、对任何工作人员，都必须实行监督，这种监督，应是严格的、经常的、有系统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没有这种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错误甚至变坏。

第三，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巨大的意义，必须抓紧而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和生活方式的斗争，这些东西是腐化革命队伍的危险武器。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为了防止类似高、饶事件的发生，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会议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瑛、刘锡五。

1955年4月4日，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并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4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斗争，胜利结束。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作为一个事件，已经过去了。从此以后，毛泽东在他的讲话里，还多次提到，但都是作为历史经验，提醒大家注意。第二年，即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从“里通外国”的角度提到高岗。毛泽东说：

“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这个讲话，主要是讲彭德怀问题，也提到高、饶。毛泽东说：

“高、饶也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要打倒，剩下不多了。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三十几年的关系（按：指毛泽东和彭德怀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已经同他约好了。那时高岗想去陕北，回老家。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还没有来得及讲，他就自杀了。竟是这样一个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从毛泽东这些委婉、富有弹性的谈话里，人们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绝对寸步不让，同时他又是个重感情、念旧情的人，几十年的关系，不要说拉倒就拉倒，那么容易？！毛泽东也总结了处理高岗事件的教训，暗示彭德怀不要犯傻，别干高岗那种傻事，事情还大有回旋的余地（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毛泽东这次提到高岗，明显地流露出自责和惋惜之情，则是少有的。

第六章

..... **两个高岗**

——尾声

■ 我们便看见了两个高岗：一个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并肩而立的高岗，一个是躺在荒草墓冢中的寂寞的高岗。这两个高岗，都是真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且，也都属于历史了。

1954年，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开始揭发高岗阴谋的一年，也是高岗自杀身亡的一年。

这些都是40多年前的旧事了。

高岗死后，被埋葬在北京香山和玉泉山之间的万安公墓。他坟头的荒



高岗墓

草，已经数十度春绿冬枯。

联想到本书开首提到的油画《开国大典》，我们便看见了两个高岗：一个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并肩而立的高岗，一个是躺在荒草墓冢中的寂寞的高岗。

这两个高岗，都是真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且，也都属于历史了。

让历史在这里定格吧！给后来成为反党分裂集团首领的高岗装点些光荣，或者给前期的、光明面占主导地位的高岗添加些黑暗，都将是徒劳的。

本书中提到的那位科瓦廖夫，就干过后一种事情。

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发表对科瓦廖夫的“访谈录”。其中一段对话是：

冈察罗夫：下一个问题与重大政策无关，而与一个人的命运不可思议的波折有关。这里指的是高岗的命运。东北革命根据地是保障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据点。高岗在领导东北根据地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朝鲜战争期间高岗的作用也相当大。当时他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在中央政府和党内还担任了一系列最重要的职务。在1954年，即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有消息说高岗被软禁在家，随后得到情报说，高岗已自杀身亡，这使许多人感到震动。官方指责高岗搞“反党分裂活动”，但一直传说真正的原因是高岗同苏联关系太密切、太秘密，高岗想借此巩固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您是否了解一些实情，能够说明这位活动家为何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科瓦廖夫：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友谊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些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

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

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障东三省免遭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成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怒不可遏。

中国有关研究人员看到这篇文章后，访问了当时担任中方翻译的师哲。李海文的《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一文，记录了师哲对科瓦廖夫不实之词的批驳。

问：科瓦廖夫回忆刘少奇访苏时曾向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和潜水艇帮助解放台湾。但是，我看到刘少奇写给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没有这个内容。

师哲答：科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刘少奇去苏联，科瓦廖夫同行，他的工作是我们到大连后，由他出面向苏军交涉，派飞机送刘少奇一行经朝鲜上空、远东到莫斯科。在路上用了七、八天时间。刘少奇第一次拜见斯大林时将科瓦廖夫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他没有到谈判的房间，在外面等着。斯大林知道他也来了，派人把他叫进来，问他一路上的情况。他见了斯大林像个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十分紧张、拘谨。回答完了问题，斯大林示意让他出去，他就赶快退出会场。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

问：科瓦廖夫谈到高岗表示要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和刘少奇发生争吵。因此高岗提前回国。

答：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决不会提出

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会谈时都是刘少奇一个人说，不给高岗等人发言的机会。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满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提前回国，这在出国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岗自己提出来的。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说工作忙，离开时间长不好。所以刘少奇到工厂参观、座谈他都未去，提前回国了。

师哲的回答，近乎情，也合乎理。

现实是不断变化的，但历史就决不可能再变更了。人为地变动历史，那就是篡改。谁篡改历史，谁就是混淆视听，害怕真理。

让站着的高岗站在那里，让躺着的高岗躺在那里吧！

人们会听见两个高岗无声的诉说：

一个人，应当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人的身上，总会有光明面和黑暗面这两个方面。完全没有黑暗面，通体光明，这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千万要不断克服黑暗面，使光明面始终占主导方面，千万不要让黑暗面发展成为主导方面。否则，无论怎样的辉煌，最后也会归于漆黑。

饶漱石的结果如何呢？

1955年4月，因包庇“反革命”等问题被逮捕审查。

1965年8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14年；同年9月，被假释。

1967年重新收监。

1975年3月，因患中毒性肺炎死亡，尸体火化。

本书开头提到，高岗上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后来又从这幅画上消失了。他是怎么从这幅画上消失的？对此做点交代，算是本书最后的一个泛音。

高、饶事件过后，高岗是一个反党联盟的首要人物，已尽人皆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高岗差不多也就归入“不齿于人类”的什么“堆”里了。在天安门城楼这样神圣的地方，在开国大典这样庄严的时刻，让他抛头露脸岂不是替他树碑立传吗？于是——画家董希文自己，将高岗从《开国大典》的原作上抹掉了。这就是后来那幅没有标明创作时间、没有高岗形象的《开国大典》。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这“头衔”比高岗的还要吓人，自然也要“归堆儿”，算在“不齿于人类”的什么“堆”里。又是画家自己，将刘少奇从原作上抹掉了。据说，画家有这种技术，能将人物形象刮洗得干干净净，露出画布的原貌来。

现在，被一再涂改的《开国大典》原作，已经面目全非，只好永远储存在仓库里，而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开国大典》，则是别人照董希文的原作复制的。董希文后来重病在身，不能作画了。

有人说，这是一个大悲剧——《开国大典》的大悲剧，董希文的大悲剧，中国的大悲剧。

是悲剧。

所幸的是，那段历史总算过去了，这悲剧也总算过去了，留给人们的是历史的沉思。

然而，人们嘴边还常常挂着一句话：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这意思应该是：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弘一大师圆寂前的最后绝笔是四个大字：“悲欣交集”。

生活、世界，是否本来就是在“悲欣交集”中演进呢？

这没准儿。

1994年1~4月 北京

2005年4~5月 修订

## 主要资料来源

《毛泽东选集》（共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毛泽东文集》（一、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年谱》（上、中、下），逄先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陈云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洪学智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汪东兴日记》，汪东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陈云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陈毅》，广日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 《安子文传略》，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毛泽东与斯大林》，刘杰诚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 《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楚序平、刘剑主编，华龄出版社，1993年版。
- 《开国前后》，郭文韬著，毛岸青、邵华主编，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 《建国秘录》，曹英、余敏辉编，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 《落日余晖——毛泽东秘闻》，东方骥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一部》，李颖、程美东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聿温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 后记

这本书从1999年1月初版（原书名《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到现在，已经七年多了。

1993年7月，我从一场“艰难的舞蹈”中抽出身来，8月，就着手收集材料写这部书稿。1994年1月开始写作，4月底完成。

那时候，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还都健康，所以，书中提到他们，就说他们“至今健在”。1995年春天和1997年春天，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谢世了。然而，书中的“至今健在”四字，我仍保留着，无非是想用这点“时间的痕迹”，表示对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念。

我能完成这部书稿，并且能以出版物的形式面世，要感谢的同志很多，如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杨柏青同志，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专家唐曼珍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党史资料室的侯惠珍同志及其他同志，还有审阅过这部书稿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庞松同志，他们从各个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我曾说：“如果没有当代中国出版社，我这部书稿最终不过是废纸一堆，都说不定。”这不是夸大，而是有事实为证的。这部书稿完成于1994年4月。从那时到1997年夏天送达当代中国出版社，中间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三番寒热里，有六、七家出版社同我有过接触。有的听说这个选题，就派人上门来，将书稿拿走，过几天又送了回来。有的来拿书稿时，说了不少好话，可是拿走后三个月、四个月，依然举棋不定，不吞不吐；也有的找上门来，掏出现金人民币四千元，要求“买断”（我不会做买卖，没有卖）。还有一家出版社的女士，约我把书稿送去，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杳无音信。待我打电话询问，那女士回答说：“我们不用了，你来拿走吧！”我只好老老实实乘公共汽车去拿“回”（在她来说是“拿走”，在我则是“拿回”）。编辑部门退稿的事，像打电话占线一样，再平常不过了。我被退稿，可谓多矣，但方式是：或者将稿子邮寄回来，或派人

送来，或在稿中夹一封退稿信，或在稿中夹一张印好的纸条儿，上面有几句客套话，这些都很平常，也很正常。然而，像这位女士这样，约我把书稿送过去，时间过了半年，仍然不哼不哈，等我询问，才想起来，“我们不用了，你来拿走吧”。如此派势，如此不合“游戏规则”，实在是“别开生面”，令人难忘。

1997年，书稿送到当代中国出版社后，朱元石同志和唐合俭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还进行其他必要的相关工作。这书才得以在1999年1月出了初版。

去年夏天，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陈德仁同志告诉我，社里计划再版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以后，报刊上关于高、饶的材料，又有新的披露（他还给我提供了关于高岗自杀的新材料），问我是否要作些改动。

这样，我又认真将这本书看了几遍，觉得书中有关几处叙述过于简约，有几处材料嫌不足，看到这几年书籍、报刊上关于高、饶事件的叙述，对照之下，觉得书中有关几处不准确。此外，书中的错字、错句也不少。于是，又改错，又补充，又修正，总之是变动较大。可以肯定地说，再版比初版，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在这本书稿“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它。现在，还是这个出版社再版这本书，给了我弥补不足和修正谬误的机会。联想到本书完稿后几年的“经历”，我要特别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领导的胆和识，大概也就顺理成章，容易理解和谅解了。

这是一本纪实文学之类的作品，书中涉及的重大、重要情节，都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只是在细节和人物内心活动方面，进行了一些推测和想象。我的党史知识有限，文学修养也不够，虽经多次修改，缺点和问题，仍然难免。希望能看到这本书的同志，再给我一些指教。

马畏安

2006年6月13日，夜。